

書叢學科會社

編主麟秉劉 松炳何

蘇俄制度與資本制度之關係

著等慈康

譯等激光林



商務印書館發行

325
0044
4350

書叢小學科會社

編主麟秉劉 松炳何

蘇俄制度汎繫制度與資本制度

林 George S. Counts 等著
光 激等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由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譯者自序

今日世界經濟之潮流，不啻徬徨於三岔路口。呈演於吾人目前者有三大途徑：列國所因襲之資本主義一也，蘇俄所宗之共產主義二也，意大利所揭櫫之汎繫主義三也。以普世不景氣之深刻，與夫國際關係之緊張，此鼎峙之局面，遂日形顯著。世人處此境地，見聞所及，資本主義標榜生產效能；共產主義宣傳社會公道；汎繫主義，提倡國族中心。各具特點，互有短長，目眩神迷，有不知何所適從之感。

人類社會，千綜萬象，一元之說，本難概括。欲以唯物史觀，盡解歷史複雜因果關係之表現，自不免於武斷。然謂經濟為支配人羣主力之一，則不容疑異。並世各國之競爭，經濟力量之競爭也。今日全球之不安，經濟難關使之不安也。如何增進與運用吾人之經濟力量，如何渡過此經濟難關？則三大制度之研究，誠屬當前之急務。

去歲美國政治學會特開會議於威廉斯城（Williamsstown）與會者多世界各國之經濟學專家。由特有研究者三人分任蘇俄制度汎繫制度及資本制度之闡述。不尙主義之鋪陳，注重制度之運用。根據事實，不畸不偏。對於蘇俄與汎繫制度之組織與工作之特點，尤能一一指出，極合有志研究今後經濟制度改革者之借鏡。三者之後，復有對於將來世界經濟制度之意見一講。茲由該會輯成專書問世。最後更殿以討論會之紀錄，各學者反覆辯難，亦多發人所未發之處。

我國以農立國，而農村經濟瀕於破產。近代工業方在萌芽，而勞資糾紛，風起雲湧，一線生機，不絕如縷。如何因應世界之潮流，適合本國之環境，要不得不斟酌取捨於工業先進各國已經形成已經實驗之制度。值茲強侮當前，欲謀國力之充實，尤宜確立經濟之方針。爰遂譯此書，倘竟引起國人研究之興趣，則幸甚矣。

蘇俄制度汎繫制度與資本制度

目次

蘇俄設計制度與五年計劃	一
一	一
二	二
汎繫主義之經濟制度	四五
一 合作制度之起源	四五
二 現在意大利之勞動制度	六七
(一) 法總工團	六八
(二) 集合勞動契約	七九

(三) 勞動法庭……………八二

(四) 社團……………八七

(五) 社團部……………九〇

資本主義之經濟制度……………一〇五

一 政治與經濟之進化……………一〇五

二 國家與個人機能之妥協……………一三〇

世界經濟計劃……………一六二

附編……………一九一

第一次會議……………一九一

第二次會議……………二二三

蘇俄制度汎繫制度與資本制度

蘇俄設計制度與五年計劃

康慈博士 Dr. George S. Counts 著
于樹生 譯

一

兩年以還，謂經濟界不乏可以樂觀之朕兆者，雖大有其人，而經濟衰落之西半球，迄今尙無以自拔。失業者以數百萬計，民生至爲痛苦。以吾美言，物產豐富，生產力備，衡以常理，吾人之物質需要，應不難滿足。乃亦不免飢饉載途，身受生活不安定之恐怖。世無神靈奇蹟，此人類歷史中最蕭條之一頁，誠不知何時始得解脫。有史以來，人類所受艱苦，固不知若干，今日之難，可免而竟至不免，故益可悲。科學發達之結果，昔人認爲夢境者，皆已一一現實。惟在經濟上政治上教育上則明睿之士，未能善用科學予人之機會。發展既未能均衡，馴至經濟制度不健全，而

物力虛耗。世人有鑒於此，對所謂「社會設計」(social planning)者，乃日益注意。

雖然，世人之注意「社會設計」亦不盡為經濟衰落之影響也。近世有心人士努力種種試驗，冀得一兼顧經濟生活各方面，統籌全局之辦法。各種試驗之中，不無大膽的計劃。世人聞之，輒不禁心悸神移。共產主義革命，距今十有四年，蘇維埃之設施，已漸就緒，舉世對之猶多蔽惑。其功罪利弊，一時本難斷定。至於「設計制度」為其獨創之特點，則了無疑義。蘇俄之作爲，姑不具論；其努力之目標，則固在竭其力之所及，以合理的方法，調節經濟，爲民衆謀福利也。

是以蘇俄之努力是否成功，殊值得詳細研究。且吾人研究之際，必先具公允之態度，曠達之眼光，始克有濟。倘不求深解，不祛成見，無論何說，祇須源出蘇俄，概以宣傳目之，不加問，則真相如何，終不可得。吾人素日對研究蘇俄，每覺不屑。此種態度，亦非力改不可。凡茲心理轉移，誠非旦夕所能達到。道不同不相爲謀。歷史上任何時期，凡一種文化，獨盛一時，對於其他勢力，每認爲一無可取，不肯虛心求益。蘇維埃之所嘗試，世人向指爲違反自然，不若吾人自己之制度與人類天性相協調。實則先哲食色大欲之說而外，人類天性，亦至難講。吾且以爲人類既能

適應環境，任何社會組織當無不可行者。在過去四年中，余目觀紐約城中之熙熙攘攘，自得其樂，益信斯說之不無理由。都市生活之煩囂，吾人既安之若素，人類天性，更何不能忍耐者耶？

蘇俄之「五年計劃」，吾人多已知之。而視此尤為重要者，乃係「蘇維埃設計制度」。「五年計劃」蓋為其產物。其他各種計劃亦不勝枚舉。在不遠的將來，第二第三……「五年計劃」行將接踵而至。研究蘇俄者，幸毋忽視此點。否則失去蘇維埃之神髓矣。蘇維埃設施之特點，厥為於社會構成之中，着力於「設計制度」。彼輩計劃將來之設備，周至，正如吾人維持秩序或教育兒童之設備也。

蘇維埃設計計劃之研究，可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解說此制之各種設計機關，略述「五年計劃」之大概及其目下之成就。第二部份則對蘇維埃之努力於設計制度加以估定，明其價值所在，考究其優點弱點，並於此制之將來略作推測。至於各種統計數字，吾人既數見不鮮，此中將力求簡少焉。

自公共經濟社會主義化，各種經濟事業之設計即與之俱興。革命初期，設計之事，由政府

自身任之。其後事業日多頭緒日繁，勢難兼顧。且設計之重要，日益顯著，專門負責之專職機關需要迫切，乃於一九二一年二月廿二日成立國家設計委員會。草創伊始，祇粗具規模。然此後改良擴張，無時或息。故迄今雖已十年，最後將興革至若何狀況，仍難臆度。所已昭示於事實者，則此一機關久已成新社會建設事業之中堅，方應革命勢力之推移，日興未艾也。

國家設計委員會在蘇維埃政府組織中之地位如何，在此可先加考究。蘇俄國中最高權力屬之蘇維埃聯邦全體大會（All Union Congress of Soviets）至少每二年集會一次，每次開會數星期。在休會期內，大權則實握於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約六百人每年集會三次）。而以此會之主席團實際負責處理政務。主席團之行政幹部為一「人民委員會」（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s）政府各部部长俱為人民委員，其職務與美國之國務院相埒。人民委員會所屬各重要機關中，「國家設計委員會」即居其一。而總其大成，支配全局，操蘇俄一切權力之大原者，則為共產黨。

國家設計委員會之構成，非常複雜。簡要說明，決難了解。即以圖案指出此會之各部份及

其本身對蘇維埃其他各機關之關係，亦無裨於事。祇須泛論一二，以消除吾美人士之誤會，斯可矣。吾人每以爲此委員會者，不外由經濟專家十數人居莫斯科，運籌帷幄，懸擬若干發展蘇聯經濟之方案。實則實際情形，並不如此。蘇俄設計機關乃一極其廣大之組織。窮鄉僻壤，無遠弗屆。莫斯科有蘇聯設計委員會（All-Union Planning Commission），每一共和邦（蘇聯共有七個共和邦）及較重要之自治區域（autonomous republics and areas）皆各有其設計機關。卽下及一省一地亦不乏負責設計之人員。至於政府各部以及實業文化機關，更各有設計之設備。各級設計委員會與各級蘇維埃，共產黨部，代表委員會，工會，及各種規模經濟社會事業間，溝通密切，打成一片，通力合作，遂形成蘇俄之複雜而完備的設計制度。宛如教育人民之學校，或維持秩序之警察焉。

欲知設計制度之工作與目標，觀乎莫斯科中央設計委員會之組織，卽可得其梗概。約言之，該會可分爲四大科。第一科主管基本問題；如生產之計劃，資本之支配。本科又每分爲若干股，分掌運輸，農業，製造，採礦，化學，伐木等項。第二科負責蒐集統計，經營各項會計，並研究國內

外商業之趨勢。第三科職司研究現時經濟組織之缺點，而謀整個生產制度之改進。第四科統籌勞動文化，科學範圍內之重要問題。其工作之重心，在使經濟上效率之增加，有以裨益社會與文化。俾生產方法之成功，不徒結果於市場之爭奪，庶幾民衆之精神生活得以協謀改善，革命之努力爲不虛也。

各地設計委員會之組織與職務，與中央設計委員會大體相同。祇各因其所在地方工業或文化情形不同，而各有其特色。至於基本工作，則均爲搜羅材料，編製統計，根據研究所得，計劃改革社會經濟之組織，使日近於革命之理想。以其組織嚴密，故能智力集中，各就其經驗學識一致戮力，戰勝艱難，解決各項問題。

一 普遍計劃之釐訂也，其工作至爲複雜費事。蓋一舉一動，動輒牽涉各方，不得不統籌全局。譬如欲動員全國勞工，又不能不注意全體勞動者之革命的自負的心理。集會討論，不厭煩。當「五年計劃」始議之際，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至翌年一月兩個月間，蘇聯全體大會共集會十六次。小規模之會議且不知若干。審慮周詳，而後定計。計定矣，工作開始矣，委員會復時時

注意工作進行之狀況，並就經驗所得，隨時補充或修改其原來計劃。

雖然國家設計委員會亦祇規畫大綱而已，精密之具體方案，則由各主管部份分別負責詳擬。農業，運輸，郵電，勞工，工商，財政，教育，衛生，社會公益等機關，各就其範圍擬具辦法及施行之步驟。分工合作，而後由中央設計委員會提綱挈領之大規模計劃乃得實現。此中曲折，細考最高經濟議會 (Supreme Economic Council) 之任務，即可明瞭。

任何宏大計劃之推行，最高經濟議會負責任最大，該會之地位與職務與政府各部同級，於工業各項舉凡煤，油，礦，電，化學，木材，紡織，矽酸鹽，食品，皮革等等則一併兼管。該會責職既如是繁重，為便利工作計，分組全國工業（手工業除外）為大托辣斯六十餘，較小者若干。指揮調度，以經理蘇俄之整個工業。

各種普遍計劃，國家設計委員會祇擬具綱領，上文已經說明。具體細目之釐訂，即由此最高經濟議會任之。該會製成之方案，通稱「工業財政計劃」 (Promfn plan-Industrial Financial plan)。內容包括各項工業，詳列全國工廠礦山。自設計制度創行之初至「五年

計劃」之第二年度終結，此種計劃，大率由上級機關主定，各處奉行而已。一九三〇年九十月間情勢大變，影響於設計之方略者頗為重要。蓋是時增加生產預算，速成「五年計劃」之運動，轟動全國。全國工人皆先後自動負起設計之責任。彼輩以已成之計劃為根據，就經驗所得，建議相當修改。設計之事，遂一變而由親與工作之人，以實際生產成績指數為權衡，參加意見。影響所及，勞動者工作興趣益濃，生產速率大增。

國家設計委員會之實際工作若何，詳審「五年計劃」即可了解過半。該會自一九二五年來，固已每年於編製工業主要數字之中，研究一年之方針。並屢提出精心結構之計劃。然而規模之大，目標之宏，當以一九二八年十月公佈施行之「五年計劃」首屈一指。運全民之力，量開發展之新途，心理之改變，更有不可思議者。此一計劃成功之日，不僅國內之情形，多所革新。在國際之林中，蘇聯之地位且將大異於今日。行見世界各國革命運動之立場愈固，進展愈速矣。

五年計劃草議之初，共擬有小規模的與大規模的兩個不同之方案。前者懸擬五年之內

收穫不佳資本主義之國家不肯投資，建設之困難或為預料所不及，全國收入之大部份且須耗費於國防。後者則以樂觀的態度預計五年年年豐稔，與各國間經濟關係進步，建設之工作進行便利，軍備之支出大減。然而其根本之立場固無以異也；二者之目標同為全國之工業化與農業之集團化。即公共收入（尤注意於收入之用於平民勞工階級者）之支紀，亦具有同樣規模。所不同者，二者預計發展之速率不相等耳。是以小規模者可謂為大規模者之縮本。質言之，即在前者逆環境之下，預期於五年之計劃，非六年不能成就耳。

兩種方案最後同時提出於黨政當局，待其裁奪。考慮結果，決定採取大規模之計劃。下文所引各項數字，即將以此為根據。其小規模之方案，今後僅供歷史家之低徊而已。

統觀「五年計劃」之各端，其主要大計，厥為全國迅速工業化與徹底的依社會主義改造農村。其他目的雖繁，要以二者為全部計劃之主幹。蘇俄領袖鑑於以往相與資本主義國家之困難，且恐彼此關係，一時難期進步，深覺欲謀革命本身之鞏固，勢非發達工業不為功。而於所謂重工業者，尤為關懷。俾能自製生產工具，不致積久淪為西方資本主義之農業的殖民地。

(agrarian colony) 設不幸發生國際戰爭，更非平時預謀有素，設備周全，戰事所需之科學利器，有以自給，不能制勝。居今日之世界，非工業發達之國家，固不足圖存也。

蘇俄領袖汲汲於建造工廠鋪設鐵路設立電氣事業，更有一主要之動機焉。彼輩堅信非在工業主義環境之下，不能產生建設社會主義國家所必不可缺之心理。列寧嘗云：

「以為凡工作之人無不同具建設社會主義之天賦者，皆遠古人士及馬克斯以前社會主義家之幻想；此種能力並非一蹴即成，而乃與時俱長。且必須有大規模資本主義的生產為其背景。祇有身居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之過程中之勞工階級，具此能力。」彼輩上溯宗師，輒引此為立論之根據。是以其工業化計劃之作用，不僅在對異邦之資本主義樹立防線，且致力於消除私有財產與小規模生產制度下之個人主義之傾向也。

依社會主義改造農村，亦屬同一目的之另一方面之努力。蘇聯苟仍如昔日長為單純的農業國家，農國人民又固守其個人主義之經濟，則建立社會主義國家之企圖，將終不可能。蓋此種情形不變，社會心理不能統一，而資本主義之勢力，每佔優勢。故在五年計劃中，共產黨人

從根本着手，進攻敵人立足之大本。一旦大功告成，非但農業生產之方法變更，農村民衆之性情心理，均將根本迥殊乎往昔。是誠有史以來，意義重大影響深遠之一幕也。

農業集團化，亦更有充分經濟的理由。革命以後，農產分裂。農戶從一千七百萬戶驟增至二千六百萬戶。田地分割之結果，農業經濟之效能慘落。農事機器，不能採用。且多有田不耕，終致生產激減。當時挽救之途有二：一則政府扶助富農，獎勵私人企業，借以款項，使生產增加；一則政府與中下貧農聯合，打破富農階級（Kulak）之勢力，組織集團的國營田制，竭力近代化農業生產之方式。前者與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之政府既顯不相容，蘇俄當局祇得努力於第二條路從事農村集團化。

吾美人士多以為「五年計劃」祇顧經濟一端。其實不然。社會文化各方，亦有不少重要之設計。本文所及，僅能就其原本，略舉比較重要者而已。經濟方面，預計全部國營工業生產增加百分之一百八十；重工業百分之二百八十，輕工業百分之一百四十四；電氣產量由每年五十萬萬增至二百二十萬萬基羅瓦特時（Kilo watt hours）；石油由一千一百萬增至二千

二百萬噸；煤由三千五百萬增至七千五百萬噸；生鐵 (pig iron) 由四百萬增至一千萬噸；機器產額增加四倍；化學肥料由四十萬增至八百萬噸；農產品增加百分之五十六；耕地增加百分之二十二；將六百萬農戶組成集團農制，共有田六千五百萬英畝；五年之內，投資一百萬萬盧布於運輸事業；建築鐵路一萬七千公里；汽車由二萬五千增至三十萬輛以上；開發農、礦、森林、燃料之富源，範圍遍及外倭爾加 (Transvolga) 烏拉爾 (Urals) 喀山斯坦 (Kazakhstan) 西伯比亞 (Siberia) 外高加索 (Transcaucasia) 及遠東諸地；五年之內，減低工業生產成本百分之三十五；增加勞動之生產力百分之一百一十；用於各種公共建築，六百五十萬萬盧布。

在社會與文化方面，五年計劃努力推行每日七小時工作於各種工業；提高名義工資 (nominal wage) 百分之四十七；實際工資 (real wage) 百分之七十一；減少失業工人百分之五十以上；大事增多醫藥設備與醫院；社會保險之費用，由每年九萬六千七百萬增至十九萬五千萬盧布；教育十八歲以上三十五歲以下者一千八百萬人識字習書；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間實施全國普及初等教育；圖書館自兩萬三千增至三萬四千所左右；徹底推

廣電影，無線電，書報，郵政，電報以及各項成人教育工具之事業；迅謀中等，專門，高等學校之發達；訓練工業，運輸及各種建設工人二百萬人；灌輸農事基本常識於五百萬農民；預備農田中所使用之司汽拖車者二十萬人及修理機器匠五萬人；訓練工程師六萬人，專門技士十二萬人；造就中上等資格之農業專家五萬人；訓練高級教師五萬六千人，低級教師六萬四千人；養成醫師一萬八千名及中等資格之醫約及藥劑人材四萬名；訓練大批公共經濟專家；並普遍的改組職業專門教育制度。

俄羅斯之科學文明，本屬比較落伍。加以大戰之後，繼之以革命，困之以凶年，國力凋敝，竭蹶已極。「五年計劃」，蘇俄領袖每自稱為偉大工作之計劃，信不誣也。蘇俄富藏豐饒，面積佔全球陸地六分之一，有人口一萬六千萬。五年計劃，統籌全局，為偌大開發之企圖，謂為古今社會最大之試驗，誠非過論。至於施行經過如何，將來能否成功，則非三言兩句所能論列。下文將擇比較重要諸端，略述其得失成敗與其影響之所及。

實施開始以後，第一年即有驚人之成功。大規模國營工業之生產總額，預計較前一年增

加百分之二十一又四，乃結果竟達百分之二十三又四。次年之標準遂提高至百分之三十一又五。他若資本之建設，貨物之運輸，工人人數，平均每月工資，每日工作時間及國家收入總數等，無不成績優異。農業社會主義化之計劃亦有良好成就。至一九二九年十月，已改成集團化之農田計達一千一百八十萬英畝。原來計劃，固僅希望九百三十萬英畝也。

然而別一方面，亦不乏重要之失敗：紡織，皮革，橡皮，製鞋等業產額雖增，而質地大壞；同時生產費雖見減低，仍未能達到原定之數字。凡茲成績不佳，一部份實原於勞動生產力之增進未能如預期之速。（原計增進百分之十七實際祇得百分之十五。）農業方面，尤最令人失望：蓋預算生產增加百分之四·四，結果僅得百分之一·八。耕地更少於預算百分之三。幸而農產品之登諸國中市場者則稍稍超出於預料。

第一年大體成績既然優良，第二年之標準數字頗多提高。共產黨人復發表四年或四年半完成「五年計劃」之說。每年重訂來年標準之舉，且使一般人無從捉摸將來。外國人士則更陷於迷離惆恍之境。蓋似此隨時改變，所謂五年計劃者，其實際行將如何，無人能為肯定之論。

斷或推測矣。

第二年之經過，形形色色，如火如荼，令人興奮；一方面革命力量非常勝利，另一方面，復遭遇不少挫折。蘇俄出版物中，每宣傳「五年計劃」四年可以完成；同時則充滿成績落後之記載。失敗之實證，既所在多有，幾使世人懷疑全部試驗之危機，已在眉睫。是以吾美報章雜誌亦時謂蘇維埃政府不能維持，時謂蘇俄工業不久即將囊括世界市場。實則矛盾分歧，莫明究竟，固原於蘇俄當局故弄玄虛之策略。而蘇俄施行計劃之周折，全國奮鬥之艱辛，亦借此可以想像。其所以衆說紛紛，莫衷一是者，更多由於對原來方案與修改後之當年標準未能辨別清楚耳。

自一九二九年十月至翌年十月此一年中成就多端。農業集團化運動，激盪全國農村；富農階級逐漸清除，革命勢力益深入農村民衆；土西鐵路（The Turkestan-Siberian Rail-road）較原定計劃先一年告成，溝通土耳其斯坦與西伯利亞二大區域，添闢居留地域甚廣；福特汽車工廠新建於下諾佛哥羅（Nizhni Novgorod）附近，其他各種創始之事業，亦遍

於全國；大宗穀類之輸出恢復；木料煤，石油等銷售於國外市場亦日多；稍有一技之長者，皆無失業之患；再訂普及初級教育之策，超越原來計劃者兩年有半。

然而此一年中，不如意事，亦復甚多，農民見共產組織終不可免，幾盡殺其自家之畜；斯丹林格勒（Stalingrad）之製造耕田汽拖車大工廠，管理謬誤；需要繁重，運輸制度不能適合；工人時或遷徙於此廠彼廠，時或復歸農村，碌碌不得休息；現金窖藏，盧布有日趨膨漲之勢；食物與製造品日少，城市居民之生活標準日低；限制消費（ration system）愈行愈廣；蘇俄輸出，影響世界市場，歐美益見驚愕；世界經濟衰落，輸出產物，售價驟少；尤為嚴重者，則七八九三個月中生產突見滯緩。

吾人細心分析第二章之工作，即知建設之進行，各方面甚不均衡。農業部份，成功特著，一瀉無前，幾至不能駕馭。一九二九年暮冬起，在肅清富農階級口號之下，集團化之運動，勇往邁進，大有羣衆運動之觀，遠出農民意想之外。成功數字，與日俱增，熱心份子，至謂農業集團化之全部計劃，本年即可竣事。

改造農村之運動，既盛極一時，影響所及，農民之階級鬭爭愈尖銳化，反對宗教之運動愈烈，革命之前鋒自城市移轉於鄉村。三月二日斯丹林在報端發表一公開函件，標題曰「成功之迷眩」(dizziness from success)。旨在對一般狂熱從事工作之徒，加以一帖清涼劑。漫天風雲，始漸消散。然而五年計劃，已被超過。集團化之農田計達八千五百萬英畝。居全體耕地四分之一。而預期於一九三三年者，祇全體五分之一耳。同時國營農田亦漸增至一千萬英畝以上。農業如此改革之結果，耕地約增百分之十，生產約增百分之二十。故經此計劃之第二年後，蘇聯之農業生產，面目一新。

工業生產之發展，似不及在農業方面之洋洋大觀。成績雖超過原定計劃，而增改之標準，則未能達到。原計劃規定較第一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一·五，改定之本年標準為百分之三十一·五，實際所得則為百分之二十四·二。準此推算，一九二九——三〇年一年之全部工業產量比一九一三年約增一倍。原定計劃中煤產預計增加百分之十三·四，本年實得百分之十七·六；石油預計百分之十二·一，實得百分之二十六；生鐵預計百分之二十二，實得百分

之二十四；捲鋼預計百分之十一·一，實得百分之十四·五。石油、紙、皮革等之產量俱超過本年之標準，煤及化學工業冶金工業數項，則不及。資本之建設，共用去三十七萬三千萬盧布。原來計劃，祇預計用二十三萬三千萬盧布也。

凡此種種成就，自屬難能可貴。惟就全體而論，固尙未達第二年之標準也。緣於本年度最後幾個月中，工業計劃次第之進行，大見遲緩。公共經濟方面，發生種種不均之現象。尤以分配糧食物品之管理不良，影響勞動之精神，致降低工作之效率。千百工人轉徙各地，企求較好之境況。其未能忘懷農村者，且更紛紛歸返家園，分享豐稔之收穫。

再則質不能隨量俱進，亦爲一大困難。工廠產量雖見增多，而所出物品，質地漸劣。勞動生產力，不若預期之進步。成本之減低，亦遲遲不能辦到。預期生產費可減少百分之十一，而實得僅百分之六。斯時之盧布價跌，固大部份與此有關也。

在文化方面，第二年成功甚多。養成熟練工人專家及工程師之所，頗見擴張；用於民衆教育之經費，在美金十萬萬元以上。（第一年度用去七萬三千八百萬）公立學校之學生一年

中自一千一百九十一萬四千五百增至一千三百五十萬人；籌備於一九三一年年初實施初級小學普及強迫教育，剷除不識字之工作，有甚大之成功。他如出版書籍，擴充圖書館讀書室，廣設電影無線電台等亦莫不大有成績。而於醫藥設備尤注意使之廣使民間。

第二年結束之後，規定經濟年度即依曆書年度而終始，不復別區月日。於是一九三〇年之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羣稱為特別興奮時期(Shock Quarter)；同時對第三年之標準，更為狂熱之提高，工業生產預計增長百分之五十二，重工業增長百分之六十二，輕工業百分之三十七；農業方面，播種面積預定增加百分之十二，集團農田增加百分之二十，國家農田增加百分之五十。其他各項亦均預期同樣之增進。

「興奮時期」中，重要行政之位置，頗多更迭發生厲肅勞動紀律之普遍運動。再度審查「五年計劃」，考究入微，詳察其緊要部份及弱點之所在。一言以蔽之，是時全國實逞一種前此未有之戰時狀態。挑選強壯之人，分任經濟要職。前此工作成績欠佳者，分別停職降級。經此一番變動，昔日之弊端，矯除甚多。然而所得成績雖均超出原定計劃，仍未能達本期之標準。祇

有石油生產，實如人望。煤、生鐵、製造機器、貨物運輸等項，則結果最劣。

一九三一年之情形不若上年之興奮緊張。蓋蘇俄人民於胼手胝足提早完成五年計劃之奮鬥，已漸習而安之。本年上半年之總成績此時尙未發表。然而已知之事實，頗關重要者，亦可略舉數端。五年計劃中之石油生產，本年四月初即告成功。耕種地面積之推廣，亦已辦到。六月一日爲止，全國農戶百分之五十二·七盡成集團化組織。此其影響尤爲深遠，可謂關於土地政策之紛爭，革命勢力，終獲勝利。各工廠以兩年半之光陰完成五年之計劃者，爲數甚夥。上半年中新廠站之開工者，計一百八十三所。蘇俄經濟專家且宣稱彼邦之製煉鐵砂，已優出英國之右，而石油及農業機器之產量，亦僅次於美國。工作重心，本年已見轉移。開始注意食住之情形，發展市政公用事業，並提倡製肉工業。是以農業方面於增加穀類之努力成功之後，轉而努力於肉類之增加。

在另一方面俄人亦自承其計劃中不乏窄隘未能暢行之處。基本工業如煤、鐵、運輸，俱感困難。並非成績不達預訂目標，實以全國方興未艾，進步神速，需要重繁，致嫌供給不足。最令人

感覺不安者尤爲管理與勞動組織之失策。此乃全部計劃最大之弱點，刻正採取有力方法以圖補救。正月間改良信用制度，使管理幹部確負事業之財政責任。六月二十三日於工業領袖人物會議時斯丹林作極重要之演說。其對於工業之影響，不亞於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報端一函之影響農業。斯氏諄言，必須增進勞動組織之效率；速謀方法之機械化；廢除同等工資之原則，使技術能幹聰明各得相當之報酬；工資以工作成績爲標準；確定經管理者之責任；工人之升遷不問黨籍；和緩工業界之階級鬭爭；對舊日之知識階級，改取妥協態度；各種事業一律採用嚴密會計。此乃斯氏認清事實之表示。腳踏實地，因環境而謀適應，大政治家之風度，有足多者。然而斯氏之發爲斯說，絕非屈服於資本主義也。共產黨人固猶於政治社會各方，繼續分任要職焉。

此半年中，更有一重要之事件。卽任命五十九人成立委員會，擬具第二次五年計劃是也。時期爲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綱領之已可知者，爲繼續深刻徹底工業化之大計，而切實注意民衆之切身需要。國家設計委員會主席古比戚夫（Knibyshev）曾於一九三一年

奠定蘇聯社會主義經濟之根基，一九三七年必將完成社會主義之全部建築。」

此際吾人亟應關懷之問題有二：第一，初次五年計劃能否成功？第二，假定成功矣，影響於世界者若何？

第一問題之答案，如非一點美中不足，自屬正面無疑。各事經過良佳，惟管理 (management) 一端不能盡如人意。蘇俄領袖於提高勞動效能，減低生產成本二者，未能達到預期之成績。一着之差，儘可牽動全局。然而共產黨人亦深知此中利害，方以不屈不撓之精神，汲謀實事求是之救濟。觀乎彼輩以往應付艱鉅之設施，深信其終將覓得適宜之措置。故吾人可謂五年計劃必將成功。念其奮鬥之困難，且不能不認爲足以光耀當世之偉業。

至於蘇俄之成功，將如何影響於世界，則一時難以具論。綜合各家之觀察，僉以爲此後美國政府之對俄政策，將愈陷於進退爲難不可以久之窘境。就經濟言，蘇俄之成功，吾人殊無奔走驚駭之理。且按之事實，毋寧謂蘇俄果不成功，吾人反宜更有戒心也。彼邦輸出之物品售價高低，必視其自身需要之緩急爲轉移。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苟彼需要外物漸減，不需錢用，則自

家產物，漸將不肯賤賣。蘇俄與他國之貿易，亦可漸返常態。不過蘇俄國內市場，在若干年內，消受外貨之量，將繼續不變。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間之衝突，行且與日俱長。勢非雙方互有讓步，相見以誠，力予諒解，不能協謀合作互利之途。而五年計劃成功之後，第一顯著之結果，或乃資本主義之國家不得不承認蘇聯永久並列於國際之林歟。

二

居今日而欲對蘇維埃試驗之任何方面妄加評估，總不免於鹵莽臆斷。此歷史上第一工人共和國中（*The First Workers' Republic of History*）真相究竟若何，吾人所知者最多亦不過片鱗碎爪。若欲揣測各種勢力之潛伏力量，則在此綜錯複雜情形之下，無論智愚，均將無從捉摸。吾人儘可知某種勢力方興未艾，某種勢力日趨消滅。然而此中變遷代謝，究將如何表見於事實，則又不得確知。世人今日認爲可以左右一切者，或竟成一現之曇花。而今日所認爲無關宏旨者，且反將支配他日之一切。雖有預言家，亦歎無用武之地。思想觀念，在人類文

化中，本為最流動之原素。俄羅斯革命，啓思想勃發之機。各種思想，他日成熟，宏高偉大者或亦不少。革命運動，播下世事不變之種子，全世界胥受深遠之影響。歷史推演，隨時變化，難盡預測也。

資本主義國家之人，自幼所受之教育不同，使之觀察判斷蘇維埃之試驗，根本便不適宜。蓋其習慣態度思想性情既無絕對相反。價值之觀念，心理之典型，亦皆自成一家。偶來觀察，定多偏蔽。卽令竭力保持客觀態度，而成見既深，於不知不覺間，結果或適得其反。欲認識一種文化之真髓，必先具有同情與諒解，然後詳考其內容。並假用其價值之觀念，反觀彼道以外之世界。遊歷蘇俄之人，每有堅其心志，預防受欺者，此輩終亦毫無所獲。心理已先自界限，雖親履蘇聯國境，亦何異未出家門。以本身受之祖宗之標準，評衡他人之一切，自不能望其中肯。故自精神思想言，蘇俄共產黨人與西土一般人士，判若鴻溝，全世界不啻分爲兩個半球矣。

再則古諺有云：『羅馬非成於一日。』評斷蘇俄，亦須作如是觀。今之論者，則顯忘此訓。其評論共產主義之革命，幾與評論更改州吏選舉法同其輕易。以爲革命之效驗，三數年間，卽應

大著。而革命之過程，亦不應太殊於彼輩之所習。此種見解，實乃荒謬可笑。不知此番革命之目的與工作，爲整個社會之徹底改造。社會激盪，感情憤張，三五十年，絕難平復。其所產生之種種思潮，意義如何，更非百年以後，不能充分領略。吾人祇有就能力所及，以正當眼光研究之而已。雖然，評估蘇俄計劃固甚困難，吾人至少亦須努力一試。無論如何，予所認爲不可忽略之點，予將一一指出。關於將來者，亦將稍加推測。因此乃頗有趣味之工作，從事於此者，大有其人。然而予之言論，予自身每亦不能深信，不敢自認爲不磨之說也。

予於下文所論列者，可分四部：（一）就現狀指出前途比較重要的不可測之事勢；（二）略述對於蘇俄計劃不利之環境；（三）略述對於蘇俄計劃有利之環境；（四）研究普通對於設計經濟之批評。

人有旦夕禍福，天有不測風雲。不測之事，足以影響五年計劃之成功，或革命勢力全部事業者，所在多有。第一爲天時：蘇俄國中現時尚無相當儲備，倘遇旱潦疫癘，迭生災歎，則結果將不堪設想。蘇俄迄今仍繼續以農立國，百分之八十，仍屬農業。全國繁榮，端賴農產。今日努力於

工業化之際，尤不能不恃農產爲挹注。蓋發展工業所需之機器，多購自外國。國外信用未立，不能通融。祇有輸出農產以資抵補。所幸俄國土地廣大，新闢之耕種面積，增加頗速。此層危險，或可漸減。

第二，爲國際戰爭。苟發生對外之戰爭，雖規模不大，結果亦可債事。蓋一至戰時，全國人力財力均須改作不生產之用途。今日之蘇聯，實際毫無剩餘物品。全國動員，祇得停止建設。爲維護「五年計劃」起見，蘇維埃政府不得不悉心企求和平。是以共產黨領袖人物，每值國際失歡，輒不禁憂慮戰雲之或佈。蘇俄之重工業一日不確立，必且委曲求全，不輕啓釁（根深蒂固以後，則不可知矣。）

第三，爲世界經濟狀況。現行之建設計劃，根本預期資本主義暫時可以安定。各種工作之進行，且依賴資本主義國家之工業產品及專門技術人材爲之助。目下歐美之經濟衰落，雖可造成利於革命之環境，蘇維埃之幹部固深引以爲憂。蓋蘇俄產物之銷售於世界市場者，價值已因之大爲降落。一九二九——三〇年度最初九個月中，蘇聯之輸出增加百分之五十七，而

所得之價款僅僅增加百分之十七。據一般估計物價低落之結果，蘇聯損失於輸出者為百分之三十，而便宜於輸入者則為百分之十五。今日德意志國中，設竟發生革命，而致工業混亂，則莫斯科之當局，在戮力完成「五年計劃」之大前提下，未必歡忻鼓舞於吾道之不孤也。

三者之外，或可變生不測者，厥為共產黨內部之分裂。此時固無任何分裂之朕兆，然而獨裁制度之本身，卻時時不免瓦解土崩之危險。苟遇重要問題而意見紛歧，一黨平均分為兩派，則現時之政府，即將不能維持。黨基既倒，五年計劃之創始人，亦且隨之而失其指導之地位。所幸此事關係之大，人人盡知，破裂之禍，或可竭全力以避免。共產黨人更熟知獨標己見者，必被刑罰，黜革繫獄，甚或殺身故，亦不敢輕持異議。加之建設計劃，次第實施，事實之成功，亦足使黨內益加團結，共謀鞏固本黨在國中之領袖地位焉。

全部問題中所最不可知者，更有關於人類天性之一端。一百五十年來經濟學家明白曉示於吾人曰：「私人企業為發展工業唯一之合理途徑。而私人企業之動機，必不離乎利。」蘇維埃經濟學家則力持異說，謂前人對於人之天性，不免誤認。如果教化得宜，人類為公眾為社會

亦未嘗不能如爲私人爲一家之努力。至少社會上優秀份子所期望之報酬，不必全屬於物質。進一步言，集團主義對於發達羣衆力量之適宜，遠在資本主義之上。蘇維埃心理學家則更謂俄國兒童之自我根性，似較美國兒童爲弱。共產黨人刻方假手於全部教育制度，欲依據集團與共產主義之精神，範型人性，能否成功，此時尙難逆料也。

蘇維埃試驗工作之進行，首須應付若干不利之環境。而以國中文化程度之低，最爲棘手。革命初起之時，全國成人中不識字者，約佔百分之七十。馴至蘇聯全國動員之努力，受絕大妨礙。當力謀整個經濟界迅速發展之際，仍須耗費巨量精力於教練數百萬成年男女讀書寫字，以及學習簡易之算法。他若衛生、科學、政治常識，民衆亦均苦缺乏，亟待灌輸。國民文化程度之提高，本亦艱鉅之事業。乃與極大規模之經濟建設同時進行，互相連鎖。世人對此雙管齊下，輒疑其能否成功。然而共產黨人固時發爲樂觀之論，謂促進人民文化程度之合理方法，惟有使其負起社會改造之責任，最易收效。

國中文化程度固低，人民之專門知識與技能，亦均在水平線下。故此時蘇聯之設備，較之

西方工業國家，真可謂可憐已極。然蘇聯竟毅然開始發展整個經濟之工作。其進行之速，即最先進之國家，亦不敢望其項背。一九二八年五年計劃行之初，蘇俄產業界之工人，熟練者祇佔全體工人百人之四十一·三。同時在德國則有百分之六十二·六。蘇聯所有工程師，佔全體工人萬分之三十七，與德國之萬分之一百卅八較，相去更遠。故就事實言，以一生活於古代農業之民族，對近世機器，幾乎毫無認識，乃希冀於二三十年中，一躍而完全入於機械時代之境界。蘇俄工業迄今猶未能做到減低生產成本，增高勞動效率，及改進貨品之質地如五年計劃之所預期，又何足怪。此等事業，絕非政治壓力所能強致。必俟教育徐徐收效，後進青年，日黨渥於工業文明之習尚，而後水到渠成，全功克竣。

一班革命領袖，於奪得政權之時，大都缺乏專門職業之訓練，不足供建設新社會之需。蓋彼輩雖能指揮革命，攻擊沙皇，而於工廠之設立，鐵路之建築，礦產之提煉，以及管理之科學，皆茫無所知。以致帝國時代遺留之幼稚工業，大部份亦不得不倩外國人代為經理。凡此各種學問，共產黨人故皆一一從頭學起。分遣大批留學生，至資本主義各國，研究近世工業農業之精

徵。一方面復大舉延致外國專家，使出其學識經驗，協助蘇聯計劃之進行。

經濟組織之全體，深染忽視做事效能之積習，亦爲工作進行之障礙。此固由於上文列舉之原因，如文化低落，專家缺乏，管理無方等等。加之機關政治及社會主義之流弊，創造能力，既大受摧殘，商業手續更日趨煩雜。蘇聯通國中，幾無一事能敏捷作成。數分鐘可了之事，必遲至數小時；數小時可了之事，必遲至全日或數日。結果無聊的守候，直變成最普通職事之一門。俄國人民，顯未知光陰之可貴。夫不皇皇於惜時，未始不令人豔羨。然農業文明下之從容暇豫，絕不適宜於工業文明也。共黨當局，感覺此問題之重要，刻正竭其全力，思有以掃除機關政治之流弊，提高行政之效率。一九三一年六月廿三日，斯丹林對工業管理會議之演說，卽爲此種努力具體方策之說明，增進勞動效能，確立工業管理者之責任也。

階級鬭爭精神之不懈，使全盤狀況，益陷困難。自五年計劃實施，且愈見緊張。此種精神之表現，一部份爲馬克斯學說之結果；一部份爲革命初年智識階級反動之影響；而一部份更緣於舊日統治勢力與蘇維埃政府間在國內外不斷的衝突。保皇黨，資本家，地主貴族，大半參與

其列。以致整個經濟與社會組織，充滿猜疑與忌嫉。共產黨人，深恐技術與管理方面之高級專門人材採取怠工手段，稽滯建設計劃之推行。彼輩關於反革命事件之宣傳，固不免過甚其辭。而破壞新政府工作計劃之陰謀，事實上卻亦發覺不少。此類反革命之企圖，率皆嚴厲處置。加之舊時智識階級之地位亦多朝不保暮。於是專家工程師中之被視為舊時代之人物者，意志遂不免動搖。既感覺本身之不見信於當局，自不能致全力於工作。且不乏對圖謀推翻蘇維埃統治者，加以暗助。故非俟革命新智識階級產生以後，此種情形將繼續為工作成功之一大阻力。同時舊時代之智識階級非有工作成績之事實證明，亦難期當局所懷猜忌之冰釋。然而斯丹林氏之演說，對此久被嫌疑之階級，已有改變態度之切實表示。或者新舊間之隔閡糾紛，即將消滅於最近之將來歟。

資本主義各國（尤其是美國）之態度，對於共產黨之計劃，亦屬不利。所以如此者，自有其歷史的原因，而革命運動所給予資本主義社會之挑釁，亦應負大部份之責任。共產黨人曾以各種方法迭成難於應付之局面，激怒各種之政治當道。而此種策略，每多得手。譬如反宗教

之運動。美國報章所傳，固多誤解。然而即此一端，影響所及，亦足以延緩美國與蘇聯間正式關係之成立。再則姑無論實際如何，第三國際在任何地方之舉動，世人每認爲蘇維埃政府實負其責。吾人中之政治家竟有舉經濟衰落，麥價低跌，以及一切難於解釋之事統歸咎於莫斯科者。總而言之，各國之敵視，無論因何理由，對於五年計劃之成功，關係匪淺。如果在世界金融市場（特別在美國）能得鉅量通融，則全部計劃之進行，必能迅速而易舉。其及於國際貿易之影響，可益合於常態。

最後，蘇俄農民個人主義之習慣，吾人亦不能略不提起。美國農民個人主義之習慣最甚，各家食息於自家之田地，對於相隔不過半英里之鄉鄰，即懷疑懼之心。俄國農民，雖尙不至如此，而對於計劃之推行，亦增加扞格。在今日觀之，蘇維埃政府似可戰勝此點。能否到底順利，則仍難逆料。在如此短促之時間內，欲使全國農民不僅改換其生活狀況，且進而變更其對世界之觀念，能否辦到，殊堪疑問。然而若謂農民將終且返於零星耕種之舊觀，則又無人敢於輕信矣。

至於有利於蘇維埃試驗之環境，而助其成大功者，當首推領袖人物之勇敢。列寧固為歷史上最偉大政治人物之一。斯丹林之毅力，勇敢，誠直不私，腳踏實地，以及審度時勢之眼光，並世之西方政治家中，亦罕有其匹。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經過一番掃除功夫，各事刷新，為着手建設新制度之預備。故凡大膽的社會發明，特予重視。一時創造能力之發展與表現，突呈前此未有之盛況。計共產黨人之興革不能收效者自多，然總有一部份，必不至毫無結果。所有他種社會中因人類惰性或特殊利益之牽掣，不能破除之阻礙，將一舉而掃滅無餘，開社會前進之途徑。至於徒以其屬中產階級為口實，唾棄革命以前之制物如敝屣，過分集中於平民之權威，亦不免玉石不分，遺患於將來。然而蘇維埃之領袖固未嘗不虛心求益，極願借鏡於資本主義社會之陳義也。

設使蘇俄國土，大小僅與匈牙利相若，按之歷史前例，則領袖人物之勇敢，亦不能有大成就。蓋如此規模之計劃，必須地大物博，天產豐饒為之基礎。蘇聯則恰具此條件。蘇聯佔有全球陸地六分之一，約當美國二倍又半。此廣漠之國土，實為進行便利內爭之環境。如果俄國疆域

編小，革命組織，恐不數月間，已被撲滅。至於重要之富源，蘇聯幾乎樣樣具備。煤量雖遠遜於美國，亦足供給數百年。他如沃土，木料，泥炭，石油以及五金礦產之蘊藏，更屬富甲天下。國中各部，氣候寒燠不同，各種物品，均能生產。此誠天子作大規模社會主義試驗最適宜之園地也。重工業一旦完成，蘇聯儘可獨立生活。四境以內，人類文明之所需，盡在斯矣。

居住於此廣漠大地之上者，有一百八十二種民族。各族頗多人數稀少，文化低落者。然蘇聯人口之主要份子，則為斯拉夫族。任何民族之秉賦與潛伏能力，雖難隨便預測，就吾人所已知者而言，俄羅斯斯拉夫人之將來，卻無庸臆度。其富有建設工業文明所需之能力，已往事實，已足證明。或者行政方面之能力稍差，然而時勢造英雄，苟環境需要迫切，自能應機增進。以百年來俄國美術家與文學家衡之，可見俄人中亦不乏第一流之天才。且此一民族尚未受過任何文明之不良影響。所有一切原始之精華與創造之能力，其他民族已喪失者，彼仍保有之。其大有作為之時期，尚在將來。淺色人種中未經展布之才智，至今日亦以斯拉夫族蘊蓄最富。加以蘇聯含有各種不同之民族與文化，再得政府寬大政策之孕育，整個文化之內容，當可日

臻充實。是建設新社會之前途，大可樂觀也。

俄人素有謀而後行之習性。蘇維埃領袖認爲此足給予新計劃莫大之便利。國家設計委員會集中全國人材，研究如何組織及發展全國之資源，可冀免除資本主義制度下物力之虛耗。開發天然富源，必以羣衆之利益爲目標。不以少數人之私利，而從事於浪費之生產。產業界學識之探討，亦當循整個計劃以社會全體之福利爲正軌。不似私人競爭時祇顧一己之如何獲利，偶於事業有所心得，諱莫如深。據蘇維埃經濟學家言，新制度成功之後，一切發明將不再犧牲公衆幸福以保持私人利潤；實業界不致循環發生恐慌，造成數百萬人之失業；無花費巨額金錢之廣告，使不生產之職業增多，而多數人日趨於奢靡之生活；無游資，社會少無益之負擔；經濟無失調之現象；專門人材，絕無失業，一般人民不致受事不得人，學非所用之損失；無股票交易所之投機，信用少一消耗；幹才全從事於生產事業，不致發生夢想暴富之心理，目辛苦勤勞者爲愚人；無競爭世界市場之事，國與國間，無由互相仇視，經濟不相爭雄，不致有武力衝突，使文明成績，付諸戰炬。此固極端樂觀之論調，然而心雄志壯之設計，有近代專門技術爲之

工具，器既利矣，前途未易限量也。

蘇維埃政府更努力組織與計劃科學之工作，此舉亦有甚大之意義。刻正詳細研究科學之各部並籌劃研究之程序及研究學院之設立。是以將來關係全國生活之問題，無論遠近，將不再聽命於天。學術研究機關不似在其他國家得享自由。甚至科學家個人之研究，亦須受整個計劃之範圍，力求於大計有所裨益。惟共產黨領袖之目的，亦並不在目前膚淺之實效。蓋深信彼等包羅廣博節制得宜之研究工作，在與資本主義競爭中，將予社會以極大之利益也。

教育與社會設計之關係日臻密切，蘇俄當局亦認爲新制度建設上之一大助力。在一方面，推行任何建設計劃之主要工具，厥爲一大規模之教育制度。學校以外，社會各種文化機關皆屬之。在另一方面，已經釐訂之改造社會程序，對於教育之方法與作用亦有深遠之影響。蘇維埃學校與生活之關係密切，爲今世各國任何學校所不及。學校師生一體參加於社會有用之勞動，協助新制度之建設。高級學校，且各使之負責實施職業專門訓練。工作出於指派，無從規避。各學校及其他文化機關之計劃，均根據於國中在最近之將來職業需要如何而製定。學

校與社會既時處處互生關係，教育乃得不流爲奢侈品或兒戲，庶幾實成社會所不可少而必須鄭重將事之工作矣。

俄羅斯終帝制政府之時代，經濟狀況比較簡單。此點或亦予共產黨人以相當便利。彼輩設計之一切計劃，可於便於管理情形之下，先從小規模着手做起。一方面經濟組織滋長擴張，吸受近代專門學術爲用，其設計之機關與方法即可隨之蛻化改進。如此日積月累，籌劃與控制近代工業經濟之龐大複雜制度，可以漸次完成。設令吾人今日欲在吾人之社會中，引用一種經濟設計制度，則似覺困難得多。蓋所需之組織，已將極其複雜，不能人盡了解。各種特殊利益之存在，更必阻礙經濟調節之施行。且舊式之農業經濟組織，頗能擔當風浪，蘇維埃領袖儘可摸索嘗試若干年，不至有全盤崩潰之虞。吾人今日之情形，不能容許也。

共產黨人更謂在建設中之新組織，其道德基礎之超越，實爲至寶。全體社會各方之力量，皆集中努力於民衆之中心問題。即以五年計劃爲例，所有各項計劃，果即成功，任何個人，絕不能因之致富。暗中貪污者，自爲例外；然而除非埋寶於地，或輸存國外，在在有被發覺之危險。一

且事露，即逮捕其人，審鞠處罰。蓋全部建設計劃之中心目的，本為改進大多數之生活狀況，非欲供少數人發財之機會也。此一大國家方努力於盪除貧窮，解決失業問題，免除老病之苦；減少每日工作時間，提高生活程度，並使人人得享醫藥之便利，救濟不識字，破除迷信，普及教育機會，使文藝科學為大衆致用。具光明正大之目標，故能激勵全民，一致奮鬥，共策進行。各本良心而犧牲，故能一再犧牲而不恤。民衆付當局者以全權，當局者之精誠，復足以感動民衆。此中因果非偶然也。

數年以來，努力革命工作計劃之同志，其精神方面，誠摯之熱情，祇有歷史上宗教運動，差可比擬。共產黨人及其民間之信徒，俱堅信彼輩之言行，不僅為本身自信之表現，亦且可以代表當世衆人甚至未來世人之共信。是以世之批評家，儘可謂其信仰謬誤，而對其忠懇正義之忱，則不容疑問。今日蘇俄國內，漠不關懷或痛心疾首於革命試驗者，固大有其人。而獻身革命之徒，則深信革命之思潮終將克服世界。自信既堅，奮鬥斯力。至於今日，彼輩已自視為人類力爭自由解放之工具。是否有當，姑置不論。其一往信深，則增益力量不小也。

世人對於蘇維埃計劃之批評，普通別爲四點：

- (一) 外國專家所指導建成之大工廠共產黨人將來恐不能管理得宜。
 - (二) 蘇俄努力企求者，不過爲吾人早已獲得之物質富裕。
 - (三) 蘇俄祇知崇拜機器。
 - (四) 社會設計之結果必至剝奪個人之自由，人類生活，亦將全受支配。
- 吾人且一一略加研究，作本文之結束。

外國專家所指導建設成功之大工廠共產黨人恐將來不能管理得宜之說，哈佛大學教務長鄧罕 (Dean Donham of Harvard) 已予以辯正。鄧罕氏之言曰：「俄羅斯訓練其勞工使用機器之工作固屬艱巨，然較之吾人欲訓練吾人中之商人通力合作以實現一普遍計劃，其困難似猶未及其半。」（予按鄧罕氏儘可謂欲使商人輩之思想言行，全以美國民衆之福利爲標準。）俄人不能管理新工廠之論，更使人易有一種印象，以爲獄牆以外，無俄國專家；或者爲某種原因，俄國專家並不參加目下之建設工作。實則今日蘇俄之專家與工程師中，大

多數固皆爲本國人民。至於有人且因此譏言，疑及俄人之天賦或有缺陷，不適宜於實際工夫。此等論調，毫無意識。蘇維埃於近代工業制度之運用在若干時期內，自必感覺困難。然而此亦有其文化方面之原因。與時推移，不久可望消滅。質言之，人類能學習而能之事，蘇聯人民俱無不能也。

或謂共產黨人今日舉國若狂之工作，吾人俱已早有成就。斯說也，自表面觀之，似有相當真理，而實際則大謬不然。一般見解每以爲經濟問題，吾人已得到解決，刻方在尋覓新世界而征服之。然苟一察今日之情形，即可恍然於此言之非確。時至今日，吾人或已日進於富裕之境。生產方面之成績，誠已巧奪天工。人類能用之物，亦幾無所不備。惟是何種社會制度，方爲善用此項能力之正途，舉世之人，尙皆茫然不知趨向。簡單言之，分配之問題，仍未解決也。今者共產黨人努力借助於吾人之技術而思以較好之方法爲社會用。雖在今日百難之中，無刻不縈懷於此後之措施，將如何推演此曠世無儔之經濟制度也。

謂蘇俄爲崇拜機器，亦屬實情。街談巷議，書籍報章，到處俱是關於機器之言論與插畫。偶

見一新機器焉，衆皆欣喜欲狂。學校以機器供主要研究。戲劇家以機器爲劇中英雄。舉國人民，更寤寐不忘於新機器之發明。然而凡茲如火如荼，蓋因蘇俄之人，咸視機器爲征服自然之途徑，人力借以勝天之工具耳。態度或竟近於崇拜，然返顧吾人通常對於吾人生活本源之態度，彼此實無大異。且共產黨人決無意於似吾人受機器之驅使，正在反其道而行，努力於使機器服從人類之意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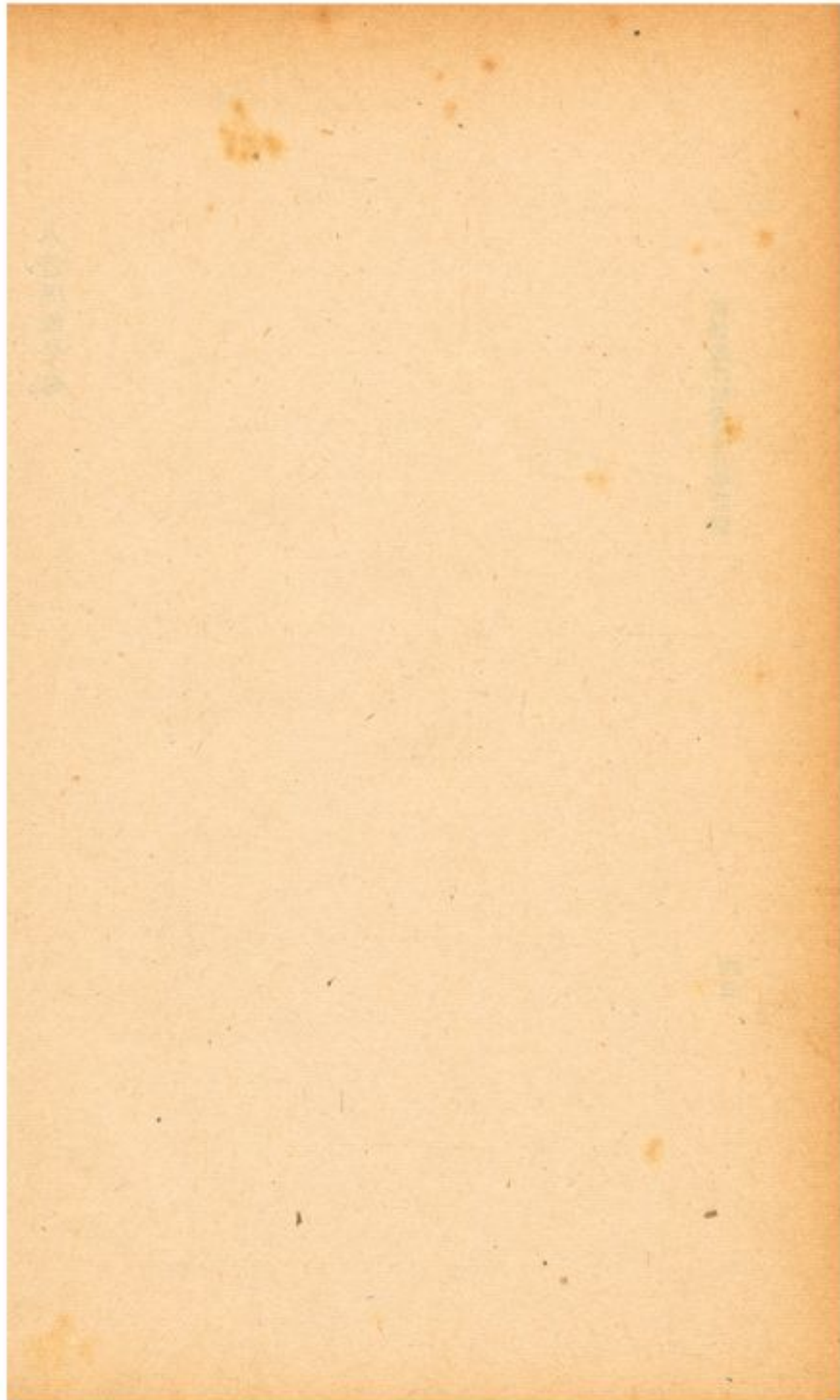
最後，有計劃之經濟組織，將否認個人之自由，支配人羣之生活，蘇維埃之經驗，確令吾人有此結論。「五年計劃」之推行，誠未能不侵壓個人之欲望與舒適。然此乃第一「五年計劃」也。將來若有第五次此種計劃，情形正未必與此相同。現時之計劃，乃非常刻苦環境之產物，故必採取非常刻苦之辦法以應之。各個私人本須有巨大之犧牲。一俟蘇維埃制度成功，增加生產之奮鬥稍稍和緩，生活之緊張自將漸減，各事可漸有把握。維護社會全體之利益，將不必定須犧牲私人之意志矣。吾人更當注意，設令美國亦擬具一「五年計劃」，則將與蘇俄之計劃，大不相同。吾人之工業基礎，已經完備。俄人之犧牲，在吾人俱可免去。吾人當前之問題，祇在如

何利用現有之工具以及如何分配經濟貨物於衆民而已。

所謂自由之問題，且須從另一觀點論察之。蘇維埃領袖謂吾人理想以爲可有之自由，實際上所有者並不能若是之多。彼輩以爲富人政治除外，工業社會中之真自由，乃係勵行設計與生活普遍調節之結果；換言之，空談人人自由，不能得真正自由。居積私產之自由，專事壟斷天然富源與生產工具，亦非自由之要諦。在工業時代之前，生活簡單，小家族大都自給自足。斯時所謂自由者，不外乎財產之保障，不受盜賊暴君或異族政府之束縛而已。至於今日，團體生活日進，所謂自由，已非就天然狀況以抵抗干涉而圖保守之謂。必賴團體行動以創造之維持之。蓋人類必須日益聯合，不僅僅爲保持秩序，且更當努力於普通之社會工作焉。至少社會全體必須負起責任，協謀所以滿足大衆之基本經濟需要，與夫建設普遍的物質安全。今日之世界，大多數人貧困病苦，失業恐慌於目前，衰老同人於日後，滿眼如斯慘況，復何真正自由之可言。凡茲種種工業社會之弊惡，如欲絕其根株，祇有組織起來，對於從來資本主義制度下之種種自由，加以確切之限制，庶始有濟。蘇維埃之設計制度乃其第一「五年計劃」所示於吾

人者固如是也。

蘇俄設計制度與五年計劃



汎繫主義之經濟制度

微拉里 (Luigi Villari) 著
林光激 譯

一 合作制度之起源

意大利之經濟概況，吾美留心國際情勢者，頗能言之。故茲所述，將限於一切與汎繫主義關係較深之問題，及其經濟政策與其他制度之異點，而尤注意於合作制度。以斯制之發展，已超出普通工會組織之外，而凌然成爲影響一切國家生產之經濟組織也。

在本次演講中，余將先敘意大利現在經濟制度之起源。以後即將以次詳述工團組織 (syndicates) 集合契約 (collective contracts) 及勞動糾紛之調解等等。最後乃條舉其主要之結果，及國家對於經濟事業所施政策之特徵。

意大利當中古城市勃興時代，工商各業，突飛猛進，即已有組織精密之行會制度 (guilds)，應運而生。此種組織在當時經濟上及政治上雖頗佔重要之地位，但殊不必詳述其內容。

以如是即將超出演講範圍之外也。且當時發生是種組織之環境，初不與今日者相類，如於此強舉其類似之處，在歷史上雖有相當之意義，而聽者反易誤入歧途，是則大悖原意矣。此外其他各國亦有相同之組織，吾人於此所當注意者，即在其昭示吾人，凡經濟發展之社會，皆有演進一二行會制度之自然趨勢而已。

十八世紀之時，個人主義之潮流，彌漫全歐，行會組織遂遭多方之抨擊。千七百七十六年，法相塔哥 (Turgo) 以行會組織 (matrixes of jurandes) 與時代精神不合，遂下令將其解散。雖六閱月後仍許其恢復組織，而革命政府於千七百九十年八月二十一日，亦有根據自由原則，許人民得不受公衆之監督，而爲任何集會之命令，顧當時反對行會之風，仍難稍抑，反之且有更形激烈之勢。卒也，革命政府恐人民濫用此種自由，而有罷工之舉，因而危及自由原則之立場，遂決廢止此種權利，而於千七百九十一年六月十四日，頒佈沙普利條例 (Le Chapelier Law)，徹底解散一切行爲之組織，並嚴禁雇主、商人、工人及各業工匠之集會。於是中古遺存之行會制度遂根本鏟除。同時他國受法國革命之政治及文化影響者，亦有相同之舉動。

沙普利條例實於工業革命及勞工集中現象開始發現之時，樹敵視一切工人集會之先聲。此敵視心理之孕育，一方乃由於革命之中產階級，懼下級人民之反抗；一方則由於一八一五年反革命之中產階級重登政治舞臺後，懼工人組織之援助由自主義及國家主義之活動；以斯二者固方發榮滋長於歐洲各國也。此兩種恐懼之心理，實皆為法國革命所倡法理之結果，其影響直至復辟政府之時，仍不少衰。

英格蘭於滑鐵盧（Waterloo）一役後，因無政府運動，已有星星燎原之勢，曾頒佈種種嚴厲禁止集會之法律。惟自十九世紀前半，勞工大騷動發生之後，是種條例即一一撤廢。同時工會組織亦有迅速之發展，其性質雖在早期為非政治的，並與社會主義漠不相關，但不久似亦沾染是種主義之色彩矣。

法國當七月帝制時代（July Monarchy），種種禁止集會之法律，及沙普利條例，仍繼續存在，且有雷厲風行之勢。至二次革命政府始放任工人，許其有集會之自由。厥後二次復辟政府，雖重申禁令，但奉行不力，視為具文，而事實上工人組織之行動，且較為自由。千八百八十

四年，瓦爾德克·盧梭法令 (Waldck-Rousseau law) 又正式承認工人及雇主有組合之權利，是時歐洲各國之社會法律，許工人集會以外又兼許雇主有組合之權利者僅此而已。

意大利之職業組合制度，發展較他國為遲，以其工業程度，當十九世紀初葉，猶在幼稚之時期也。蓋意大利煤鐵產量極少，其他原料亦多缺乏，水力發電制度，直至十九世紀之最後十年，始漸萌芽。當一八六一年，意國統一完成之時，國中規模之企業，寥若晨星，其最佔優勢者，惟小工匠階級。倫巴底 (Lombardy) 及其他一二區域，絲業雖較為發達，但規模尚非宏敞。鍊鐵工廠及機械工廠，國中各處，間或有之。那不勒斯各省 (Neapolitan Provinces) 之紡織工業，則因統一告成，境內關稅壁壘撤廢之後，北方工業較為進展之故，大受打擊。故該國工業，就全部而論，實佔一極不重要之地位。觀意大利帝國第一次統計年鑑之工業部分，僅佔三百地位，從可知矣。據此項統計，一八六四年全國資本之投入股份有限公司者，總額僅佔二萬七千萬元，投資於其他企業者亦為額不多。然則以工業如是幼稚之國家，職業組合固難望其有顯著之發展也。

意大利農業，在人民經濟生活上，似較佔重要之地位，但其組織仍為家族制，似無發展任何工會組織之餘地也。

意大利之有勞動組織，始於瑪志尼 (Giuseppe Mazzini) 瑪氏於該國之完成統一，認為宿願已償，而於共和政體之未能成立，則引為畢生大憾。故其晚年乃多致力於擁護民治之計劃，願陽春白雪，和者寥寥，其理想蓋末由實現也。此外氏又努力於較為實際之工作，為意國勞工草創工會，期於物質上道德上及精神上，促進其幸福，並使其瞭然於何者為良好國民之權利與義務。當時氏奔走國中，具宗教之威力，與愛國之熱誠，以周旋於勞工之間，願勞工乃鮮有諒解之者。曾幾何時，而馬克思之唯物主義，乃竟為其勁敵矣。馬克斯者蓋嘗以瑪志尼為「永生之老驢」(That eternal old donkey) 者也。故特遣巴苦寧 (Bakunin) 入意，思所以破壞其民權領袖之地位，而剝奪在其領導下之勞動勢力。巴苦寧既至，始則利用瑪志尼之引導，而得意國勞動界之信任，繼乃一方暴露瑪氏之弱點，一方宣傳其所謂勞動者之福音，於是彼敵視任何愛國思想，宗教觀念或道德觀念之馬克斯主義，乃廣播於意國之勞動界矣。

兩種思潮衝突之結果，瑪志尼卒告失敗，其理想亦全爲馬克斯之唯物主義所排斥，而莫由自立。瑪志尼至是乃心灰意沮，鬱鬱不得志以終；然彌留之際，猶慘呼曰：「嗟夫，與其見異端邪說之充斥，何如任舊與勢力之復燃；有此異端邪說，吾意其終不免有壓迫階級與被壓迫階級之分野乎！」（註一）

自瑪志尼死後，此所謂異端邪說者，果風靡於意大利。勞工運動隨該國之經濟生活，及工業之突飛猛進，而風起雲湧，盛極一時，其勢力不惟在工業界中佔重要之地位，同時且兼能操縱勞農，是則誠爲當時其他各國所望塵莫及者。惟意國之勞工運動，與英吉利不同，而其始盛終衰之故，亦即由於此。蓋其內容實含有政治之臭味，甚至與各政黨聲氣相聯，而此種政黨之目的，則不僅在促進勞工之地位，而兼在推翻整個政治之勢力，俾與其他各國有革命性之國際運動，立於一條戰線之上也。（註二）

實則此等政黨，當始露頭角之時，非無矢志改進意國勞工之經濟狀況者，即就當時該國勞工之狀況而言，亦實有改進之必要。惟組織未幾，即多變成純粹之政治組織，而忽視其社會

活動之初衷。故是時意國之工會乃皆束縛於一種非其自有之勢力圈中，既鮮能為所屬之會員勞工或整個之勞工階級謀利，而又被人利用為反對政府、王室、教會及其他國家機關之政治手段，其發展實為一畸形者也。顧社會主義者及革命黨人，為求獲勞工團體之擁護故，亦不能不餌以種種物質上之利益，如工資之增加，勞動條件之改善，及社會立法之改良等等。同時為達到以上目的計，並時領導勞工為大罷工之舉，甚或助以暴動之手腕，以期向雇主方面，剝奪種種利益。其力仍有不及者，則求助於政府及下院之非社會黨議員；吾於此特指下院者，以其為最高權力之所寄也。

當時勞工方面之要求，自純粹經濟眼光觀之，不惟多希望過奢之處，甚且有非經濟性質者；一般雇主為保障其自身之利益計，乃亦組織團體，以相對抗。結果，意大利國中遂發生一潛伏之內戰現象。工人常利用罷工，甚或為大規模者，為抵抗雇主之武器，其要求之對象，大抵為增加工資，縮短工作時間，及反對雇主之解雇某人，升擢某人，及雇用未入工會之勞工等等。至於承認甲會或乙會問題之爭執，則尤數見不鮮。同時雇主為謀對抗計，則利用閉鎖工場之辦

法，(Lockout)以抵制工人，間亦有求助於政府或國會者。此兩方混戰之結果，勝負固非專屬一方，而其弊害則一；質言之，當勞資糾紛未解之時，生產勢必暫時停頓，而使全體消費者（勞工及雇主亦在其內）俱蒙其損也。

同時罷工運動，亦波及於各種公務人員，如鐵路、郵政及各部院機關之人員等等。甚至有一部部長，因拒絕部員要求之故，而遂橫遭侮辱者。

抑勞資糾紛之對象，不惟為工資、工作時間，及以上所述各點已也，即節工機械之應用，及調解爭執之方法，亦常為掀起風波之焦點。至引起罷工之後，則參加份子，常因一二領袖激昂慷慨之演說，而即對於雇主或主管機關為激烈之暴動；一方為維持秩序故，又不得不求助於警察或軍隊，於是大流血之事，乃常常發生。此外，更有因與某某勞工團體取一致行動之故，而遂引起罷工者，其規模之大，常為一市、一省，甚或為更大之區域（註三）。然其阻礙生產，貽害社會之結果，則固毫無二致。同時又因意政府對於暴動之行為，每有讓步之表示，以致工人乃愈視暴動手段，為滿足一切合法或不合法要求之利器。

故昔日瑪志尼所興悲流涕，以爲意國人民即將分爲兩個敵對之階級，而發生極猛烈之內鬪，因而引爲殷憂者，茲幾完全實現。蓋是時革命領袖在勞動界間，所激起該級對於雇主及政府之怨毒，方之兩交戰國間之仇視心理，殆無多讓。以致社會問題及階級戰爭，乃佔意人生活上之重要部分，而使其有燃眉切膚之痛。顯當時控制勞動階級者，固一人數寥寥之工會也。

馬克斯學說入人之深，在意者甚於其他各國，其口號爲聯合全世界之平民階級，以與全世界之資本主義者，互相對抗。顧在意此國際化之運動，乃常以單獨對抗意國之資本家爲對象，凡他國之無產階級，及素常仇視意國之外國政府及統治階級，皆可認爲同志，而求其贊助。故革命領袖對於一切形式之愛國行動，俱認爲資本家壓迫勞動界之武器，而痛斥之，並努力於意國民衆之中，造成仇意之心理。

惟此種學說，非全意人民所普遍接受者，事實上常有若干區域，及若干時期，毫無猛烈之暴動發生。至農業方面則糾紛之發生，僅限於羅馬納（Romagna）、帕馬（Parma）、亞浦利亞（Apulia）、西西里（Sicily）一部，及其他一二區域，就中以羅馬納之農民狀況最爲優裕。

當時歐洲及其他各國，自難免無相同之糾紛發見，惟貧乏如意大利，經濟生活，未盡發展，生產及勞動者猶嫌不足，則復從而戕賊之，將何以堪。一八九一年，羅馬教皇利奧第十三 (Leo XIII) 曾於其 *Encyclica Rerum Novarum* 書中，倡階級合作之說，思以實現瑪志尼之理想，顧事實上未有成效也。

維時意政府抱不識不知之態度，對於勞資兩方，無所偏袒，對於工會亦若淡漠視之；如果有糾紛發生，則扶強抑弱，如雙方勢均力敵，則助其於某時期較佔優勝者。良以事實上，無論糾紛之焦點何在，彼財力雄厚，組織嚴密者，固皆可操勝算也。

在此經濟鬭爭中，有一點似為意大利所特有者，即同一階級之勞工，每因政治關係之故，乃分化為若干工會，非如曩者之祇有一種工會，始為非政治性質，嗣乃與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互相聯絡也。如當時之羅馬納以民主黨 (Republican Party) 徒衆最多，人等最難，因之該地乃即有民主黨之工會出現，而所謂土地之糾紛，亦多為黃黨 (即民主黨) 與赤黨 (即社會黨) 之爭。蓋以當時農民及小地主，每向工會租用農具，凡一種工作所用機械究應採用

黃黨者，或赤黨者，乃常引起劇烈之糾紛也。同時倫巴底 (Lombardy) 威尼西 (Venetia) 及其他各地，又有所謂天主教工會者，則為教士所組織，其經費由各處天主教教會及合作社分擔之。此外非政治性質之工會亦為數不少。此種工會派別之紛歧，每足以增大糾紛，而使各業勞工問題之解決，難以着手；有時且易為雇主所利用，而得坐收漁人之利焉。

二十世紀初葉，各種新趨勢即開始發現。社會黨中首先有一種反動勢力，反對中產階級，中大學教授，及職業專家之獨佔優勢，及革命領袖之純用議會戰術。其他各處亦有更為徹底之無產階級運動，努力使國社會主義之更為實際化，而減少其理論之色彩。同時工團主義，本所公認為極端之社會主義者，至是亦脫離社會黨羈絆而獨立，盛倡大罷工之說。其中鼓吹最力者為拉布利阿拉教授 (Professor Labriola)，以致一九〇四年九月，卒釀成全國大罷工之變，顧事實上此次罷工似並無特殊之目的也。在工團主義者之中，以墨索里尼 (Benito Mussolini) 為活動最力，故工團主義之元勳，法國該黨之領袖索勒爾 (Sorel) 嘗云，墨索里尼 非平凡之社會黨也。

社會黨中有態度較爲中和者，又自名爲改造黨 (Reformist) 以比索刺提 (Bisolati) 及波諾米 (Bonomi) 二氏爲領袖，其行動反對用暴烈之法。一九一一年以擁護佐力提內閣 (Giolitti Government) 非洲政策之故，乃成爲正式政黨，惟大戰以後即宣告解散。

與上述諸派同其重要者，又有國民黨 (Nationalist) 運動，其目的蓋欲與工團主義者殊途同歸，而以全國精誠團結爲原則，造一新經濟學說，期以促進全意人民之福利，而無階級歧視之觀念也。此種運動實發軔於二十世紀初年，在吐林組織之工團主義國民黨 (Nationalist Syndicalist) 成立之初即標二義：曰階級戰爭應以無損於國家之團結爲範；曰直接行動應以無敵視國家之原則爲衡。而詳細說明斯義者，則爲當時在文學界及新聞界中，嶄然始見頭角之科刺狄尼 (Enrico-Corradini)。科氏於階級戰爭之潮流中，獨創爲國家戰爭與階級戰爭合併之說曰：世界既有無產階級與資本階級之對峙，即亦有無產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對峙。意大利者無產之國家也，世界諸強，因過去意國之分崩離析，國勢孱弱，凡殖民領土原料來源及銷貨市場，俱握之不容染指；故今日意國應努力奮鬥，對於世界財富之爲諸強非

法獨占者，必插足而均分之。然欲達此目的，則新時代之意國人民，必求所以促進意國之聲威與財富之道，而全國各階級人民，亦非爲此共同之目的，努力合作不可。良以意國如非繁榮與自尊，則意國之無產階級亦將無從改進其經濟，與提高其道德也。

工團主義國民黨，雖熱誠流露，觀念純潔，願徒衆不多，亦無財力及強大之組織，爲其後盾，其所能感動者祇爲智識階級、勞動界及企業界，非其所能誘致也。工團主義與國民黨合縱之後，其領袖中有科立多尼 (Filippo Corridoni) 者，見階級戰爭不過爲混亂情形之繼續，乃以爲惟第二次之革命戰爭，始足以使意大利完全獨立。科立多尼與墨索里尼同，亦於世界大戰將次爆發之時，加入一九一四年六月之「赤色星期運動」 (Red Week) 期於資本主義及不忠實領袖之掌握中，解放意國之無產階級。大戰既發，科氏乃成爲熱心之干涉主義者 (interventionist) 加入在法苦戰之加里波的義勇軍 (Garibaldian volunteers) 及意國參加戰團，則又離法回意，服務意軍前線，以致竟死於軍。今日談意國汎繫黨者，皆以氏爲精神師祖之一云。

此外又有鼓吹此種新運動最力者，曰羅索尼 (Edmondo Rossoni)。羅居美利堅有年，爲僑美意國勞工團體之組織者。因與旅外意僑雜居甚久，深知非意國奮發自強，斷難提高其國外僑民之地位（註四）。此點凡在外意人皆有同感。至所謂融合同化之說 (melting-pot theory)，羅氏亦覺其難於置信，以當時美洲各大城中，各國僑民地位之不平等，及意國勞工地位之低微，因爲羅氏所目擊心傷者也。大戰發生，氏自美返意，組織意大利工團委員會 (Italian Syndical Committee)，爲一愛國性質之工團組織，亦卽爲後日意大利勞工總會 (Unione Nazionale de Lavoro) 之所由產生者。一九一九年春，墨索里尼組織汎繫黨，羅氏之工團組織卽與之締盟，因之汎繫黨運動遂發生雙重之意義，一卽一方以政治及國家之勢力，對抗激進主義及國際主義者之暴動行爲；一方以主張階級合作，反對階級戰爭之原則，組織勞工運動。質言之，其主要目的之一，蓋爲減削社會黨及共產黨反愛國運動中之勞工勢力也。

汎繫黨因有此雙重之色彩，遂予反對者以兩點攻擊之資：曰汎繫黨不過爲一種保守性

之反動派，思爲資本主義張目耳；曰汎繫黨不過爲變相之過激黨或社會黨耳。此兩點自有互相矛盾之處，惟持此說者往往爲知汎繫黨未深之人，或雖知之較深，而因爲反對該黨之成見所縛，遂不惜枉道曲解，因人而異其攻擊之資；然則上述兩說之並存，自亦無怪其然也。

汎繫黨自初立以後，即可從其所包含之份子，而窺得其運動之內容。計該黨之黨員，有爲業已退職之公務人員，有爲未及從軍年齡之青年男子，有爲熱誠流溢之職業家及政治家，有爲青年學生及中產階級所領導之農工。觀其黨員之兼收並蓄，可知其勢力之雄偉矣。

汎繫黨之黨員，既密佈於意大利，同時各處勞工，因不堪革命活動之負擔，赤黨袖領之壓迫，及累次罷工之徒停頓工作，損失工資及增加失業，而無實質之結果，亦蠢然思動；全國勞工工團乃乘之崛起，而得多數勞工之擁護。該團成立之初，適爲七戰停止以後，意國勞動糾紛，愈趨繁劇，該團乃進而解決工潮，廢除罷工暴動之辦法，改用和平之手腕，結果頗多成效。同時該團又時獲地主之減讓地租，及有利之銷售契約，因之聲望愈增，勢力愈大，竟常有赤黨工會，全體易幟來歸者。

一般雇主，始見汎繫工團之行動，以爲是能保全其自身之利益及反抗無政府之黨徒也，頗表歡迎之態。顧不久即疑忌叢生，詆之爲緩進派之赤色工會。惟多數工人以其不用暴動罷工之手段，減少工資工作之損失，則均認爲真能保障勞工利益之新組織。是時各地新工會已紛然成立，惟多單獨行動，無一定之制度。直至軍人而兼詩人之鄧南遮 (Gabriele D'Annunzio) 氏，始創「社團國家」 (Corporative State) 之觀念，該團行動始稍有準繩。鄧南遮 時方有事於阜姆 (Fiume) 乃即以所創憲法，施行於該地，依職業之性質，將該地人民分爲十社團。結果斯制雖並未實行於阜姆，而意國人士靡然從之，後日該國之社團組織，蓋即基於此也。故社團觀念者，實爲汎繫黨組織精神之根據，階級合作觀念之基石，不惟意國重要之國民黨接受此說，即以前之社會黨如俾安歧 (Michele Bianchi) 奧力味替 (Angelo Oliviero Olivetti) 佩南稷奧 (Sergio Panunzio) 及奧累諾 (Paolo Orano) 等，亦皆加入汎繫黨，力助新工團之成立焉。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汎繫黨集會於羅馬，以墨索里尼爲主席，社團觀念，乃正式列入黨綱。

據該黨黨綱，國家應單純成爲施行政治及法律之機關，國會權力則限於涉及以下兩點之問題：卽個人爲國民之權利與義務，及國家如何保障與實現全國國民之最高利益是已。惟全國技術會議（national technical councils）乃能處理一切關於國民生產活動之問題。其次又謂社團組織爲國民團結之表現，發展生產之捷徑，自應絕對鼓勵之，惟個人能力亦不能強之使平，致以社團而淹沒個性。故據此黨綱，凡社團之要點，俱已一一奠基，所缺者惟代表會議與技術會議兩個立法機關之觀念未會實行而已。綜觀以上各點，此所謂社團觀念，似與德國憲法，於國會之外，又置一顧問會議（Wirtschaftsrat）之辦法，大略相同，惟德國行之未有成效，而意國則始終未曾實現耳。蓋意國之國會及行政機關，仍繼續爲政府之最高組織，各地之工團及社團不過於立法上得有建議之權而已。

一九二二年一月，汎繫黨又開會於波羅亞（Bologna），將該黨之社團聯合會組織就緒，計全會包括五個以全國爲單位之社團：曰勞工，曰勞農，曰商人，曰中等及智識階級，曰海員。前此所謂勞動者，本限於工業勞工，尤特指勞力者，今社團組織乃亦加入中等及智識階級，而許

其爲組織份子之一，是亦該黨之新猷也。

故社團組織（是時該團之理事及領袖爲洛索尼氏）實包意大利全國之一切組合，不論雇主或雇員團體，幾兼收而並蓄之。而其理事洛索尼之權力，乃直能控制一大規模之經濟勢力集合體，此集合體且竟有日升月恆尾大不掉之勢，擴而充之，雖謂其能包括全國之生產者，因而成爲第二政府亦未可知。然此點亦卽爲汎繫黨引人疑忌之由，雖黨員亦有不免生心者，故此後卽有若干組合離黨獨立，直受政府之管轄焉。

一九二二年汎繫黨政府正式成立，工團運動更形活躍，不惟於政治上居獨裁之地位，且於經濟上完全排擠自由主義而去之。一九一四年五月，有法學教授及政論家洛科（Alfredo Rocco）者，（卽今之司法總長）著論於國民黨機關報國家觀念（L'Idée Nazionale），謂自國民黨觀之，倘社團主義能棄其社會黨之色彩，及去其革命與無政府之手段，則誠可認爲有利於意大利國家之經濟組織。蓋據氏之觀念，此混合雇主及雇員之社團組織實爲一良好之現象，故舊日意國所稱行會之「社團」二字，實可仍舊沿用之（註五）。其次，氏又提出一新學

說，謂一國之中，本不僅有兩個階級，如社會黨之所云，而實有多數階級，交相綜錯，如一個人常同時爲地主及租戶，或爲店主及雇員，非能截然分野者；此說今已盛行於意大利矣。

同時他種工團仍繼續存在，如舊日赤色及白色（即社會黨與天主教黨）之職業組合，即仍與汎繫黨並存於意國，所不同者，汎繫黨之工團，猶在發展擴充之中，正多方吸收其他工團之會員，及未入任何團體之人士，而此赤白色之組合則勢日衰，人數日減耳。此外亦有數種勞工，如金屬及機械工業之雇員等，仍直接隸屬於社會黨；印刷工會本以無政治色彩著名者，茲亦繼續發展，安享其舊日之繁榮。到其他各業，則凡非汎繫黨之工會，俱已漸漸失勢，無復昔日之盛況矣。惟凡脫離他會者，非必全體加入新工團，蓋當時一般工會，多成爲政治革命及斂錢之組織，已足以大損一切職業組合之聲譽，甚且有完全使人失其信仰之心者，而彼隸屬赤色與白色工會之勞工，又每見所繳納之會費，即使不入領袖之私囊，亦略未發生有形之結果，以致使一般脫離工會之會員，亦多疑新工團爲一丘之貉，因而心寒志灰，裹足不前焉。

關於雇主階級方面，舊日非汎繫黨之組合，似能維持較久。一般企業家多願株守於其舊

組織下，以此種組合，既能與汎繫黨團體同時存在，而又無政治之色彩，則自能吸收一業中之全體雇主，而成爲更能代表一般利益之機關也。惟最終是種組合，亦漸染汎繫黨之色彩，並亦如一般工團之開放入會資格，凡同屬一業之人，無論其爲雇主雇員，均許其加入，所被拒絕者，惟彼色彩鮮明之革命黨耳。吾人觀後日意國法律之不禁人民組織非汎繫黨之團體（註六），而事實上是種團體乃每難得政府之承認，及不能進行一切有利於會員之工作，即可知其他組織，日漸衰落之由來矣。

無何汎繫黨運動又發生兩種新趨勢：一，所謂工團已逐漸蛻化，而趨與他國之工會組織相類似，實言之，卽一業之中，同時不能有兩工團是已；蓋工團之地位，已能爲團員謀最大之利益，凡勞工如欲加入工會，自不願捨此他趨也。二，各業混合工團之組織，其始雖僅爲少數人所反對，茲則反對者，日漸加多，最後卽組織此種工團之觀念，亦完全消滅。

一九二四年八月，意政府指派十八人爲委員，負責改造意國之憲法，而尤注意於政府與工團之關係，工團內部之改良，法律承認工團之辦法，及製定關於勞動狀況，集合契約，與調解

工潮種種法律之預備。

關於上述最後之一點，汎繫黨政策似已大有成效。蓋自該黨政府成立以後，罷工及閉鎖工場雖非確定為非法，而發生之次數，已大為銳減。且其中在某種環境之下，有已由政府認為合法者，有竟由汎繫黨主動，以期為所屬勞工求獲應得之利益者。茲將近年該國罷工之情形及結果，列表如下，以見該黨政策之成效。

年 度	罷 工 次 數	參 加 人 數	損 失 工 作 日 數
一九一九	一·八七一	一·五五四·五六六	二二·二一三·七四六
一九二〇	二·〇七〇	二·三一三·六八五	三〇·五六九·二一八
一九二一	一·一三四	七二五·八六二	八·一一〇·〇六三
一九二二	五七五	四二二·七三三	六·九一六·九一四
一九二三	二〇〇	六六·二一三	二九六·四六二
一九二四	二六〇	七三·〇一三	五二三·七六一

罷工次數之銳減，一九二一年已至為顯明，是蓋由於汎繫黨工團和平調解工潮之成效。一九二二年據上表數字以觀，該黨權力及地位之增進，尤為彰明較著。此後該黨實握政權，罷工次數更形減少，至一九二五年已成爲無足重輕之數字矣。

惟汎繫黨之最後目的，猶在完全消滅是種暴動之行為，上述成績蓋其第一步耳。至工團之形式，應如何確定，各方之意見仍不盡同，有以爲會員應屬強迫性質者，即謂凡一業之勞工，均應加入其本業之工團，並使工團成爲政府機關之一，有以爲工團之行動應絕對自由，不受政府之操縱及管轄者。

上述十八委員，所建議關於改良勞工組織及代議制度之種種要點，茲可不必詳述，因厥後均經大加改削也。惟當時雇主團體，對此委員會之建議，頗多反對之點。最後於一九二五年十月二日，雇主之工業聯合會（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Industry）與雇員之汎繫黨勞工聯合會（Fascist 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Labor）乃於汎繫黨理事長法里納西（Roberto Farinacci）指導之下，共同商定所謂帕拉左維多尼公約（Pact of Palazzo

Vidoni) 也(註七)。

據該項公約，此兩個團體應互相承認其對方為合法之代表機關，同時並約定此代表機關之全體附屬工團，所正式指派之代表，應協議一集合之勞動契約。厥後此公約卒由意王以命令批准，因而成爲一種合法之條規云。

至汎繫黨最後制定之制度，及其最近之情形，茲當於下節述之。

二 現在意大利之勞動制度

意大利現在之勞動制度，樹基於四個法律之上——曰，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之集合勞動關係法；曰，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之集合勞動關係法施行細則；曰，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之勞動憲章；曰，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日之全國社團會議改良法。此外尚有關於其他方面之法律多種，茲可不必贅述。

嚴格言之，勞動憲章並不得謂爲法律，而實僅爲若干條之原則，備爲意大利勞動立法之

根據而爲集合勞動契約所必須率循者。故社團部 (Ministry of Corporations) 部長波退氏 (Signor Bottai) 嘗曰勞動憲章之道德上價值實等於一個法律以其爲汎繫黨最高會議 (Fascist Grand Council) 所宣布而此最高會議又爲現在政治組織之最高機關也。

欲解釋斯制之組織余以爲與其一一分析上述四個法律之內容不如直敘此制所根據之種種組織爲易於詳盡。此種種組織重要者有五：

- (一) 法認工團
 - (二) 集合勞動契約
 - (三) 勞動法庭
 - (四) 社團
 - (五) 社團部
- (一) 法認工團

汎繫黨之始終未與任何階級特別聯絡實爲一顯明之事實。故自該黨初立以返其所含

份子，幾無時不包有各階級之人物。工團政策與整個之汎繫制度同，亦根於階級合作之原則。其領袖深知一切生產組織之問題，不必分化國家或社會，或壓迫與剷除任何階級，而後能解決。又就此組織之各方面而言，全國消費者之利益，亦常須與直接有關之階級，相提並論，不得略有偏頗。蓋自該團視之合作與生產，實為立國之兩大要素，凡為國民均居於活動之地位，祇須其能擔任任何有用之職務，即當視為生產者，不得以其為勞心或勞力，而有所歧視也。

戰前意國之勞動團體，為不受任何公共裁制之組織。其領袖每多漠視生產之問題，甚且鼓勵勞工，力求減少工作，而使其發生工作惡劣不為過失之觀念，良以此輩以為戰爭之對象，即為勞工（尤特指勞力者）與獨占生產工具之資本家；換言之，即被壓迫與壓迫階級也。

汎繫制度則大異於是，其性質為國家的，其第一目標為增加全國之財富，因而增加各階級之財富，故其政策在集合一切生產階級，而使之成為一個單位，而後以職業之標準組織之。此種組織同時為縱式及橫式者，工團組合及一切聯合會，為縱式之集合體，而社團則為橫式者。前者為自動之組織，由政府承認之，並受相當之公共裁制。而後者則為政府之機關，一切組

合及利害關係人之集合體，祇問其為某種經濟活動之份子，不問其為雇主或雇員也。

惟工團雖為自動者，而實為公眾權利之組織；質言之，即為法律承認之機關，而有法律上之責任，與合法行為之權利也。

在此制之下，凡屬一個區域，有一種工業商業或職業，即得組織一雇主工團及一雇員工團，而取得法律之承認；惟同時在一區之中每業每級不得有二個工團。凡工團欲得法律之承認，如其為雇主者，必包有雇用本區本業十分一勞工之雇主；如其為雇員者，必包有本區本業十分一之勞工。夫十分一之比率，雖不得謂為多數，而觀於意大利工會之未能為英德各國之發展，則實為綽綽有餘。且事實上該國工團所包雇員每多超出十分一以上，其全體加入者，亦為數不少也。

其次，工團欲獲法律承認者，其目的不能偏於經濟及物質方面，同時應兼有教育之職務，以期促進團員之道德、技術及愛國觀念。此外並須備有社會服務及疾病津貼等等，其經費於入款項下指定一部撥充之。又工團團員必須有能力、道德及愛國心之保證。入團者初不必為

汎繫黨黨員，祇須自政治上觀之，其人無顯然煽動羣衆之行為者，即皆可加入。而事實上此等色彩之人，亦間有加入者，惟不得繼續爲煽動之宣傳耳。至執行委員則所需資格，自較普通團員爲嚴。據該團規章，除自願參加者外，雇主或雇員無必須加入於本業法認工團之義務，惟工團既爲某業雇主或雇員之代表，而有保障全體利益之專責，則凡享受其保護者，自不得不負擔納費之義務。故工團規定，凡勞工每年皆須繳納其一日之工資爲團費（註八），雇主則另有相當納費之標準。此外工團又得自問其團員徵費若干，作爲團證及徽章之代價。至工團之章程及選舉執行委員之方法，則各個工團均得自由制定之。

截至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止，意大利全國計有雇主工團六八〇個，團員一，二二〇，五五一人，代表企業四，三四六，四八五家（自係包括入團與未入團者而言），雇員工團三，五五〇個，團員三，四六八，五三九人，代表雇員九，〇〇〇，〇〇〇人；職業工團一，〇二八個，團員九，二四二五人，代表職業家一，一五，〇〇〇人。總計全國共有工團五二五八個，團員四，八〇〇，〇〇〇人，代表人數一，〇〇〇，〇〇〇人。此後團員之人數仍日升月恆，激增不已，惟工團職員

亦頗致力於入團資格之審查，非必以儘量增加人數爲能事也。故如以工團人數與舊日之勞動總會較，則後者殊有望塵莫及之嘆，蓋勞動總會之會員人數，在大戰以前，從未超過四十萬人，即在一九一九以至一九二二年赤黨得勢之期間，其納費之會員亦僅達二百二十萬人

也。法認工團爲自動之組織，惟仍由國家以種種法律裁制其行動。列如團長與理事長，雖由各工團根據其自身之規章而自行選舉，但舉出之後，非經政府批准，即不得就任。又如工團偶有發生重大糾紛之時，政府亦得解散其負責機關，而將管理權移交團長、理事長，或臨時委任之特別委員；其有情形特別嚴重者，且得撤回承認。惟事實上除發生重大之財政恐慌外，意政府固絕少干涉工團之行動也。

每個工團必有其代表機關，以處理一切勞動糾紛，及與他級工團之交涉。有時亦可由雇主及雇員兩工團，以公平之原則，選派代表合組一混合委員會（註九），以期解決種種特殊之問題。此混合委員會所任之職務殆有似於今日之社團或全國社團會議（National Coun-

ncil of Corporations) 下之分部，今日該國社團制度猶未發展之區域，蓋仍盛行此制也。

工團既合於種種條件，即可請求承認，惟請求承認非任何工團所必行也。如其果欲取得法律之承認者，則必須呈送請求書於社團部長，詳述該團成立之原由，活動之性質及團員職員之名單；此外尚須附呈章程一份。社團部長於收到請求書後，如認為合法者，即可呈請國王，以命令批准之。

法認工團之重要職務，為協議集合勞動契約，以此事惟是種組織為能勝任愉快也。工團在法律上須對於其本身之行動負責，並須於其基金中指定一部分，以為應付此種責任之需。意國法律不禁未經承認，而事實上已經成立之組織，惟一人不得同時兼為法認及非法認而有相同目的之工團。私人組織不為工團之目的而成立者，自亦為律所必禁；惟工團如未得法律上之承認及權力，即不得協議有效之契約，及為團員之代表。故此等工團因無實際價值均漸歸消滅。

除雇主及雇員之工團外，又有種種居間性質之工團，如技術專家經理，事務員及農場管

理人等所組織者是已。此種組織在職業組合制度上，自爲一種新發現，以是種人員往昔常爲組織工會者所忽視也。技術專家與管理人員，亦可合組工團，惟同時應各有分立之機關以代表之。至工廠之經理則常有一獨立之組織。

以自己名義經營業務之工匠，亦有工團之組織，其集合體爲工匠團體自動聯合會 (Autonomous Federation of Artisan Communities)；此外小商人，經紀商，小農人，及自耕之小地主亦均各有類似之組織。

一九二七年社會黨勞動總會之領袖，宣言在汎繁黨工團制度之下，其本黨之理論亦有人接受及實施之可能，因即自動將該會解散。同時自由職業家如律師，醫師，工程師，著作家，藝術家等，亦皆已包入社團組織；汎繁黨之重視中等階級及一般智識之價值，於此可見一斑。此等職業家亦皆於其住在區域內依職業之性質而分組若干工團。

以上種種工團，又集合而成若干更大之組織，如某種勞工之全國工團，某業雇員之全國聯合會是已；惟雇主與雇員例分爲兩個組織。同時此種組合又分爲若干級，如某城，某市，某省，

有時或爲全國之雇主或雇員工團卽爲第一級；若干第一級工團之合組卽爲第二級；若干第二級工團之合組卽爲第三級，以下以此類推。惟此種分組分級之法，亦視各業在本區之性質及重要而異，非任何企業皆有相同之組織也。

第一級之工團，包括一省，甚或一國之某業勞工（例如印刷業，冶金業，建築業等是）。倘一省之中又有地方組織若干，則可合組而成一某省某業工團。

全國工團組合 (national federation) 爲全國某業工團之集合體，而全國工團聯合會 (national confederation) 則爲全省工團組合，及全國工團組合之大集合體。

關於雇主團體之組織，則第一級爲區域之混合組織，及某業之全國組織。區域組織爲工團性質，處理一切勞動契約之協議，全國組織則爲一經濟機關說明全國某種工業之需要。故如杜林之摩托車工廠，則同時既爲包括全省一切工業之杜林工業組合之會員，又爲全國摩托車工業聯合會之一份子。

凡工業發展之地，常卽有某省某地之工業組合。其工業未甚發展者，則常合數省而組一

工業組合。此外亦間有某區某業之組織。計意大利全國之區域組織，屬於電力工業者十二，屬於機械及冶金工業者三，屬於房屋所有者者二十有四。

以下為各種全國聯合會之名稱

(甲) 雇主組織

(1.) 工業聯合會。

(2.) 農業聯合會。

(3.) 商業聯合會。

(4.) 銀行業聯合會。

(5.) 水陸運輸業聯合會。

(6.) 航海及航空業聯合會。

(乙) 雇員組織

(7.) 全國工業工團聯合會。

(8) 全國農業工團聯合會。

(9) 全國商業工團聯合會。

(10) 全國銀行業工團聯合會。

(11) 全國水陸運輸業聯合會。

(12) 全國海員空員聯合會。

(丙) 職業家組織

(13) 全國職業家及藝術家聯合會。

一個企業可以同時加入若干雇主聯合會，故一人亦可同時加入若干工團。例如某甲有小地一方，而又另行租用人地，則某甲即可加入地主聯合會及租戶聯合會。

此外亦有若干階級，不得組織法認工團者，如中央政府，省政府，縣政府及其他公共機關之雇員是已。蓋因此級人員與雇主（即指各政府而言）所訂之契約，有特殊之性質，勢不能亦如普通雇員之與雇主立於同等之地位也。願此等雇員，亦得組織公會，以研究及促進職業

上之集合利益，惟組織之時，必須先得政府之許可耳（註十）。

其他公務員，如外交部，殖民部，內務部，社團部之部員，以及各級現役軍人，則均不得有任何組織。

意國國內之團體非經國家特許，不得加入任何國際組織而服從其命令，蓋以爲意國應有統一之外交，除政府外，不得更有二重之對外政策也。故私人團體無論如何重要，均不得有單獨對外之策略。惟事實上意國政府對於國內團體之請求加入國際組織者，尙鮮有拒絕之實例，而意國雇主及雇員代表，在國際勞動組織中，亦頗爲活動也。

上述之種種聯合會皆有下列三項組織：

（一）全國大會，由各省及省際工團，於每次開會時，選派代表組織之；代表人數，視各工團之團員人數及本團之章程而定。主席，理事會理事，及全國工團之主席，皆爲大會之當然會員。大會會期每三年一次，遇必要時亦得臨時召集。

（二）理事會，由全國各業工團之代表，及全國殘廢軍人聯合會（National Associa-

tion of War Disabled) 之代表一人組織之。其職務在執行全國大會之議案及處理閉會期間之會務。

(三) 主席，由全國大會選派之，惟須由政府批准。

職業家及藝術家聯合會之章程，與其他聯會略有不同，以其組織份子，既非雇主，又非雇員，而其所發生經濟關係又以社會為對象也。

(二) 集合勞動契約

集合勞動契約，本非新發現之制度，即以意大利言之，亦已早有此制。惟往昔所謂集合契約，多為勞資兩方長久及劇烈衝突之結果，其事不常有，其條款又常為優勝之一方，任意所定；則事既有類乎強迫，何能使當事人生尊重之心，而弱者勉強接受強者之意思，亦斷非出於自願。且此種契約亦祇能於兩方當事人間行之，非能普遍應用，故事實上常有多數勞工與訂約當事人為相同之工作，而非同一工會之故，乃未能享受此約之利益，而仍不得不於較為不利之情形下繼續工作焉。

今日則協議此約者，爲法認之工團，其條款有強迫當事者服從之能力，且不惟當事者須嚴重遵守也，凡同隸一工團之團員，或同爲某地某業之份子，皆有服從之義務，故其效用實遍及於意大利，即窮鄉僻壤及工業落後之區，亦斷難視爲例外。如全國牧人契約即最近所訂立者也。

曩昔之集合契約，所規定者大都爲工價物價及範圍狹小之工場協議，今則所包者，爲雇主雇員之一切關係，蓋一普通之勞動法也。

集合契約，必須合於若干條件，方能發生效力。如訂約之團體必須爲合格之組織，必須有正式承諾之表示，有時且必須得上級團體之同意。其次此種契約，不得涉及公共管理法已經規定之勞動關係，（即不得有關於公共機關人員之規定，）不得涉及個人或家庭之勞役，亦不得有反於法律之規定。

集合契約必須包括其本身有效之期間，管理之紀律，學徒之年限，工作之時間，工資之額率，星期休息之日數，每年例價之日數，無故解雇之條件，業務移轉之辦法，疾病及服務軍役勞

工之待遇等等。

集合契約必須調和雇主雇員兩方之利益，而使其不礙及生產。同時又必須全部公佈，使有關之人皆能詳審其內容，方能發生效力。故集合契約不啻即為一種法律，凡在訂約工團法權區域中之同一企業及同業之勞工，具當受其控制。惟如此種契約對於一二財力薄弱之企業確有負擔過重之處，則工團得許其免除條約之束縛，或另予以特別之條件。至如某業已有特殊契約，其內容且較為有利於勞工者，則集合契約亦不得束縛之。

破壞集合契約之處罰，由法律定之，大抵雇主背約者得科以一百里拉（Lira）以至五千里拉之罰金，同時且須對於勞方及訂約工團負法律上之責任。而雇主所屬之組織，如不能迫其會員遵守此約，或保證此約之履行者亦須負相當之責任。

今日意國集合契約之訂立者，已為數不少，且有日漸增加之勢。計截至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全國包括一省以上之集合契約，已達二八二一件；其後新訂者，一九二八年為一七四四件；一九二九年為一一五六件；一九三〇年為一五三五件；總計達七二五六件。其中

三〇九四件，爲普通之性質，包括一切勞動之關係；四一六二件爲特殊之性質，專議關於工資之條件；又其中已經公佈，成爲法律者，截至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計達二六七四件，其效力可包意大利全國，或在數省以上，並已存案於社團部者，同時亦達二八一一件。至該國工業之迄今未訂集合契約者，雖非絕無僅有，然其數則確已漸減也。

各工團間破壞契約之事，事實上似尙非多見，惟一二私人企業間偶有發現耳。

(三) 勞動法庭

汎繫黨勞動組織，如何於初立之時，努力消滅罷工及閉鎖工場之事件，及此種暴烈行動，如何於新制成立之初，即開始銳減，吾人亦既知之矣。惟事實上一制之立，無論若何美善，勢不能舉一切之勞動糾紛而消滅之；故該黨又制定種種方法，期以緩和既起之糾紛，而使其不至停頓生產，貽害人民；據該黨之意，凡文明之社會，其個人例無自保法益之權；勞工階級之難於處理爭端，亦正與個人無異，故如有糾紛發生，即當向無黨無偏之高級機關求判曲直，其步驟蓋亦如個人之向法庭起訴也。蓋罷工及閉鎖工場，據汎繫黨觀之，實一不堪負擔之奢侈品耳。

上說之系論，即爲用法律強制解決勞動糾紛之方法，蓋亦意大利立法上一種最爲激進之革新也。當時保障雇主及雇員權利之設備，不一而足。意大利及他各國，如德意志、澳大利亞、紐絲倫及美國各聯邦州，皆早已有公斷及和解之制度。惟此等制度，無一完全成功者，雇員或雇主因公斷及和解之無效，仍不時以罷工及閉鎖工場等最後手段，求達其目的也。

汎繁黨政府裁制勞資爭端之步驟，可分爲二：

(1) 先由工團組織，社團，或社團部調解，

(2) 倘調解失敗乃由勞動法庭裁判之。

調解之方法，非由法律嚴格規定之，而乃決定於上述之混合委員會，若社團，若社團部，若其他調解機關，對於解決爭端之方法固皆有極充分之自由也。調解不成，兩方當事人，乃可告訴於勞動法庭；如未經調解，或調解而猶未失敗，則告訴之程序，即不得進行。蓋汎繁黨組織，實視勞動法庭，爲萬不得已之最後手段，故即使一案已經起訴，而工團聯合會之主席，於訴訟程序未經開始之時，仍必努力爲最後之調解；不惟此也，即在訴訟程序之中，如有可以調解之機

會，此聯合會之主席亦必不縱之使逝。

勞動法庭，非特別設立之法律機關，而僅爲上訴法庭之一部，專爲審判勞動糾紛之案件而組織者。庭設法官三（註十一），一爲庭長，二爲推事，推事又輔以顧問（*Pravobor*）二，一爲勞動問題之專家，一爲生產問題之專家。顧問係自各區之顧問名單選出，其本人應對於糾紛案件無利害之關係，且既不得爲任何方面之代表人，亦不得爲雇主或雇員之一份子；質言之蓋完全爲其專門學識而應選，並爲法庭之一部職員也。

勞動法庭得審判一切關於各業勞工及雇主間之爭執，如法律之遵守及應用，集合契約之條款，勞動情形之規定，及契約條款之修改等等。關於裁判權之領域，各區之勞動法庭以本區爲限，而羅馬法庭則得審判關於各區間之糾紛案件。

法庭之判決，以勞動立法及勞動憲章爲據，如於法均無所據，則依照習慣及衡平原則；實則勞動法庭亦一衡平法庭也。勞動法庭得規定公平工資，惟規定之時，須常顧及工人生活上之需要，雇主財政上之能力，及連續生產之重要。蓋自社會利益之立場觀之，一切生產均應連

續不輟，而生產成本亦不應過高使其不能與他國競爭也。

勞動法庭不得判決關於私人之案件；一切私人案件，應由普通下級法庭審理之，審理之時如經當事人之請求，亦得選任顧問兩人。此外勞動法庭亦不得審問關於非法認組織之案件，及職業界之糾紛，如未有組織，或已有組織而未經承認者，勞動法庭亦得處理之，惟在此種情形之下，庭長即須委任一監護人以代表有關之當事人。

檢察官對於糾紛案件得直接參加，又糾紛發生，當事人未經起訴，而檢察官認為對於社會利害關係上有起訴之必要者，亦得提起公訴。

勞動法庭之判決，有強制執行之權力。倘雇主或雇員拒絕執行者，法庭得科以一月以至一年之拘禁及一百以至五千里拉之罰金。大抵受罰者如為團體必較個人為重。

罷工及閉鎖工場，意國法律均視為非法，以其害及全體社會也。據法律上之解釋，閉鎖工場蓋指雇主關閉工廠以迫勞工修改工作之條件，或為其他非法之目的而言；罷工蓋指至少三人以上之勞工，以事先之預謀，為停止或阻礙工作之行動而言。依此法律，凡雇主閉鎖工場

者，得科以一萬以至十萬里拉之罰金，雇員罷工者得科以一百以至一千里拉之罰金。倘罷工及閉鎖工場之目的均無關於工作之條件，則犯者無論為雇主或雇員得同科以五百里拉之罰鍰；倘同時有暴動及身體上之損傷，則犯者得科以拘禁及一百以至三千里拉之罰鍰。大抵計畫及鼓勵此種行為者，其受罰常較參加行動者為重，至如政府機關因罷工及閉鎖工場之行為，以致不得進行其職務，或如公共事業亦因是項行為而致暫時停整者，其科罰之例，自當尤嚴。

自汎繫黨政府成立以後，勞動契約由各種工團協議成功，勞動糾紛由調解機關和平解決者，不知凡幾，而勞動法庭受理之案件乃寥寥可數，則斯制之成效亦可想見矣。蓋法律上對於罷工及閉鎖工場之科罰，實非減少糾紛之根本方法，惟社會輿論皆已傾向於以和平方法代直接行動，及信仰斯制之最為適宜於意大利，而後乃有成效可見也。故事實上意大利法律雖有科罰之規定，而應用之機會則殊少。

最近意國之勞動法庭，曾判決一案頗有意義，特述之於此，以見此制之一斑。是案當事人

爲意國北部種米之田主，及其雇用之女工。蓋當時田主因米價暴跌之故，提議將女工工資減去百分之四五，而女工工團，在原則上亦承認企業蕭條，可以接收減低工資之倡議，惟所減之數，不能超過百分之二〇。因努力協議及調解之結果，雇主乃予將所要求之數減爲百分之三十，但工團仍不肯接受。於是雙方代表乃不得相見於勞動法庭。該庭經詳細調查市場狀況，勞工生活之後，乃判決將工資減去百分之二四，同時又令雇主爲供給工人膳食在工資內所扣之數亦酌減若干，使實際減低之率爲百分之二二。結果此糾紛案件卒賴以和平解決，而工作無一日之停頓焉。

此制行之既久，民皆習之成法，視爲當然，故將來即使有違反此制者，亦當視之如違反國法而已。

(四) 社團

各種生產企業，既有分立之組織，故同時又須有一互通聲氣之機關以聯絡之，卽所謂社團是已。社團者國家之組織，某種經濟活動組織之大集合，而調解勞動糾紛之機關也。社團之

組織於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之法律中，始定草案，至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日乃由法律正式組成全國社團會議，而認之為全國種種機關部分，及利害關係人之集合體。至其所分各組，則係執行社團之職務，而代前述之混合委員會也。

全國會議之目的，在調和國中一切之生產勢力，而使其符合於勞動憲章之第六次宣言。蓋混合委員會，首先表現階級合作之精神，社團則鼓勵之指導之，而全國會議則調和統一社團之行動也。全國會議之主席，為社團組織之總理，得授權於社團部部長。而列席之會員，則為內閣閣員，高級長官，各法認工團之代表，雇主雇員之代表，及專家十人；雇主雇員之代表人數，應無得軒輊而工團之代表人數，則視各工團之重要程度而定。

各種聯合會所代表者，為雇主或雇員階級之全體利益，而社團則代表某種工商業之全體利益，無雇主與雇員之分。故社團之職務，在研究利益衝突之情形，本業發展之機會，及生產成本之要素等；而全國會議則更進一步須負責調劑各業利害之衝突。是種規定實為至重要者，蓋如農工二業忽有爭執，或二個企業忽起糾紛，則全國會議即可從而解決之也。

社團組織亦得處理勞工之雇用問題，並得自設其本業之雇員介紹所，由勞資兩方各派代表若干人組織之。此種公共介紹所成立後，凡根據華盛頓勞工大會（Washington Labor Conference）之議案，而設置之私人介紹所，即不能存在，而雇主之進用勞工亦勢非取給於公共介紹所不可。

全國社團會議之各省機關，本為各省經濟會議（Provincial Councils of Economy），今則是種會議亦漸變形為各省社團，而全省之一切工業乃均受其控制矣。

截至最近為止，除全國劇場社團（National Corporation of Theatre）外，意大利社團之實際成立者，殊不多觀。此後為時勢所需，所有社團，或不難一一設立，而在此青黃不接之時，一切社團之工作，自不能不由全國會議之各省區機關負之，蓋此等機關，亦為各聯合會及各團體之代表所組織者也。

據波退氏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下院辯論全國會議章程時之演說，此種會議，既非國會之一部，亦非社團部下之一種組織，而實為一種國家之機關，而以調劑種種工團及

私人企業間之利害爲目的者也。

或謂意大利之現制，實爲一變相之國家社會主義，其目的乃在阻礙及吸收一切形式之私人企業。此語實爲不確；蓋意大利之勞動立法，及勞動與生產之制度，皆基於勞動憲章。而勞動憲章所根據之動力則主要者有四：曰私人企業，曰工團活動，曰社團活動，曰國家干涉。四者固缺一不可者。故波退於上述之演詞中又曰使吾人壓迫私人企業，則工團之獨裁成，而國家之道德及社會基礎則隨之破壞；使吾人壓迫工團活動，則居間之組織壞，而汎繫主義所以自異於傳統之自由經濟者又將無以表現；使吾人壓迫社團活動，則工團將孤立於勞動糾紛之中；使吾人拋棄國家干涉，則意大利過去經濟生活中個人主義與工團主義之爭又將再見於今日；四者皆非吾人之所願聞也。

(五) 社團部

社團部之職員，多選自意政府之各部，蓋調和統一各社團活動之最高機關也。惟其始該部僅處理直接有關於社團制度及其組織之事件，今乃兼顧曩昔國家經濟部 (Ministry of

National Economy) 所負之責任焉。(惟關於農業之事件則另有專部負責)。

政治代議制度

社團制度在意大利政治組織之改革上，頗佔重要之地位。蓋前述之十八委員，曾提出含有社團組織之國會計劃，以一院為純粹之政治機關，而以一院為工團之組織也。惟事實上該項計劃，厥後僅以修改之形式施行之。據該項修改之計劃，上院仍如舊制，而下院則選舉之法，不用舊日之地域分區式，而用工團參加之形式。其法乃於選舉之時，由各聯合會及其他法認團體，先各提名若干，以總數千人為度。而後乃由汎繫黨最高會議 (Fascist Grand Council) 於千人之中選出四百，或不及四百，而另於工團之外選資深望重及有特別才能者若干人，以湊滿四百人之數，作為被選舉人名單。既定，乃置之於選舉人中，使其表決贊否，如贊成者多數，則此四百人自然當選，否則另用比例代表之制，重新選舉，凡組織有選舉人五千人以上者，皆得提出被選舉人之名單。

新制成立後，汎繫黨最高會議第一次所選之名單，即由全體選舉人大多數通過，因之下

院乃有各聯合會及其他組織之代表，代表人數依各會之重要程度而定。計上述之十三聯合會，共有議員二百人，其中凡某種雇主聯合會之代表人數為若干，則其對方之雇員聯合會之代表人數亦必相稱。如農業聯合會有代表二十四人，則全國農業工團聯合會之代表亦必為二十四席；工業聯合會有代表二十人，則全國工業工團聯合會之代表亦必為二十席，其餘類是。此外觀全國職業家及藝術家聯合會之有代表四十席，則足以見新制之重視智識階級；退職人員聯合會之得代表四十五席，殘廢軍人聯合會之得代表三十席，則又足以見汎繫制度之特徵也。

據新制之主要觀念，國民之得參加預選，非以其為已及選舉年齡之國民，而以其為生產者，及一二法認組織之份子；惟及其實際與選，則又得以個人資格而投票。選舉之法，以其性質言之，殆有似於全民投票，而略異於普通性質之選舉。蓋凡屬選民均得對於內閣五年任期中所行之政策，投贊否之票，如結果贊成者雖佔多數，而反對者亦佔極強之少數，則政府即認為其行動已受一部人民之抨擊，而不得不更張其一部政策之趨勢。

是種選舉制度及其相連之社團制度，均認爲一種試驗之政策，而非最後之定制。故意國同時又設立一永久委員會，以研究斯制之工作，及時時報告其工作之狀態，遇必要時並得建議改良之方法，然則斯制將來之修改，固非不可能者也。蓋人民之所切望者，爲時常改造過去未滿人意之方法。昔日自由主義之憲法，及政黨制度，在過去期間，誠大有助於國家，而今日意人則視爲不適於用，斷無有望恢復舊跡者，誠以曩昔政府往往漠視勞動階級及勞動糾紛，而許階級戰爭之存在，此點殊非意人所願復見於今日也。

汎繫主義之政治組織，本非在演講之範圍內，茲略述於此者，欲以示意大利施行此制之結果耳。汎繫制度之種種要點，容或有一二被他國仿效者，惟此非意大利之所望，是則汎繫主義與蘇俄之共產主義之異點也。蓋蘇俄之共產主義如非同時亦由他國實行，則除非大加修改，亦勢不能存在於蘇俄，故蘇俄常努力宣傳共產主義於他國。汎繫黨雖願見他國之採用其原理或組織之一二，而其實現與否，則與意國之實驗無關，蓋意國之成功與否不在乎此也。

或又有願聞汎繫制度之實施成績者，實則此種制度，僅在試驗期間，不得謂爲完全發展。

故多數社團尙未成立，工團及其他組織猶未能吸收生產階級之全體；而其工作成績，在國中若干區域中，固有發展成熟，成效卓著者，而未曾全施此制之區域或企業，仍所在多有也。

汎繫制度成立之期間極短，且成立之初，適逢世界經濟恐慌之會，欲遽予定評，殊非易易。惟下列結果實爲顯而易見者：

(一) 罷工及閉鎖工場之事件已完全消滅，無數勞動糾紛亦皆和平解決，略無怨毒之跡隱藏其間。

(二) 經濟落後及較爲貧瘠之區，其勞工狀況亦能漸趨於經濟發展區域之程度。如西里(Sicily)及南意各部農業勞工之集合契約，本爲社會黨所難以得到者，今已正式實現。

(三) 汎繫制度成立初年，意大利生產，在量的方面及質的方面，均較一九一三年，及戰後斯制未曾成立之年，大有增進，直至一九三〇年世界恐慌波及意大利之時爲止。今則潮流所迫，意國國中，亦大感物價低落之苦，而尤以農業爲甚；且內外貿易均趨疲敝，失業人數亦日益加多。惟如以失業人數而論，則以意大利方之其他各國，似猶相形較少；蓋意國人口總額爲

四千二百萬，而當一九三一年冬季，企業最感蕭條之月，其失業人數不過八十萬（註十二），且本年七月一日即減至五十七萬五千，其數不可謂多也。且意大利之失業現象，本多為屬於季節性質者，今此種數字為數既非過多，而當恐慌以前之數年中，其失業之數又僅低至七萬八千人之譜，則其失業問題之無足關心，誠為顯而易見。又在最近之八九年中，該國人民之移殖國外者，較之大戰前後數年，亦均大形低減。如當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二年間，該國失業人數平均為五十萬以至六十萬，而移殖國外之人數亦如之；今日則失業之數大抵自五十萬以至八十萬，而其移殖國外之人數乃僅為十八萬以至三十萬之譜，則其滯留國內者，必非長久失業也。此外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二年間之流行性罷工，本亦為增加失業之一大原因，今則此種罷工亦已完全消滅。故今日意大利無業之民，較之十年前，實已大形減少矣。

最後，因世界經濟衰落之故，意國旅外僑民之失業者，又予意政府以一種負擔，蓋意人之久居國外者，至是因他國之企業蕭條，多被遣送回籍也。此種意僑，大抵以歸自美法兩國者為多，惟間亦有轉赴波蘭、捷克，及匈牙利各國者。

(四) 意大利之救濟失業政策，所根據者，為失業保險，及增加國富之公用事業。故其政府及其他公共機關，均努力增雇人丁，以從事墾荒，築路，及水電事業之工作，期以消滅社會上永久失業之階級。而對於築路與墾荒二事，尤認為重要，雖在此百業凋零，庶政緊縮之時，仍進行不懈也。是蓋因意大利少膏腴之地，一部土地有因水旱瘡疾之故，而不得完全開墾者，故其現政府乃不得不採用較為有系統之墾荒政策耳。墾荒政策，舊意政府亦嘗努力行之，惟當時國中各處所認為應行開墾之區，日夕禱求政府，速施墾政，求者過多，而力有不足，乃不得不枝節行之，以致所謂政策，常不免有破裂不完之弊。今則中央強固，墾荒政策曾經通盤計劃，所有工作，均集中於實應開墾之地，舊日之弊不復見矣。惟意政府並不負擔其一切計劃之全部經費，必工作之屬於普遍公用性質者，如濬河，灌溉及築路等等而後始由政府負擔；若工作對於地主產業有特別利益，則例由政府以薄息貸款與地主，而由地主自營之。

此種政策可謂之為國家干涉，或國家設計政策。惟意大利之有此制，不自今始；數十年前即已有種種法律，責地主以自墾土地。其區域之有強迫開墾之法律者，地主且須依照農業機

關所定疏濬溝渠，灌溉土地，修築道路，建造房屋，倉廩之計劃，而進行工作；如不願執行則科以罰鍰或褫奪其公共之利益。至在現制之下，則此種規定更為嚴密，而一切計劃之施行亦較為活動。

關於此制之成效，吾人當憶及上院議員康體（Contri）之言，康體於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在上院之報告中，曾謂：「以世界恐慌所造成之環境而言，意國之經濟制度，實可謂為能支持危局久而彌堅。」蓋意大利誠未能避免世界恐慌之影響，而以其所受影響之程序而言，則殊不若他國之銳利，且又有階級合作之精神為其後盾，實其他制度所望塵莫及也。故康體於其報告書中又曰：

「有此制而後人民有勤業，守法及團結之精神，此精神蓋即汎繫主義所培養，而瀰漫於意大利之各階級者也；有此制而後政府有強毅，謹慎及靈敏之手腕，此手腕或表現於政府之直接行為，或寄託於社團之組織勢力，蓋全國經濟活動之所由促進，種種生產事業之所由鼓勵，堅忍不拔之奮鬥意志之所由維持，而近代一切橫逆之所由制勝也。」

一言以蔽之，使意大利而無社團制度，及其所培養之精神，則勢必不能從容應付近代之恐慌，而免除嚴重之勞動糾紛，罷工風潮與方興未艾之階級爭鬪也。

自一九二二以至二七年，適逢恐慌平息，經濟回蘇之候，企業奮興，生產激進，一般工資亦因恐慌制度之促進，而逐漸提高。及世界恐慌再度發現，國家支出有努力掙節之必要，於是意政府乃又裁削俸給，將各機關雇員之月薪減低百分之二·五，其他公共機關亦繼起效之。此外各種企業之贏利銳減者，亦相率與勞工協議低減工資。同時意政府及其他公共機關，又以直接行動，或假手於工團組織，施行減低物價之政策。結果全國各地之地租，幾全部減低百分之十。零售價格之減削，雖不能與工資之率並駕齊驅，而事實上已相去不遠。蓋在此減價政策之下，惟貧苦階級受益最宏，彼富裕階級因負擔能力較大之故，自須犧牲較大也。

因此緊縮之政策，意政府卒能彌補其財政上支絀之數，計是年該國支出之虧耗，共達美金四千五百萬元。

(五) 意政府一方雖減削支出，而一方仍繼續限制外債之貸借，計在此期中，惟羅馬與

米蘭(Milan)一處實行訂借外債，此外即私人企業，亦在取締之列。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短期庫券(short term Treasury bonds)滿期，各方均風傳意政府即將發行新外債以爲償還庫券之需，顧事實上意政府靡特不借新債，且對於外國銀行團之自動請求放款者，悉行拒絕。至舊歲春季，意政府始發行新內債，以供支付到期庫券本息之需，計當時發行債額僅達四百萬里拉，而認購者竟超出七百萬里拉，結果意政府實際發行者僅五百萬里拉而已。意政府所欠外債之數如是低微，蓋亦其能應付恐慌之一種原因也。

顧汎繫主義之實施，非無相當之障礙也。彼接收黨義者，既未必人人居之不疑，而雇主之陰圖規避勞動契約者，又所在而有，惟爲數不多耳。此外全國生產階級之加入工團者，其人數亦至不一致，有一業之勞工加入特多者，有則寥寥可數。如工業上雇員及雇主之組織，即較其他經濟活動爲多。而北意各部本爲二十年來工會運動之樞紐者，其實施新制之情況，亦較南意各部爲熱烈。

關於農業及商業方面，生產者之請求加入工團者，人數較工業爲少，而尤以小地主及小

店主階級爲特少。然意大利之農商二業，固以小地主及小店主爲最重要者也（註十三）。尤奇者農業及商業勞工，雖一律享受工團之保護，雖無論加入與否，均須繳納團費，而每因各借團證之小費，而遂拒絕加入。至汎繫黨方面雖黨禁森嚴，凡非青年組織之會員，均不得入黨，而對於勞工階級，固多方鼓勵其加入工團也。

此外尙有一點爲汎繫黨所認爲危機者，卽不良份子及變節之社會黨或共產黨，挾其煽動羣衆之態度，而混入工團是已。惟是種危機，或可因時過境遷，而漸歸泯滅，獨工團之缺乏領袖人才，乃可成爲大患。故該黨頃又組織工團領袖養成所，以訓練青年，使其堪負維持及發展工團組織之重任焉。

或有問汎繫主義是否與共產主義及資本主義挑戰者。余以爲汎繫主義與共產主義，自根本不同，或且可視爲勢不兩立。蓋共產主義在政治上及經濟上，均以無產階級——而實則無產階級中之少數人——獨佔優勢爲原則，而汎繫主義則顯然爲階級合作之制度，摒除階級及階級競爭之觀念，而以調和各級之意志，保全國家之利益爲前提者也。

然則汎繫主義果與資本主義衝突乎！余以爲倘資本主義僅指經典派經濟學家所提倡之自由放任政策（註十四），則汎繫主義卽不能無異，蓋其所實施之經濟計劃，固有似於國家社會主義也。惟如資本主義係指個人之企業制度，許私人之占有生產工具，則汎繫主義似無反對之必要。蓋汎繫制度僅由國家糾正私人企業之缺點及干涉私人企業之失敗者，資本主義之原則固其所接受也。故墨索里尼嘗謂以發展世界經濟爲立場，則推行資本主義於亞非二洲，似亦今日之要圖耳。

以意大利天產富源之枯竭，則一種國家經濟制度，如汎繫主義之所實施者，實爲萬不可缺。徵此制其所有富源無儘量開發之希望也。故全國職業家聯合會之會長波德洛（Bottero）教授，於其最近對會衆之演詞中，曾謂：「根據社團國家之新觀念，則將來實應無一人得爲絕對自由之所有者，倘所有者三字仍依照其舊義而言，蓋此後之所有者祇能充分利用其權利以服務國家耳。」

然則將來之趨勢又將如何？余以爲汎繫主義之經濟制度，實與其政治活動密切相輔而

行，或固有謂經濟勢力每足以吸收政治勢力者，則汎繫黨國家之漸漸變形為社團國家，或非不可能也。惟今日該黨之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固猶在演化之中，實無一已達其最後之目的，則將來之轉變如何，可以存而不論；所能言者，獨其所共同根據之國民合作之原則，似不無成功之望耳。蓋今日之國際政策，每努力於調和各國之觀念，而使其互相諒解，俾得促成國際間更為密切之聯絡，是固為吾人所進行不懈者；社會經濟之目的，亦在促成各級人民之合作，則為社會全體之福利計，階級和平固亦與國際和平同其重要，且亦為互相促進之途徑也。

今者意大利之階級和平已大告成功，則惟力所及，以促進世界和平，非吾人之目的與希望乎。

(註一) 參閱洛塞利 (Nello Rosselli) 著馮志尼與巴若寧 (Mazzini e Bakunine 一九二七年在

吐林 Turin 出版)

(註二) 意國勞工總會與社會黨之聯合，自一九二三年八月一日大罷工後，即宣告破壞，惟精神上之結合則

直維持至勞工總會解散之時。

(註三) 是種壓迫暴動之行為，常引起極端左傾份子之激烈抗議，其示威行動之對象，一方為反對政府之反動政策，一方為對於犧牲者之表示同情。惟在現政府之下，此種暴動現象已完全消滅。

(註四) 其他意大利之社會主義者於研究旅外意僑情況之後，亦多變為意國主義者如斐里本為社會黨之主要領袖人物，及晚年自阿根廷返國之後，乃成為汎繁黨黨員。

(註五) 意國當中古時代稱行會 (guild) 為社團 (corporation)。

(註六) 凡工團以汎繁黨為名者，僅以其在此黨指導監督之下，實則大多數之團員未必盡為黨員也。

(註七) 帕拉太維多尼為汎繁黨之大本營所在。

(註八) 此種團費較昔日勞工所納與工會者為低，故往昔勞工常有不能繳費者。

(註九) 此種委員會不得與雇主及勞工之混合工團相混，因此種工團非法律所許也。

(註十) 其他階級之人民，皆可自由組織，惟欲得法律承認者，始有請求政府批准之必要。而公務人員則於進行組織之始，即須請求政府之特許。

(註十一) 意大利視法官為公僕，由考試制度選出之，既選之後，除非有極重大之過失，而由法庭證明者，不得

革職，亦不得遷調；惟因升級關係而遷調者，自不在此例。

（註十二）是年年末，其數幾達一百萬。

（註十三）大規模之百貨商店及連鎖商店，在意不甚發展。

（註十四）近代此兩種觀念常混雜不明。

資本主義之經濟制度

洛悌 (M. C. Forty) 著
王春元 譯

一 政治與經濟之進化

蘇維埃及汎繫制度，已由康慈博士及微拉里教授，先我闡明之矣。今余將繼之以個人資本主義之經濟制度，使吾人之討論，更臻完備。

凡此討論，輒易使諸制度之信徒間，引起含有派別色彩之爭辯。然際此世界困於災危，深期有以解決之今日，再為是項辯論，可謂不合時宜甚矣。故余個人所取態度，既不一味袒護個人資本主義，亦不抨擊蘇俄之國家資本主義，及汎繫黨統治下所特具之政治及經濟綱領。余所欲嘗試者，為先擬定一政治及經濟組織之總原則，而後更盡力演繹此種組織自然演進之歷程。

若就支配全體社會組織之事實而觀，吾人所應最先注意之問題，當為決定社會組織之

真實目的及功用。質言之，即研究吾人類爲自身計，爲累世子孫計，所望於社會者，究爲何種條件也。

興言及此，因憶及吾友某君所述一事。吾友爲一幹練而仁慈之老律師，嘗因徇其某舊友之懇託，雇其子湯美爲役。願不久即覺其怙惡不悛，難與共事。吾友容忍再三，終不能耐，然去之則恐傷其老父之心，留之又覺憎惡之念油然而起。正在躊躇莫決之時，而湯美已覺情勢緊張，難以戀棧，乃私向另一律師覓求位置。迨彼方來函詢問湯美之成績，事遂被發。願於茲問題又起，似非施展律師之全副智謀不能應付者。蓋吾友天性正直，不願作僞，而同時又惡摘人之短也。然對此天賜脫離湯美之機會，雅不願失之交臂。經良心上一番之奮鬪，乃答復如下：

「來函敬悉，鄙人堪以奉告者，倘先生欲物色如湯美一類之人材，則湯美殊合先生之條件也。」

余援引此事蓋欲藉以表明下列事實：質言之，倘吾人爲自身計，爲子孫計，而需求如國家資本主義，或汎繫主義，或個人資本主義等制度，則依吾人之欲望，每一制度皆合吾人所要求

之條件也。

此種解決吾人問題之手段，過於簡捷，甚非解決吾人目下困難之治本方法。蓋吾人於此仍難避免以下種種問題：如人類價值之共通標準為何；現行之經濟及政治制度，果能表現此價值至何等程度？及人類價值如此繼續表現時，社會之進化，究有如何趨勢？

吾人欲決定此根本之人類價值，則所當首先注意者，當為研究之方法。余以為無論建立任何價值，概須與發榮滋長及能繼續長存之社會，發生密切之關係，而不得與個人之願望互相牽連。如個人願脫離社會進化之正途，獨自殫智竭力，規劃一特殊價值之標準，及一特殊生活之方針，是乃個人之權利，固無容疑異。惟個人既如此擺脫一切，則此後行動，即須深自克制，不可以其自身之計劃說明社會之問題；實言之，吾人當建立任何社會價值時，至少務使其與社會之永續性，並與其蓬勃無礙之進化，恰相符合而後可。

當吾人決定種種社會價值，而為之設立背景時，不妨再進一步，直認吾人所研究者，乃一進化之過程。於此吾人又當深切注意，無論個人之智能若何優越，決未能及於千萬年來人類

累積之經驗。故吾人所探求之社會價值，必不得爲個人欲望及幻想之結晶。吾人應根據人類過去之歷史，及現在之趨勢，而確定人類進化上自有之要素。蓋吾人自身之欲望，及理論抒發愈少，則觀察事物之真相，反能愈形真確，而所得結果亦能愈近真理也。

關於此點，余請鄭重申言之，余以爲國家最珍貴之寶藏，厥惟人民之理想，而國家最大之損失，亦惟消耗此種理想於根據錯誤前提之努力及計劃。吾人之問題殊非爲社會謀千萬年之長久計劃，但欲如愛默生（Emerson）所云：「認受此宇宙間之自然現象」非欲強求烏託邦之實現，惟欲隨時努力行合理之舉動耳。

使吾人自嚴格的進化或歷史之立場，探求種種人類之基本價值，則即須首先明瞭，自然界既願生殖高加索人於世，則對於南非之荷頓篤人（Hottentot），當亦無歧視之心。易言之，造物除種族生存之價值外，絕不認有任何其他價值之存在。何者適於生存之試驗，僅在其生存之能力而已。

在生物發展之過程中，自然界顯示一極有秩序之進化，即自無家庭生活之最低等動物，

進至有家庭而無社會生活之次等動物，最後乃進至包括人類之最高等動物，於是家庭及社會生活，胥臻完全矣。

在悠久之進化行程中，顯然可見自動物之族類始，至組織完備之人類部落或國家，其間每一階段之社會發展，靡不使生存之條件，易於適合。如家庭生活足以保障發榮滋長之人種，而社會生活則除扶助個人之發展外，復能組成部落以抵禦外界勢力之侵擾，或開拓疆域於毗鄰之境。

個人與社會在進化健全之社會中，不啻訂有自然妥協之契約。個人為社會之福利計，寧犧牲其無謂之自由；反之，社會亦放棄其非必要之統一性，以保留個人自由之真正價值。

此種關於社會權力及個人自由間相對價值之妥協制度，實未嘗根據任何理論而成立，其惟一測驗，乃在種族生存之條件而已。凡一種族過於抑制個人之意志者，其公眾之勢力，一時固可增強，而阻礙個人權力之發展，則未始不為一種損失，蓋蜂蟻等類動物之生活，完全不適合於人類之條件也。顧反之如一種族過於重視個人之意志，則苟與組織較為嚴密之人羣

相角逐，勢必終歸淘汰。

進化過程中之特點，在人類史冊上述之甚詳。歷史上及遠古以前之事例，在在昭示吾人，種族之移動，恆於人口過多，及糧食不足之壓迫下，連續不已。種族之強者，往往逞其軍備之優勝，起而征服附近之弱者，並盡掠其所有。故倘無人類感情上之反應，軍事之權威，在進化史上固可佔一席之地也。

願吾人如於此卽下一結論曰：人類價值與社會制度之價值，乃本於其戰時對於種族或國家所貢獻之勢力而定，則又爲抹殺一切事實。蓋人類進化迄今未止，洎乎近年此種進化又進至一最大之階段，卽世界各文明國家之人口數額，已漸趨穩定是已。因此種進化上之變遷，吾人乃亦深切認識人口之純一性及團結力，實爲種族或國家勢力之主要特徵。此種觀念，吾人在本能上，早已有相當之認識，惟茲乃更爲深切明顯耳。

關於上述進化觀念之最近變遷之要旨，社會上頗易有含混不明之理解，請再爲詳細申述之。吾人之希望與計劃，鮮有能超出百年以外者，如有一種建設之思想，能及十年以外，則卽

爲萬幸。種族之分別，如以地質學上之時間言之，實屬毫無意義。萬年以前人類之始祖，或猶不逮今日所視爲最下等之民族；反之又安知萬年以後今之黑人及紅人，不爲文化之前驅耶。然此悠久之時代，究非吾人之意識所能逆料。故吾人今日在本能上之所認識者，卽爲種族之分別，無論何種事實及時間之下，將永續不變；惟此種觀念有時爲離經之情感所蔽，乃不能普遍了解耳。

凡善耕之農，必不誤其播種培植及收穫之工作。而當其致力工作之時，亦必專心壹志，心無外用，究竟環境與遺傳，對其工作上之影響，孰爲重要，或改良之耕種，與改良之種子，對於收穫上之關係孰爲重大，非其幻想之所及也。

吾人之培植人類文化亦然，對於種族特性之有基本差異，在本能上卽認爲當然。其次，吾人亦知無論一民族之特性如何，其社會組織之健全與否，胥視其種族之理想，團結力及遺傳習慣以爲斷；同時其各階級間是否有障礙之存在，亦爲一重要之原素，蓋階級之障礙愈強，則社會之團結力卽愈弱也。又根據生物學上之經驗，凡一種族之自尊心，及不願與他族血統混

合之性僻，亦能衡定一種族或一國家之精力。關於此點，吾人殊不必列舉科學上之理由，即人類本能上之理由，已可謂為最適用及最合科學原則者。吾人祇須自問願為子女嫁娶何族人種，即足以解答一切矣。

種族自覺之日益顯著，既如上所述，各國人口穩定之趨勢，又彰彰昭著，故吾人可謂世界人口之發展，已闢一新紀元；實言之，舊日大量移民之現象將從此湮滅，而各文明國人口穩定及純一之現象，則開始發現也。

近代之史蹟，將來開始編纂之時，吾人必覺歐洲大戰所以有重要之意義者，祇因其為導發此種大變遷之引線而已。惟今日吾人祇須注意斯變之發生，已根本變動人類及世界進化之要素，即已足矣。

武力侵略之說，向為文明各國所認為國家政策之工具者，茲循進化之潮流，已至窮途絕境。凱洛非戰公約，迥非別開蹊徑，祇承時勢所醞釀者而已。吾人對於未開化及莽亂之邦，業已採取委任統治之制，以代武力之侵略。惟半開化之邦，則恰如一國人口中之半低級成分，然仍

成爲問題。蓋低級之民，如集聚於社會之一隅，猶如未開化之邦，委諸列強統治，尙不足爲害。惟半低級民族之特性，如蔓延於人民之血統，渲染社會之生活，則無異疫癘之爲禍也。

吾人自不能謂人類已目覩戰爭之尾聲，國際間之小衝突，將仍存在，卽大戰或仍不能倖免。內鬨及政治糾紛，更將隨時日之逝流，而起伏不已。但世界人口穩定之大勢，已顯然昭示吾人，社會進化之途，確已變其方向，則估定人類價值之標準，固可重新規定也。舊思想之末日，已迫目前，國際間之惡棍，殆成陳跡，則曾經參戰之國家，固須負保障國際安全之責任，而不得有所規避也。

人類進化之行程，在此新情形之下，果將何所適從，吾人雖不能極明確陳述之，但至少可以追踪其大體之綱要。

第一，進化過程中之部分，間以征服，擄掠或兼併其他民族爲手段者，將淪於無足重輕之地位。

其次，各國帝位之爭奪，及其附屬之社會制度，如荒地之佔有等制，將因帝制之式微，與荒

地之絕跡，而同時湮滅。雖帝制業已推翻，而民主政體猶未成立之國家，又有所謂個人獨裁之政治應運而生。惟今日之獨裁者，大都仁慈過人，不欲窮兵黷武，如西班牙已故之里徹拉（Primo de Rivera）卽其一例，而新時代之情勢，亦鮮足引誘其利用對外戰爭爲對內政爭之手腕。卽今之蘇俄政府似亦瞭然於世界之問題，應聽世界之自然解決，所希望者世界對於蘇俄亦能取同一之態度耳。故今之列強中，惟意大利之墨索里尼仍不斷聲稱其人口之繼續增加，而有向外發展之必要。

健全性在許多不健全性之無窮距離間，僅一極渺微之平衡點而已。故使今日世界進化之途徑，仍不以國際和平爲自然之途徑，則吾人如希望得一更爲健全更爲和平之世界實爲夢想。所謂真正之國際聯盟，決非人力所能創造，惟此種思想之活躍，則雖在滿途荆棘之中，仍足顯示自然之國際聯盟將仍必繼續發展也。

欲爲此種聯盟之會員，姑不問其名義上之資格將如何規定，而事實上則必具如是條件：卽人口之數額已達穩定之勢，各國間互有管理移民之主權，互有運用稅則以利導貿易之主

權，惟以不至掀起貿易潮流之大風波者爲度。此外並應誠意廢棄以武力侵略及對外政治宣傳，爲國家政策之基礎。

最近政治及社會進化中之主要變遷，吾人已備述其梗概矣。今日種族或民族之生存與進化，不妨視爲個人然，但未來之人類進化，則將爲一整個的社會制度之進化。凡一制度足以應付上述之國際義務及維持內部之統一者，始將與世並立，否則必歸淘汰。故所謂社會價值之測驗，仍全爲其生存之能力而已。至是吾人或可總括以上種種分析，而下一有關於將來社會之結論，即一社會之基本與永久之價值，在能促進國家之統一，增強應付外來侵略之抵抗力，及建樹一健全，忍耐，而不含侵略色彩之對外政策是已。

今日之世界，吾人仍可偶見一二傳統政體之殘跡，如舊日之王國及帝國是已。其傳統政體業已傾覆，而民主政體猶未成功者，則又有獨裁政治繼之而興。此外古時之宗教王國，猶復掙扎於吾人之前。但最近之將來，吾人之注意，勢必集中於三大制度之思想鬭爭——以個人資本主義爲根據之民主政體，一也；意大利墨索里尼及汎繁黨所主持之政治經濟獨裁制，

二也；蘇俄獨裁政府統治下之國家資本主義，三也。

如上述之分析，果屬無誤，則斯三制之最後存在將依此兩種原則而決定：一，視其與毗鄰各國維持和平之能力；二，視其滿足人民天性之能力；所謂滿足，即謂能使其內部之統一，足以發展並保持其現有或以後進化之狀態也。

關於國際關係之問題，吾人茲可置之不論。最近蘇俄政府已發表其政見，謂俄國自能發展其制度，且已大收成效，不必同時有反資本主義之世界革命而始能成功。又據最近傳聞所及，意國之墨索里尼似亦有接收節制生育原則之態度云。

任何形式之獨裁制，不問其為個人者，或為有組織之政黨者，或為狂熱之理想所造成者，皆具有一種重大之缺憾及趨勢，即易惹起國際間之糾紛是已。此種缺點，民治政體以有種種牽制及調劑之力故，獨能避免。然吾人亦可假定，使蘇俄及意大利政府，果能完成其內部統一之計劃，則獨裁制度足以助長國際糾紛之弱點，或亦未必不因內部建設事業之般急需要，而暫時隱藏。

據上述之假定，則吾人對於三種政制之考慮，似可集中於發展內部及滿足人民之自然欲望等等要素；質言之，進化價值之權衡，乃在國家之統一內部之能力，而國家統一之條件，則在全體人民深知社會秩序之可貴。然內部統一之國家，同時又應有抵禦外侮之能力，而後合於維持生存之條件。

其次，吾人又可自此點，更進而為簡單之觀察。余以為人類之基本欲望，乃在經濟方面，而且為滿足其最低限度之經濟欲望起見，常不惜接收任何形式之社會組織。故簡括言之，人類之第一需要，為生活上之必需品，而當此第一條件業已滿足時，則其第二需要即隨之而起，所謂第二需要，並非個人之絕對自由，而為種種特別指定之自由；質言之，即每人得於不侵犯他人同等權利之範圍內，而追求其自身之幸福也。

若此三制——個人資本制度，蘇俄之國家資本制度，及汎繫主義之政治經濟獨裁制度，各能盡其天然富源之能力，源源供給其人民，最低限度之經濟需要，則其人民以後對於滿足經濟欲望之追求，決不逮其追求自由之迫切。故任一制度或此三制均有存在之可能，祇須其

於滿足人民之經濟欲望後，猶能滿足其企求自由之欲望。

當吾人討論人民對於自由之自然需要時，使能判然分別何者為主要之經濟自由，何者為純粹之政治自由，則吾人之討論必能更為簡易。

原始之政治自由，僅能存在於游牧之民族中。農業文化一經開始，則人民即為農產及土地所束縛，而有組織之專制政體，亦即於斯萌芽。

政治自由，據吾人所知者，亦為一種逐漸進化之產物。所謂代議政治之演化，蛻嬗，英美政治史上演之最詳，蓋自羅馬帝國崩壞封建制度代興以後，其間固有千餘年連綿不斷之史蹟也。其進化之秩序為自割據之諸侯制，進而為專制之帝國，又進而為君主立憲制，最後乃漸漸發展而成今日有國會及代議形式之民主政體，踪其進化之跡，蓋頗合邏輯上因果之原則也。

在政治進化之全部過程中，吾人所獲主要之經驗，即為不問統治者之形式，為由於選舉，或由於世襲，或為在朝之政黨，祇須其能代表社會平均之權力，則胥稱上乘。蓋政府之第一要素，為能穩固；而政府之穩固與否，則視其能否代表真正之民衆權力也。

欲代議政治之健全，以能合理的履行此基本條件，爲惟一要素。代議政治之原始爲民衆軍權與政府軍權之逐漸混合。惟此種政體與其普及選舉權之理論，所假定以人數爲權力單位之原則，終難掩其瑕疵。蓋嚴格言之，人民祇可有選舉權力，而不能有選舉權利，使吾人必爲政治學下一最後之結論，則吾人實祇能根據各個人民之能力，而有多數選舉權或分數選舉權之名稱也。

惟近代民主政治之大勢，大抵趨於以一人有一權之原則，爲普及選舉之標準。此種制度，在教育普及，人口純一，及階級上，宗教上，經濟上或種族上無重大差別之國家，雖有上述之缺點，仍能有優良之成績。蓋在此種國家中，常有兩個政黨同佔勢力，彼對於國家政務無充分瞭解之民衆，每於不知不覺之間，分屬於兩黨，而使投票之時，贊反兩方，常現均勢，因之彼優秀份子，乃能充分利用其理智而實際掌握政權焉。

反之，彼國家之教育落後，團結力薄弱，而又有種族上，社會上，宗教上或經濟上之歧異者，則民主政治即不免於崩潰。蓋在此種國家中，所謂政府之治權，必足以代表社會平均權力之

原則，已難實現。各獨立之團體，每傾向於組織獨立之政黨，以致選舉票數每難集中，而智識薄弱之階級，乃在選舉上發生重大之效力，而一般人民之福利，乃有不得不因一二政黨之暫時妥協，而完全犧牲者，其流弊可勝言哉。

上述民主政體之種種特點，歐戰以來已不如前此之緊張。各國自世襲政體嬗變為民主政體之政治演化，因主權之失人信仰，已有中道梗阻之勢。顧人民未有充分之政治訓練，而遽與以政權，其前途實難揣測，退而逆行復辟，又為事實所不許，於是獨裁制度乃應運而生。惟所謂獨裁，其立場亦不一致，有公開自認為此種制度者；有寄託於某種組織嚴密之政黨者；亦有假託公開選舉之名，而陰行獨裁制度之實者。

故在此主權失勢之時，世界祇能取捨於此二制之間，即民主政體適用於有能力及有團結之人民；而獨裁政體則適用無政治能力及無鞏固組織之人民。

此輩獨裁首領，如斯丹林及墨索里尼者，余深信均係正直之士，鞠躬盡瘁以期增進人民最終之幸福。且自其一生政治生活觀之，其所以為獨裁首領者，均非出於本人之欲望，徒以環

境所迫，大勢所趨，乃不得不視此種制度爲安內攘外之惟一捷徑耳。

所謂絕對獨裁之政治，其理論絕非複雜。簡言之，乃在補充國防軍隊，編練祕密警察，收買黨外政敵，及於相當時機，殺戮或流放頑強之反對黨。同時並以有組織之方法，監視言論，管理教育，及宣傳獨裁制之特色。最後並努力促進國內人民之經濟需要，使人民不至因過度之窮困，或過重之壓迫，而有挺而走險之虞。

使上述獨裁制之要點爲無誤，則吾人殊無理由可信獨裁制之未能久維不敗，至或謂當獨裁制之政治首領年事日高之時，每難獲一繼任者，以圖蕭規曹隨，亦非事實，蓋獨裁制所需之政府，非必需要中駟以上之人才也。

故就政治學說及經驗而言，謂意大利及蘇俄現在形式之獨裁政治，將來能維持至一世或數世之久者，實係無根之說。果爾，則此二制固可以其所有之經驗，爲世界各國之借鏡矣。願吾人如欲得一融和廣博之政治經濟制度，而欲認之爲最後理想之形式者，則此二制尙無一足以爲訓。蓋政治進化之程序，雖極爲迂緩，極爲困難，而其趨勢則顯然向於代議之政治，使吾

人言及最終之經濟制度，而不以民治形式之政治背景為根據者，則恐大失政治進化之真義矣。

蘇俄及意大利制度之建議者，固亦明認其所取之政制，僅為實行民主政體前之一種過渡辦法。然據旁觀者之觀察，此所謂過渡，恐可望而不可即也。

此二國之政治見解，似先在提倡教育，俟經歷三四十年以後，全體人民對於國家資本制度，或汎繫制度之體用，均已充分訓練，而後真正之民主政府始能創立，而政治與經濟制度亦不致有過驟之變化。

吾人對於政治自由及種種特別政治要素之討論，已頗為詳盡矣。其要點乃在凡所考察之政治及經濟制度，如足以垂示將來，則此種教訓必為關於民治政體者。故此後吾人所討論之問題，將不再為政治之形式，及政治上之自由，而為種種經濟之原則，及民治政體下之經濟自由及經濟裁制。

吾人對於此種純粹經濟之考察，首應認清其立足點，即在經濟學中，猶如其他實物然，絕

無極端之黑白，吾人所研究者，恆爲無限之灰白，及無限之妥協是已。今謂凡健全之社會，不當用種種之方法，保障其組織之份子，使其權利不至受破壞性質之攘奪，此語殆無人敢承認之。今之問題，乃在此項保障如向經濟報酬平等之目標而進行，則在不問生產力優劣，惟問有否勞動之形式下，果能施行至何等程度是已。其次，亦斷無人敢公然承認一切經濟權力應盡屬國家，或個人應絕對無經濟上之自由。實則所謂問題，乃在如何能使斯二者維持有效及合理之平衡是已。最後亦無人敢言爲確保職業穩固，及維持家庭收入起見，吾人不應對於經濟效率及其他等項，略作犧牲。蓋是仍爲兩者平衡之問題，即謂就完全穩固之趨勢上，應止於何點，庶足使所損與所獲者兩相平衡是也。

吾人在民治社會下，對於上述種種利害權衡之妥協，爲最後之決定時，必須重新憶及，吾人所用價值之權衡，必取其合於進化原則者。且更須注意，吾人所研究者，應爲人類本能上之自然行爲，而不得爲吾人私見上之是非得失；是則吾人討論問題時，應取之態度也。

願吾人於研究上，仍可得一自然之準繩，即就長時間言，社會進化將不悖真理而行是已。

故吾人如能決定絕對之經濟事實與經濟定律，並洞瞭主要之人類本能，則吾人即可直言，凡經濟制度能與此事實及本能相符合者始具價值而足久存——反之如與是相背者，即制度而不與此事實及本能相融洽者，則必不久發生變動，或終歸淘汰。

吾人觀察經濟制度，所首先接觸者，即為任何常態之社會及人民，如不問個人之生產力如何，而使凡心身健全之人民，皆能於其經濟上之滿足，達到完全或一部平等之地位，則此種制度，究能推行至何種限度。余以為人類之本能，似一致反對是項經濟報酬平等之原則。即如蘇俄政府雖在原則上崇奉「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之極端社會主義，而按之事實，則在工廠中業已引用包工制度；且現為增加生產計，又擬採取個人資本主義下成效卓著之政策矣。

上述之問題，如在各個勞工能力顯然差異之情形下，其答案應至為自然而顯明者。蓋個人因經濟權利之所在，自不得不力求與其努力相比比例之酬報。所有之生產制度，除純粹之奴隸制度外，如於報酬上，不有等級之分別，則其產額決不獲相當之成績，而凡有經驗之企業家，亦決不遺忘以個人犧牲為報酬比例之等級制度之重要。如報酬之等級不分，或雖分而無正

確之標準，則其結果必足以阻礙勞動者服務之精神，而使產額及工資之平均額，且不能達到正確等級報酬制度下之最低產額及工資；實言之，昔日亞丹（Adam）之所指摘者，今日其理由仍未少變。蓋凡屬人類斷不願已盡汗血之勞，而其他同具官骸之人，徒以才力不足之故，乃反得染指其勞力所得之全部或一部也。

設令今之蘇俄政府，完成其理想之計劃，則其對於勞心或勞力者，是否將不問各個人生產力之大小，而抑制其應得之酬報，固不可知。而按之事實，經濟報酬平等之要求，在表面上亦原無大害，其所謂危險乃為間接而潛伏者耳。蓋社會上一般能力薄弱之人，每有一種成見，以為在任何事物之經濟計劃中，必有若干不勞而獲及來歷不明之財富，此種財富應不用以預防絕對破壞性之掠奪，而應用以救濟身心健全者，使其可以免除防老防饑之責任，此種思想，乃為要求平等報酬之真正危險也。

關於社會保險，則又為一種權衡利害之妥協制度，須特別加以注意者。惟目前吾人不妨先一假定一大前提，即任何經濟制度，如欲與根本之人類本能及經驗相融洽，則必須規定一

與個人生產力適相比例之酬報。

蘇俄政府自默認上述前提後，其向所主張之共產主義，遂變為國家資本主義。惟即在此種理論之下，吾人仍不難窺見其國家與個人依然有互相妥協之處。如其國營農場之產額，已佔全國生產總額百分之五十，且有繼續進展之可能。而另一方面則工業生產中百分之四十，仍屬之個人、家庭或家族所營之手工製造業。

自蘇俄急驟之變化中，苟許吾人為之下一結論，則吾人可謂此類手工業此後將仍在國內生產界中佔永久之地位，而國營之生產組織，則將大部偏於基本工業及大規模工廠。

顧蘇俄經濟要素之大部分，雖依然保留其各個之特質，而國家所提倡之基本工業及工廠事業，則終將激起巨大急驟之變遷，而使其與他種經濟制度大相逕庭。此項蘇俄制度之特點，吾人當特別注意之。

惟吾人於着手分析之初，不妨先將各方面之背景，一一加以研究。

經濟制度之要素為勞動（包括勞力及勞心）、重殖資本及天然富源三者。天然富源——

如土地，森林，水力，及礦產等等——社會可以納年租或收規費之方式吸收之，其影響既不妨礙個人之經濟創造力，且反可擴大個人弋利之機會。如英國現已有土地稅之徵收，意國及美國亦可不必變動其經濟制度之實質，而做行此制。美國天然富源之實際收入，約佔其全國所得總額百分之八。此後農業進步，人口穩定，及因汽車與交通改良之影響，人民將自人煙稠密之都市，趨至市外之村落，上述百分率或將更見低落。是項問題固屬重大，但尚非主要者，且可在任何情形下，與吾人所研之其他要素，分別討論也。

關於社會保險及職業與家庭收入之穩固問題，亦可如是個別討論。在實行個人資本主義之國家中，社會保險多已發展至極高甚或過高之度；此種情形如行得其法，自為資本主義下所不可缺之附屬品。至目下俄，英，德，美各國所行之社會保險，雖因國而異其性質，其短長之處，亦各有不同，但均可視為經濟制度中截然獨立之部分，而得以分開討論也。職業及家庭收入之穩固問題，情形亦復類是，惟不若此明顯耳。

當余作此數行時，余方歸自距附近車站六十里外之地方，蓋正於該處擬雇一失業之人，

爲余次日工作也。顧談到結果，此失業者乃寧閒居一日，不願工作。此外卽其儕輩求業之心，較之此次不景氣發生以前，亦未見其若何迫切。於斯可見一般勞動者，猶以服業一事，爲顯然有利於雇主方面也。

上述情形足以昭示生產力極高及有組織之經濟制度，與尙在幼稚時期者相較，其差別何在。今日蘇俄如認其失業情形，所以不發生之故，爲由於其軍隊組織之嚴密，固未嘗不合。但如謂其由於下列之情形，則當尤爲貼切。蓋據蘇俄當局之估計，其全國所得 (national income) 爲三十四萬萬盧布，以人口一萬六千萬計之，平均蘇俄每人每年之收入，最佳者亦不過合美金一百餘元，較之列強之國民所得，每人有超出二倍以至七倍之多者，實相形見絀矣。

使吾人更將盧布之購買力折實，則蘇俄每人每年之平均收入，當不滿美金百元。據精確之估計，謂此數如與一九二九年美國每人之平均收入七百三十四元相比較，則僅及其十分之一耳。

試更就職業穩固之問題言，則上述之差別將不在程度上，而在種類上。今日蘇俄之制度，在其措置失業之設施上，或尙能在一世以內，推行無阻，而不至遭遇美國今日之失業情勢。願即使以個人資本主義之美國言，此職業穩固之問題，亦未嘗不能作合理之解決。且仍得視爲獨立之問題，而不與經濟制度之基本結構混合討論也。

夫如是則吾人所討論之要素，將至爲簡單。蓋吾人茲可假定，凡所觀察之三制，其最後之途徑，將必歸宿於民主之政治形式，及充分發展之政治自由。其次，吾人又可撇開國際關係及純粹共產主義下經濟報酬之分配問題。此外如土地及天然富源之國有，社會保險及職業穩固之問題，亦皆可略而不論；因是云云者，皆爲各制所共有，亦所共能解決者也。

因上述種種要素之撇除，吾人之問題，遂祇限於個人與社會之經濟活動，如何始得維持有效之平衡，而使人人皆能接受。質言之，卽社會之經濟權力與個人之經濟自由間，應如何妥協，方足以使全體人民確信社會秩序之爲有用而可貴者；蓋社會秩序固國家統一之第一要素也。其義當於第二次演講中詳細說明之。

二 國家與個人機能之妥協

余於前次演講中，對於個人資本主義，汎繫主義，及蘇俄國家資本主義之討論，已爲之立一普通之範疇，即個人與社會間，應如何平衡其資本所有權，及調和其經濟活動是也。

吾人對此中心問題之研究，最爲重要者，應首先觀察吾人理論所根據之種種前提。如就滿足人類本能及發展國家統一性之觀點言，個人資本主義，對於財富及個人所得，是否發生，或是否必須發生種種有害之分歧現象。又就純粹生產效率之立場言，個人資本主義之制度，是否較國家資本主義之制度有更大之效率，或有增進效率之趨勢。

馬克思主義之大前提，謂重殖資本之利息與紅利有吸收資本制度下一切增加的生產力之趨勢，（除一部分爲天然富源之租金所吸收外）所遺留與勞工者，僅些微足以維持生活之工資而已。

個人資本主義之大前提，謂資本（除土地及天然富源外）就長時期言，所收入者，僅爲

餬口之工資。進化之經濟制度，所增加之生產力，大部分累積而成增加實際工資之形式，而使勞工實受其惠。

此二種前提之未臻正確，實爲顯而易見，故吾人之要圖，乃在觀察事實之真象。

普通利率之決定，據通常之經濟學說，須定於一點，使此種報酬，足以誘人節省其購買消費品之一部代價，而用之於投資取息之形式，俾得有現款可供製造生產品之用，而藉以滿足社會對於新資本之需要。其次，經濟學說又謂在自由競爭之情形下，因競爭之作用，資本家增用新式及改良之機械，所獲之報酬，除危險之代價，及增用資本之普通利息外，不過爲暫時之性質。是故就長時間言，凡增加之生產力，除新添資本之普通利息外，均將化成低減價格或增加工資，或兩者併合之形式，而使勞工享受其利。

欲確斷上述學說之健全與否，必先注意現在之資本制度，事實上是否果爲純粹之競爭制度，抑大半仍爲獨占之行爲，使投資者獲得超越尋常之收入。

使研究結果，證明資本制度果係根據競爭原則而進行，則其次吾人即須決定實際工資

是否果因生產力之增進而提高，一如經濟學說之所敷陳者。

吾美之個人資本主義，已有極顯明之發展，而其近年關於是項問題之統計材料，又完備而可靠，則所予吾人之便利固不少也。

據各邦商業委員會 (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 及各公用事業委員會之紀錄，吾美之公用事業如鐵路、電報及電力各公司，均有國家監督之確定法律，且就一般情形而言，其每年如有利潤，亦祇足以誘致新資本之投入，或較之略增一二而已。故其公用事業之取費問題，雖時時成爲衆論集注之爭端，而其最終之結果，無論民衆及政黨如何興奮，恆不過於法定投資報酬之率，略增或略減若干，其增減之數常爲百分之一以下之分數，鮮有高至百分之一者，是以吾人不妨斷定吾美由國家監督之獨占事業，對於資本之收入，僅獲些微之維持費而已。

關於種種物品之生產，則據吾人所知者，吾人所消費之大宗物品，大抵在激烈競爭之情形下，而生產與分配。舉凡食品、衣着及家具等，皆屬此類。

至於有獨占可能性之一類物品中，則大抵爲鋼，非鐵金屬，水泥，木材及機製工具等等。此類物品之消費，在通常情形之下，似鮮有顯然競爭之形式，故人有疑其獨占取利爲可能者。是以關於此類之生產事業，吾人即當詳察其內容，以視獨占之跡是否存在。

吾人所得之第一證例，當爲休門及克雷登法案 (Sherman and Clayton Acts) 與聯邦商業委員會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之成立。其次，果敢之政治家之將對於非法之獨占事業時加攻擊，亦爲吾人所深信不疑者。故今日吾美之大規模企業在各方面皆受聯邦政府之嚴格裁制，而反託辣斯條例亦有切實施行之明證，間且有過於嚴厲者。然則吾人又可謂今日大規模之獨占事業斷無有能避政府當局之耳目，而公然存在者也。

又美國之各業聯合會，常與政府當局，共擬根本方案，藉以消弭過度競爭之影響，則美國政府之取締獨佔事業之效果，又得一有力之反證矣。

其次，各工商團體，所編製之公司所得稅統計，亦爲一種有力之證例。在是項統計中，吾人所得最重要之數字，當爲淨餘在銷售總額中所佔之百分率，即可視爲投資之利息及紅利部

分者。據此項統計，自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八年間，各製造公司之逐年淨餘，約自百分之〇·三以至百分之七·一三，平均為百分之六·〇四。更有私人公司之報告，擇其業務較為發達者言之，其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九年間之淨餘百分率為自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一四·四，平均為百分之九·四。

據上列統計以觀，似尙無過度獨占利潤之形跡。其次，吾人又須注意，以上所舉並未涉及投資之實際數額。故所謂淨餘之率，其正確與否，胥視銷售總額之估計，及政府徵收所得稅時對於資本之審核，是否正確以為斷。惟吾人殊不難證實稅務當局對於所得稅之徵收，固絕鮮偷漏之機會也。

不惟此也，今日美國從事投資事業之組織，又多延聘專家，專事蒐集各大公司之財務及業務報告，而加以深切之研究。所異者，其所研究之目的，乃不在探求何者為獨占之事業，以便投資其間，而在防制資本之投入重息厚利之獨占事業中，蓋由經驗所得，是項獨占往往不能持久，而當其失敗之時，又常足以影響工商業之全體也。獨占之事業，自專家視之，惟能運用獨

占之權力，以保障穩固合理之收入者，始為可靠，利益優厚之條件，非其所欲注意也。

綜合上述之證例，余敢直稱美國近年來大量生產下之獨占利益，就其超出通常競爭之利益者計之，其總額決不至超出全國所得總額百分之一，甚或不過在百分之〇·五以下而已。果爾，則吾人殊可深信個人資本主義之在美國，確係基於競爭之原則，即在其他各國亦可作如是觀，惟程度或有差異耳。

吾人既假定以競爭的資本主義為對象，則其次即須決定此制在實際上果能吻合經濟學說至何等程度。質言之，投資之報酬對於全部產額之百分率，是否有固定或減跌之趨勢，而實際工資是否有隨之增加之趨勢。抑反之，資本之報酬是否有遞增之趨勢，而實際工資則有固定或遞減之趨勢。

關於投資之額率，直至美國施行公司所得稅後，始有相當之統計。是項數字因戰時及戰後之非常情形，自難昭示其明確之意義；惟一九二六年之統計，則頗足以代表最近經常旺盛之時期，因在此期間內，尚無極端膨脹之企業活動也。據是年統計，全國製造公司之資產總額

共爲六百五十萬萬金元，其中除爲調整流通資產，使化成淨額起見，減去五十萬萬金元外，應爲六百萬萬金元。根據此項資產總額，除去各項稅額後，其淨益約爲百分之六·七；易言之，利息與紅利之和，合計當爲四十萬萬金元。其中有數公司之財產，全部或一部轉屬於其他公司，故所得稅統計所包資產或盈餘之額，或有重疊及複見之處。但即使將此項重複之額抵消，亦不至十分影響上述百分之六·七之額率，因如是則是年各製造公司之資產總額，亦將因此而減爲五百萬萬金元也。

同時所得稅之統計，昭示各業支付紅利及利息之實數，一九二六年爲百分之五·六，則與上述百分之六·七之率，可互相比較也。

爲較核投資報酬之額率起見，吾人又可以普通之資本周轉率 (rate of turnover) 應用於上述銷售總額之平均利潤率，即百分之六·〇四。如是則自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一年間，製造業之平均資本周轉率似爲百分之八六（註二）；易言之，即謂平均每年之銷售總額等於各製造公司所周轉資本總額之百分之八六也。根據此項比率則各公司足供應付利益與

紅利之淨益，其率當爲百分之五·二，與前述企業旺盛之一九二六年，百分之六·七之率，殆相差無幾矣。

吾人如欲將上述之數字，作一長期之比較，則不妨重提亞丹斯密所常述用之語，即謂當是時（指一七七六年以前）複利可視爲正當之利益是已。原富論投資利益之一章所陳事理，即在今日視之，亦可絲毫不爽。凡成功之企業家及製造家，殆無一不視複利爲其正當合理之收入。願事實上若輩所得者，恆爲單利而已。若夫子母盡折，則更爲經營企業之失敗者，常所見之不幸事件也。

故今日美國工商界中，所有一切之投資，其平均之盈餘，就長時間言，每祇爲些微冒險之酬勞，其數僅略超出公債之利息而已。此項證例，雖屬散見，但皆至爲明顯。而一般對於此項問題有深切之研究者，且謂如將種種失敗之合法企業，所損失之數完全計入，則雖上述些微之酬報，能否實現，仍屬疑問也。

此種結論，使吾人之分析，又可深進一層。蓋吾人既知美國之資本主義完全屬於競爭之

性質。而競爭之作用，又似使投資之報酬，平均祇能略略超出公債之利息，則按之經濟學上勞動爲「最後承受者」(residualy legatee)之原則，吾人又須研究以下種種事實：(一)勞動在工業之產物項下，所分配之部份是否爲固定或遞增之額？(二)所謂實際工資是否有遞增之勢？(三)使資本所吸收之產額遞增不已，則實際工資是否有隨之增加之可能。

關於第一個問題，當以美國國家經濟研究會(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所編製之統計最爲翔實可靠。據該會對於美國國家所得之分配所作第一次之調查自一九〇九至一九一八年間，該國礦山、工廠及陸路運輸諸業之產額淨值，分配於工資薪水與資本之間者，計一九〇九年前者爲百分之六八·七，後者爲百分之三一·三；一九一八年前者爲百分之七七·三，後者爲百分之二二·七，其餘各年則皆升降於此兩組比率之間，惟一九一六年工資及薪水所佔淨餘之比率，則曾一度跌至百分之六六·七。

厥後該會又繼續編製相同之統計，直至一九二五年爲止，凡雇員所得之薪水、工資及養老金等，在各公司淨餘內所佔之百分率均行計算在內；實言之，蓋可代表三大實業之雇員所

獲之全部所得者也。茲分別述之：

關於製造業者，自一九〇九年之最低額，百分之七九·九，升至一九二五年之最高額，百分之八七·八，其中惟一九一六年曾低至百分之七六·八。

關於礦山及油井者，一九〇九年為百分之七一·四，一九一六年曾一度降至百分之六〇·五，但不久即又升騰，直達一九二〇年之最高峯百分之七八·五，一九二五年又跌為百分之七一·八。

關於運輸、交通及電力各業者，最低額為一九〇九年之百分之六三·九，以後即逐漸升至一九二〇年之百分之八二·七，一九二五年又跌為百分之七五·六。

以上所舉數字，皆為關於組織嚴密之工業方面者，其所謂工資與薪水之數，均曾包括管理人之酬勞在內，故在此類工業之下，上述統計，殊可昭示資本與勞動之分配情形，而無顯著之差誤。惟當吾人述及農業方面，則情形即大相懸殊，蓋據統計之數字，工資及薪水之數，僅佔該業全部所得百分之一五也。但所餘百分之八五實均係作為農夫及其家人之工作酬勞，不

得視為使用資本之酬報。

陶格拉斯 (Douglas) 教授於其所著之美國四十年來之實際工資 (Study of Real Wages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1890 to 1926) 一書中，曾有關於勞動報酬增減趨勢之結論一則，茲可引證其言，以見上述數字之不謬。其言曰：

「……是故使吾人就製造業之全部材料而言，不單論其生產之物質，而綜觀其生產之價值，則如謂自一八九九至一九二五年間，勞工對於產物價值之分配，已有逐漸趨減之勢，殊非正確之論。蓋證諸事實，勞工分配生產之價值，在一八九九至一九二一年間，確已逐漸增加，其後雖又跌落，而在一九二五年仍超出一八九九年之平均數額也。」

數年前余因私人參考之需，嘗搜集所有關於美國國家所得分配情形之統計材料，而研究之。嗣即得一結論，計在國家所得總額中，百分之六八為個人直接或間接之勞役報酬；百分之二四為使用資本之代價，（包括不動產之利息，）百分之八為土地及天然富源之租金。

此種百分率之編製，雖於茲已歷十載，然殊未敢謂其已有實質之變遷。據余腦中所留之

印象，似勞工及個人勞役之代價，就長時間言，實有漸漸增加之趨勢也。

在前次演講中，余已略述天然富源之租金，或可降跌之理由。實則資本報酬之百分率，似亦有同一之趨勢。蓋近代工商管理法，每使企業家集中其能力，以增加每年營業之總量，及每年每元投資所得之價值。如連鎖商店 (chain store) 卽係對此方面努力者。故使工商資本所得報酬之率，對於利息之率，如依然保留其自亞丹斯密以來，百五十年中絲毫未變之固定關係，則每元投資所營業務之增加，將不特有提高實際工資之結果，且使勞工與個人勞役之報酬，在國家所得總額中所佔之百分率有隨之俱增之趨勢也。

此長期之趨勢，有時或易爲物價、利率及企業之循環變動所掩蔽，但如假以充分之時間，吾人固不難尋覓種種有力之證據，以證明此種趨勢之依然存在。至如上述國家經濟研究會所編製之統計，吾人如完全信賴之，固必以爲勞工所得之部分，在工業產額中，乃突飛猛進者。但據余之感想，尙以爲此種激進之現象，乃由於戰爭及企業循環變動之影響所造成，實際之趨勢，固爲增加，惟增加之率乃爲極緩者耳。

勞工對於工業產額之分配比率，雖有逐漸增加之可能，但有一事與之相反者，即在經濟理論上，尚無一物足以制止資本所得百分率之繼續增高是也。蓋祇須增用之資本，能收回六釐以上之利息，則製造業中新工具之應用，即將繼續不已。新工具增加，則每個雇員所用之資本亦將大量增加，而產額之歸與資本方面者亦必步步升騰也。顧以事實言之，今日工廠之引用新機械者，多不以「是否可得六釐利息」為標準，而大抵希冀所增加之效率，在二年以至五年之期間，可以抵償機械之原值。故上次失業會議（President Conference on Unemployment）中，最近經濟變遷委員會（Committee on Recent Economic Changes）所舉行之調查，在二百份之答復中，有百分之四三·六，謂新機械之設置須能於兩年以內，使所節省之資本，足以抵償原值；百分之六四·一，則謂須於三年以內抵償原值。此種增用資本必須有大量收入之原則，即足以說明勞動報酬所以逐漸增加之理由。

資本與勞動在競爭的資本主義下，所發生之經濟關係，吾人已分析至最後之一步矣。關於美國物質生產之增加率，茲可無庸贅述其證例，各家之估計，雖略有異同，而其結論則一致。

以爲，就長時間言，生產之增加率爲每年百分之三，人口之增加率爲百年百分之一·五。至於此後之趨勢，凡有潛藏之能力，期待衰落時期之過去，而重行發揮者，亦必不疑經濟繁榮之將迅速恢復。惟今日之問題，乃在此生產力之增加，是否同時亦顯然有實際工資之增加耳。

關於此項問題之答案，使吾人所研究之時期較爲久遠，則必爲正面者無疑。蓋自從一八六五年以來，美國之實際工資確曾增加一倍以上也。惟如時間較短，則凡企業之循環變動，物價及利率之激烈變遷，租稅及政府歲出之大量激增，及其他要素皆足以掩蔽此種趨勢，而使之不甚顯明。

是以據上述之見地，美國最近及大戰將次爆發時期之情勢，實爲最難研究實際工資之時代，以斯時工業之極端機械化及迅速之發展，與戰時戰後種種經濟之變遷，皆足以掩蔽真相也。

顧際此非常之時期，吾人乃幸得陶格拉斯（Douglas）教授精心結構之貢獻，蓋氏嘗詳細考察美國自一八九〇至一九二六年間實際工資之趨勢也。氏之結論，最爲重要者，余以爲

當爲下列數語：「一九二六年在一千四百萬工人中，其平均每小時之貨幣工資較之一八九〇年之平均數增加百分之二三三，較之一九一四年之平均數增加百分之一二五。而在實質上則購買力之增加，前者爲百分之三八，後者爲百分之三〇。」

據余數年前所編之統計，勞工每小時之實際工資，因物價狂跌之故，實較一八八一至一八九〇年間之經常趨勢爲高。惟此種經常趨勢，在一九〇〇至一九一四年間又復恢復舊觀，故如以余之統計與陶格拉斯所列一九一四年之數字，互相比較，可以不至有大相逕庭之處。顧余意以爲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二六年間，經常趨勢如果繼續維持，則實際工資增加之率，較之陶格拉斯所云百分之三之率，實應僅及其半。究竟陶氏所云，係指實際工資之增加率戰後實較戰前者爲速，或僅表明一九二六年之暫時狀況，自須俟目前衰落之情形過去，及經常之狀況恢復以後始能確定。目下吾人所須注意者，即實際工資在長時間之繼續增加，與吾人上述之經濟事實及理論是否相符而已。

綜觀以上所舉之統計數字與研究資料，美國之個人資本制度，有若干特徵，可得而言：一、

就基本之立場，及實際之經驗而觀，美國制度可確認為競爭之制度。二、美國在此制之下，總共生產力，每年增加百分之三，每人生產力，每年增加百分之一，以至百分之二。三、就長時期而言，在此制之下，實際工資增加之率與每人生產額增加之率，恰相符合。四、此制之生產總額，分配於勞動及個人勞役者，佔百分之六八，分配於資本者，佔百分之二四，分配於土地及天然富源之租金者，佔百分之八。又勞動與資本分配工業產額之比例，為前者百分之七〇，後者百分之三〇。而就所有之證例以觀，吾人亦可信勞動所得之趨勢為遞增而非遞減者。

此外尚有數點亦頗為重要者，茲述之如下：

美國人民之全國所得總額（註二），一九二六年為美金八百萬萬元，平均計之，每人為美金七百元，較其他先進之工業國增多一倍，較蘇俄增多十倍。個人之薪俸及職業家之收入，在全國所得總額中，所佔之成分，幾於渺不可窺，蓋個人之收入，數額最大者，大抵為利息，紅利，及租金諸項也。計在一九二六年（足以代表經常旺盛之年），全國各公司所付之紅利，利息等，共達美金六十二萬萬元。使吾人剔除各公司間互相撥付之數額，則個人之淨收入，亦可達

美金五十萬萬元以上；以此數字與同年個人所得稅報告書所列美金四百九十萬元之數互相較核，當可大略相符。惟是年之個人所得超過美金一萬元以上者，其總額共為七十五萬三千萬元，則其中當有二十萬萬元為資本之報酬也。

為與上述數字互相比較起見，吾人又可以引用美國商部之估計，據該部估計，美國每年所需之新資本，平均為美金一百萬萬元。於此可見大規模商業之社會化，及大量收入之由國家直接沒收，均不足以提高人民之生活程度；反之，且使政府負擔籌集新資本之義務，而其數額之大，且往往為事實上所不可能；此種事實，不惟為若干社會主義之著作家所承認，即蘇俄政府亦以事實昭示吾人矣。

今夫獨樹一幟與美國先進之個人資本主義相對峙者，厥為蘇俄正所試驗之國家資本主義，然其國民之經濟程度，則正在萌芽之時期，而其國家所得之每人平均額，則僅及吾美七分之一以至十分之一也。

蘇俄政府所根據以發展其國家者，為馬克斯主義之大前提，此種前提之謬誤，凡非智識

薄弱及精神錯亂，無研究事理之能力者，俱可對之剖示。

國家資本主義，又以為苟非鼓動世界革命，以反抗個人資本主義，則單獨一國決難完成此制。此種觀念又為國家資本主義之第二謬點。惟吾人深冀此種觀念已漸為蘇俄政府所放棄矣。蓋使蘇俄黨人固執不悟，則不啻如昔日俄羅斯所主持之回教戰爭，公然與世為敵，而世界之文明國為自衛計，亦將迫不獲已，一面繼續拒絕承認，為消極之抵制，一面採取種種必要之手段，以防制共產主義之宣傳；此種宣傳，昔日蘇俄政府固常予以直接或間接之援助，直至最近始漸漸斂跡耳。

在任何文化及任何社會中，每必有若干成分之人民，不能或不願忍受環境之束縛。此種人民，少數為有心理病態者，而多數則為智識階級中人——如大學教授之類，未知世界之前進必須依賴超人之毅力，犧牲之精神，狂熱之態度，與現實道德之基礎，因而未能以相當之哲學手段應付者。然而大多數實為生於電力時代而猶具石器時代思想之人民也。

使一國而向他國愚昧若石器時代之人民，妄行煽動，告以任性劫掠殺戮，為其宗教上之

義務，則此種行為實為國際間最大之罪惡。今者蘇俄當局已漸瞭解此種事實，則世界平和之前途，其有一線曙光乎！

雖然，世無良師可負全責，蘇俄政府之竟得樹立，且可繼續維持，即為其認受宇宙間自然現象，而非始終排除異己之證。吾人從而預測蘇俄情勢之終局，誠為大愚之事。然而蘇俄人民終將永存於世，並將以演化或革命之過程，於相當之時間，發展一平穩之政治及經濟組織，則為吾人所深信者也。

在世界事變之發展中，吾人於社會及經濟之領域，獲觀種種平行之經驗，經驗者何，即自封建制度發展而成代議制度一種過程中之迅速的演化也。不惟政治及經濟要素，即宗教及家庭關係，亦均一一投入蘇俄之鎔鐵爐中，而受其鍛煉。吾人何幸得免支付此鎔鐵之代價，而同時復得借鏡蘇俄，藉以應付未來之事變，則亦足以自慰矣。

關於吾美之問題，余自認確為一不可救藥之樂觀者。蘇俄試驗之起點，在經濟程度上，直屬過於幼稚，其對於現在及最近將來之手腕，決不足以支配吾人及其他經濟發展類似吾人

之國家。其次，余更深信在蘇俄底定其永久的社會基礎之前，吾美於社會進化方面，當已久告成熟，而同時且可不必犧牲個人創造能力及個人經濟自由之價值也。

職是之故，吾人與其延頸企踵，奢望蘇俄試驗所得之教訓，或將有以裨益吾人，不如自己埋頭研究，何者為發展吾人社會經濟之自然途徑，或且較為有利也。

吾人如將馬克斯主義中謬誤之點，一一加以剔除，則國家社會主義所根據之理由，將限於經濟效率之增加，及最近所主張工業設計之便利與人民職業之穩固諸點。其次，財富及所得之平均化，而同時不至直接隨之有生活程度之提高，亦為國家社會主義者所假想之優點。

關於國營工業將有極高效率之說，實係臆測之詞。今日各國之鐵路、交通及其他公共事業之由政府經營者，其管理之效率，或對於公眾服務之效能，鮮能及吾美國督民辦之制度。此種例證，斑斑可考，非故作偏袒之辭也。蓋一種公共事業，甚或一種工業，當由政府承辦之初，或間能達到極高之效率，惟此種曇花一現之佳境，每不轉瞬即為故步自封之習氣所消滅，是蓋官辦制度下必有之現象，非偶然也。

此種暫時增進之效率，與夫充分發揮個人創造力所得之最終佳果，其間主要之分別，每易為常人所忽視。實則彼因個人發揮創造力，而增加之每年每人百分之一，以至百分之二之產額，雖所失有限，而決非任何暫時增進效率之利益所能抵償者也。

願如吾人以爲絕無新途徑可供公共資本之應用，或以爲吾人對於種種重要的經濟活動之管理，應絕對限於政府機關，及私人公司之受政府監督，或不受政府監督者，則又未免過甚其詞矣。

余於前次演講中，已曾說明，使吾人欲社會化土地及天然富源之價值，則吾人可任意爲之，蓋祇須以簡單之課稅方法，即可完全吸收一切租金及規費也。

近年以來，吾人對於社會新資本之創造，又已採取一種極重要之步驟，蓋即以改良汽車道路之方法，促成偉大之交通制度是已。此外，方法略異者，即爲紐約及紐折爾西 (New Jersey) 二州所聯合組織之紐約商埠委員會 (Port of New York Authority)，其職務蓋在純粹公共機關之地位，利用私人之資本，以改良交通之設備，而同時則藉商業上之收入以

自給者也。

其次，吾人亦可更進一步，使政府投資於各種公用事業之公債，而同時可以不使現行制度發生激烈之變遷。在此制之下，政府所收之利息，或可用以減輕租稅，或即藉以減低服務之規費，以期利仍在民。

余非欲提倡上述之任何一制，茲列舉於此者，不過欲以表示社會資本亦有可以增加之道，且同時可以不必根本更張經濟之組織與剝奪個人發揮其創造力之機會也。余所欲昭示之要點，乃在吾人之政治及經濟制度，並無任何固定之障礙，足以抑制社會資本及社會活動之發展。使吾人傳統之政治遺習，果挾有妥協之特性，則吾人在經濟組織中，勢必向社會適應性而繼續進步，過去如此，即將來亦如此也。此種社會適應性，較國家資本與個人資本之分野尤為重要。

往日當余討論同一之問題時，余已曾提及，凡假定政府及個人之經濟活動必須截然分野者，實為謬誤之見解。蓋此種區分，完全為理論的。經常之經濟組織，亦如人體組織然，以神經

節管理全身。故中央之政治機關亦猶人腦，不能且亦不適於直接負驅使官能之責。以此種責任胥由各個神經節負之，每個神經節各有其特殊之職責也。

是故在吾美之經濟制度下，鐵路及其他交通制度，俱已於分系管理之下完全社會化，至其管理則完全由其負責經營之人員，與公共監督之機關，共同合作，可不受政治上之干涉也。此種公用事業之發展，與夫特別機關之組織，如紐約商埠委員會者，俱足以表明一種極重要之趨勢；質言之，即為一種遲緩及有忍耐性之妥協，亦即最大之社會價值之所由生也。

此種發展之要旨，乃在經濟機關之適應公眾需要。所謂管理及經營之形式，皆其次要者。以此種形式每因所處環境之不同，而大有差異也。至於資本之所有權，則為最不重要之問題，儘可聽其以妥協之方法，而漸漸自行解決焉。

關於上述社會機關之新組織，逐漸發展之途徑，凡深思遠慮之社會主義者，均知種種經濟活動之管理，如不與經常之政治活動完全分離，即絕無效率可言，此種見解，余殊與之深表同情。惟社會主義者關於社會化運動之領域，及保全個人經濟之自由各點，則余未敢表示贊

同。

今使吾人撇開經濟活動之社會化問題，又轉而討論大量所得與大量財富是否有害之問題，則吾人即須自問：一切問題是否皆須以政治行動解決，抑其中仍有一二要素可以私人或社會之良知解決之耶？

余深信吾人對於禁酒問題，往往謀將其中之一二要點，自輿論之裁判，移轉為法律之裁判。同時吾人亦極易犯同一之錯誤，僅以財富之為財富一點，即視為可以用律科罰之理由。又在任何情形之下，吾人之所得與影響財富之租稅，常與理論相背而行，是為無容置疑者。凡有經驗之會計師，均可隨時證明，公司所得稅之負擔，每足以增加貨物及勞役之成本。顧事實上，因課稅債券與免稅債券間之利率差額，常有漸加之趨勢，個人所得稅負擔之亦可同樣轉嫁，乃不易為一般人民所覺察。至此利率差額所以併合於紅利中者，則因與紅利發生直接關係者，常為課稅債券而不為免稅債券也。

談租稅理論者，常謂「須以極少之哀鳴，博得最多之毛羽。」此語如譯以租稅學專家之

術語，即謂租稅之徵收，須以納稅人之付稅能力為標準耳。此種租稅學上之便利原則，其道德上之根據已有人為之努力造成矣。

夫富之獲得出於不正當之手段者，由國家加以裁制，其事之當，誠為無可置疑。如人民之遺產，由政府對於其超出足保子孫安全之數額，課以遺產稅，即可謂為合理之舉措。以吾人假定此種租稅有發展子孫創造力之趨勢也。但如對於以正當手段獲得之財富，而課之以稅，雖為稅收當局計，甚易徵收，而自余觀之，則其結果適足以墮落人民之經濟本能，不惟未能達到預定之目的，與每易引起貽害社會之經濟緊張之現象已也。

關於巨富之問題，余請臨時提起一事，余以為巨富之發生，鮮為犧牲勞動者及消費者之利益而得者。例如吾人之採蜜，非俟每蜂逐日工作完畢之時，即取而活剝之也；必待羣蜂之蜜，滿貯於房而後從而採取之。故大富之獲得，如非出於偶然，則必為無數已有蓄積之資本家互相奮鬥互相競爭之結果無疑也。

最後關於吾美經濟發展之前途，余以為吾人今茲所遇之問題，當為經濟設計及職業穩

固兩點。惟前者之爲問題，不在吾人是否願意設計，或是否有設計之自由，而在研究如何設計耳。余以爲資本之爲資本，決非有意助成任何工業之浪費的膨漲，而同時對於任何活動之值得發展或需要擴充者，亦決不躊躇於扶助。今日吾美商部對於經濟設計方面，業已有優良之成績，而對於浪費之消除，尤爲努力，如其召集生產者會議，以規定生產品之性質，而使其標準化及簡單化，卽爲其尤著者。此種步驟，此後自可儘量施行，不至少感困難。其次大規模之組織，如電話電報及自動機工業之類，卽如今日之經濟設計，將來亦不難有超越之希望也。

實則競爭制度之全部基礎，卽爲對於將來之種種設計，吾人如謂在政府設計機關之下，其所犯之誤點，必較在激於利己心之競爭制度下爲少，則將完全爲抽象之理論。蓋一國設計其工業化制度之步驟，視之培養充分之學識與經驗，以期維持經濟發展之平衡者，其事固較爲簡單也。

經濟設計，無論在何等情形之下，與維持經濟組織經常平穩之活動，判然不同。目前波及全世界之經濟衰落之現象，或可不至重新發現。將來時過境遷，吾人自可瞭然於現在之恐慌。

不過爲大戰之餘波。惟事有不能已於言者，今日世界各國，尤其是美國，對於奢侈品及消耗品之生產力，均有着着增加之勢，則吾人之經濟活動，猶未努力於調劑平衡之工作，實爲彰明較著。此種問題，自人類之立場言之，實爲經濟上之最重要者也。

余前已述及，凡對於經濟問題有深切之研究者，具知經濟組織，自原始之農業時期，至極端發展之工業文明，其間每前進一步，則經濟恐慌問題之重要即增加一度。故在純粹自足之農業及手工業時期，人民或有饑旱之虞，而斷無失業之苦。今日蘇俄之經濟制度實仍近於原始之時代，故其失業之問題絕不至達於嚴重之程度，而其處置失業之方法，亦非工業極端發展之國家所欲注意也。

關於吾美最近之失業情勢，吾人自須迅速採取有效之方法，以消弭或減輕此種層見疊出之事件，願事實所昭示者，一般輿論對此問題似猶未有一致態度也。

茲姑取一般對此問題有深切之研究者，及最切近事實者之意見，綜合而觀察之，則其中關於職業穩固之問題，至少當有兩點，已能有一致之見解：

第一，各家皆以爲此種問題之解決，決難有一條共通之途徑，必由各業自身單獨解決之，且必須有充分試驗之機會。故今日吾美之製造家，均已以合理之態度，表示無論政府對於國家保險計劃，有何等之舉措，而對於各私家保險公司，均應允許其發出任何形式之保險單，俾各項私人之工業組織，得有充分試驗其計劃之機會。

第二，各家皆以爲公共之款項，不能用於穩固職業之途，一切穩固職業之計劃，其所需費用，應由直接有關之工業及雇員負擔之，庶使各業所支出之費用，得以大部爲生產品之增高價格所吸收。

爲補充上述之普通原則起見，余請提出余之第一建議，即各業應速施行強迫儲蓄之計劃，使每個雇員於其每月工資中提出百分之五，或其他成分，以作失業準備金，俾得與各業之職業穩固準備金計劃，相輔而行。

據余私見，此項準備金不問其爲屬於雇員個人者或工業者，必須以特別規定之辦法存儲之，庶使政府當支付此種款項時，有種種便利，而同時復不至於正需職業穩固之時期，礙及

經常之信用制度及緊縮公衆之購買力。

其次，余請再建議美政府應允許各業對於聯邦之所得稅，有挪借挹注之便利，俾其得用於各種穩固準備金之途，而職業穩固之運動，亦可藉此而更爲興奮。惟鑒於今日國庫已頗感困難，故余又建議公司所得稅可增加若干，藉以應付此種新興之信用制度。

欲失業現象與企業循環之完全消滅，自屬不可能之事，如有謂其可能者，斥之爲荒誕不經可也。企業恐慌之損失，雖可取償於經濟奮興之時機，而吾人乃常覺今日所付之代價，未免過大，而將來之利益則悠久難償，故吾人今日最爲重要之經濟及社會問題，即爲今日之經濟制度所給予吾人增加生產力與增加實際工資之利益，應如何與個人職業及家庭收入之穩固問題合成一片是也。

吾人欲達此目的，似無一條共通之途徑，余於上文已言之。惟使吾人能放棄所謂萬應之靈方或極端之計劃，迅將目前工業上之紛歧，通盤解決之，並視略爲守舊之計劃爲滿足，則職業穩固之問題，又非無解決之道。如工業上之職業穩固準備金制度，雇員之自動儲蓄計劃，根

據服務年限及家庭負擔之雇用條件，企業蕭條時期之分配工作辦法，及公共職業介紹所之組織，蓋皆為最初步而略含保守色彩之建設計劃，吾人可放膽行之，而不至有重大之經濟的錯誤也。

此外，使吾人更能對於公共建築之工作，加以相當之管理，又能使聯邦準備制度，根據健全之銀行原則，對於足以掀起企業恐慌之經濟澎漲現象，加以相當之控制，則余深信當第二次恐慌發現之時，上述政策之成效，必能一一昭著。所望於吾人者，祇為一二整理之工作而已。上述種種之計劃，皆為針對將來而發者，至於今日之經濟恐慌，則余以為非各種公私機關通力合作，斷難謀根本解決之效。願吾人又不能因此種直接救濟之途徑，而遂疎忽尚有一種更為重要之計劃。

當一九二一年經濟恐慌發現之時，余曾應數公司之召，以研究減低工資之問題。當時余曾謂按照是時之局勢，尚難低減工資。惟今日如有徵求余關於此種問題之意見者，則余之答案即將大異於是。

就最終之結果而言，惟資本有利者，而後勞動始蒙其利，又當物價激烈變動，以致工資之率與物價平面萬難維持其向來之比率時，勞工因維持工資之努力，所發生阻礙企業復興之影響，勞工亦能忍受之，惟忍受之力不如資本階級耳。今日之物價，經相當之時期以後，或仍能恢復一九二九年之舊觀，惟今茲所跌之率，過於巨大，過於徹底，而來日恢復之望，又遠而難期。一九二一年所視為適宜之工資政策，今日殊未能適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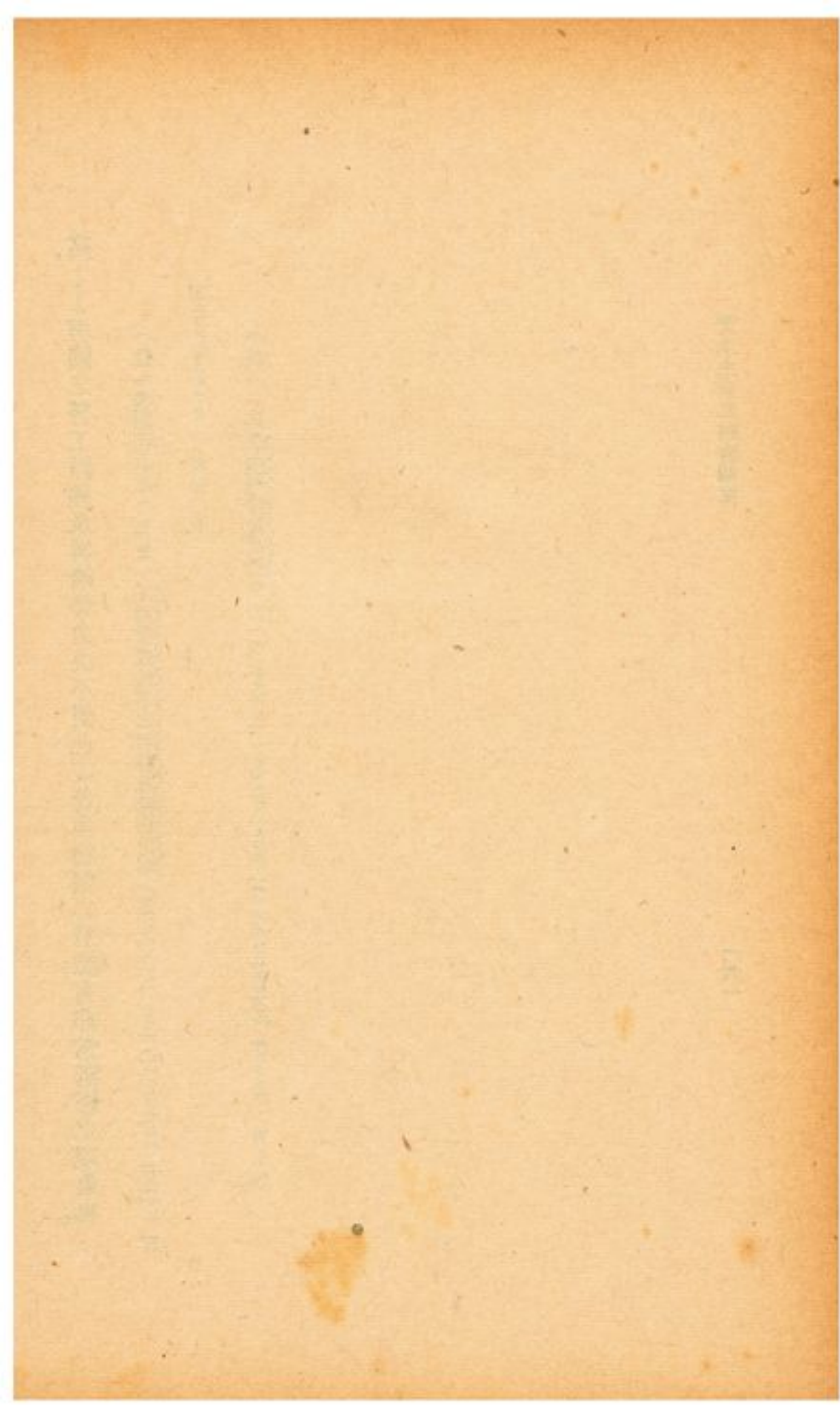
故減低工資之策，就今日之時勢觀之，勢必實行，而事實上亦有若干地方業已實行。所成爲問題者，惟減低之程度而已。據余之意，此種減低之率，自不能超越生活費所跌之數。或者須較此額尤低，方易施行有效。更進一步，使吾人能於實行減低之時，附一保證，許生活費增加之時，工資之率即當恢復舊觀，則其成效當更大也。

是云云者皆爲必須決定之問題。惟今日最重要之問題乃在爲勞工領袖者，能昭示其應付目前局勢之能力及能證明其爲羣衆所努力者，斷非爲經濟上之絕徑。今日暫時減低工資之政策，自必無成爲永久政策之理由。祇須企業活動一能恢復，則工資之率自能隨物價而提

高——美國之勞工領袖及輿論勢力決不使此工資與物價之追蹤，有非常延緩之現象也。

(註)參閱勃力思 (Bliss) 工商管理法下之財務及業務比率 (Financial and Operating Ratios in Management) 頁三〇七。

(註二)見全國所得及其購買力 (National Income and Its Purchasing Power) 頁七四。



世界經濟計劃

培克耳 (Newton D. Baker) 著
林光 譯

一九一八年以返，世界各國應付戰後問題之成績，已有突飛猛進之勢。一般人士感於熱望隱憂之交迫，多以為努力之果，徒令人失望耳。而實則自超然之地位觀之，彼各國政治家苦心焦思之成就，固皆為基本之計劃，其影響之健全與遠大，已遠過於大戰告終之際，樂觀派觀察家之所預期者也。即如凡爾賽條約之含有顯而易見之瑕疵，及屈服於戰爭情感之色彩，亦為近日人士所公認者。而自今視之，實亦將來進步之始基。蓋此約之直接及間接影響，嘗引起無數問題之討論，及多種機關之設立，而為一九一八年以來，種種進步之原動力也。凡爾賽條約，當簽訂之時，國際之空氣如何，吾人自難使其一一復映於腦海之間；而國際情勢之顯然複雜者，茲亦不欲具論。所得而言者，則和約之背後，必隱藏有若干心理之作用，如戰勝者之與戰敗者，悲痛者之與憤恨者，貪婪者之與進取者，或相壓迫，或相牽制，而使和約大受其影響而

已。和約簽訂後，各國人民昧於世界禍災之局勢，而假想負責政治家之行動，在政治上及經濟上將有若何成績也，而遂舉世靡然，責以改造國際間社會組織之重任。不知停戰之約，所裁制者，軍事之行動而已，關於智識上及情感上之敵對行爲，實毫無消弭之方。彼人民領袖，於巨創深痛之餘，猶有瘡痍滿目之感，喘息甫定，宿苦未除，則對於支離殘破之局，方扶危救急而不遑，又安得遽定百年之大計。惟當時生命財產之損失估計，雖匆遽行之，亦頗翔實。而種族野心之勃發，在戰前各國所認爲棘手之問題，而不得不以武力壓抑者，茲亦有安然平息之望，則誠可謂爲差強人意者。要之凡爾賽條約，本誕生於非常之時機與環境中，當時和會席上，深思明辨之政治家，原不期其對於全人類之制度與思想，所實施之改造計劃，有永久不變之效力，而毫無伸縮之餘地者。故使此約而含有發榮滋長之種子，可期收效於將來者，則此約之優點，卽已彰彰昭著。而吾人之論其成敗者，亦當察其既有之成績，而不責其未成之效果，則庶乎合於公平之原則也。是以參訂維爾賽條約諸人，莫不深知此約所含之權利與義務，有時時更張之必要。而美總統威爾遜則既於討論條款之時，反覆陳明此意；又於此約既簽之後，指由此產生之

國際聯盟爲研究修改和約，及調和國際意見之機關。厥後斯麥滋將軍 (General Smuts) 又謂：「余深覺此約猶未造成人民所需要之真正和平，所謂真正和平，必須追蹤，完成與修改政治家所造之和平而得之。」則其遣詞之適當，與目光之遠大，尤非他人之所能及也。

余深感於政治家之權威與能力，及人民之權力與責任，有多方受制，運用惟艱之況，故特以世界之經濟計劃爲題，與諸君一討論之。

各國政治家之汲汲孜孜於戰後建設事業者，舉一般之情勢而言，其成效之卓著，誠非世界之士始料之所及。顧此輩政治家所恃以縱橫捭闔，而得此成績者，仍陳陳相因之外交手腕，與傳統師承之外交觀念耳。最近美國有優秀之青年歷史學家，嘗謂世界之外交政策，在美西戰爭以前，不外爲狡猾才詐四字，在一九一四年以後，仍無進化；近雖干戈化爲玉帛，各國代表復雍容揖讓於壇坫之間，而各國之國家政策，初未嘗少變其目的與手腕也。是故國際聯盟，當始立之時，實祇爲一種試驗之組織，恍如輕氣之球，姑任其凌空而上，以視大氣之間，果有相當之物質，足以維持此冒險之事業否也。惟前途渺渺，答案猶未可稽，所賴尙有三數明哲之政治

家如薛西爾 (Lord Robert Cecil) 斯麥滋 白里安 (Briand) 及史脫斯曼 (Stresemann) 者，力排一切過去之桎梏，而為國際合作之努力，而後乃能暫挽危局；不然當此舉世昏昏醉夢之時，一般人民，進則昧於來日之險象，退則坐失現在之機緣，又烏足與語國際合作之大計哉。近者國際聯盟既有此諸大國之代表，推之於前，又有諸小國之代表，如布藍亭 (Brundage) 南森 (Nansen) 柏尼斯 (Benes) 者，挽之於後，已幸成為有效之組織矣。若國際法庭若勞卡諾條約 (Treaties of Locarno) 皆已一一確立，而凱洛公約之原則，亦已正式昭告於天下，凡有史以來，各國所扶持培植，關於國際關係之基本原則，至少在條約上，皆已一舉推翻，則其成就亦已偉矣。故此種種新立之制度，雖舉其詳細內容而言，不無可以訾議之處，而普天之下，必無有一二負責之言論，謂其根本差誤，則為可斷言者；然則吾美人士固尤當有最大之信任，與忍耐，而靜觀其遞嬗演化，以底於發展與進步之域也。

以吾美之歷史言，聯邦條款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宣布凡十年，而後人民知密切聯合之重要，美國憲法成立後百五十年中，人民又目覩其踵事增華，後來居上，且情形一變，

則意義亦變，而表現之精神，與應用之方法，亦無不隨之更張，則創制與時會之相關亦已切矣。夫人見橡出於實者，必不致疑於種實者之苦心，善意與所費之光陰。上述諸制之發榮滋長，余固不謂其非由於三數偉人之苦心孤詣，培植而成，而當時種種不可壓抑之勢力之助長促成其事，亦爲不可沒者。蓋因果之相乘，常強於意志之作用。戰前種種潛伏之情勢，方挾其漸增之速度，與累積之動力，風馳電掣而來，初未嘗少改其趨向。則此國際聯盟凡所擬議之制度，如非實際告成，有十年之史績，又安得不爲學者種族主義之觀念所掩蔽，而被斥爲玄玄之理想也。於斯可見國際之間，亦猶人之相與，非至困阨之時，卽不易推行理想。故使殖民領地之擴充，及邊疆版圖之開拓，猶有可以逐鹿之機，國際軍備之競爭，雖無壓倒強鄰之欲，猶有自固吾圉之心，則國際間斷不至有自加桎梏之公約，亦斷無有加入拋棄權利之組織，而自願犧牲其戰勝國之利益者也。顧此次大戰之所昭示吾人者，一則最稱強盛之國家，已如蜂蟄以螫，自焚其身；二則戰爭慘禍蔓延世界，大有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之概。卽彼戰勝者，觀仇敵之銅駝荆棘，廬舍邱墟，因而引吭高歌，自鳴得意，而一念及戰爭代價之慘重，亦未有不廢然而嘆者。然而痛感切

庸者，猶不爲各國之元首與貴族，文臣與武將，而爲一般人民耳。蓋當戰爭平息之候，凱歌聲中，時聞慘哭，有悼喪其夫者，有痛亡其子者，亦有悲失其業者，驚心動魄，無以復加；而國際工業及金融之紊亂，尤使一般國家感受禍之深，與不能自拔之苦。因之彼困居於水深火熱之中者，對於當時之政治組織，遂盡失信仰之心，而大戰以來，所認爲最重大之危機者，亦從此發現矣。危機者何，卽凡無力消弭種種禍災之舊政制，已不爲人民所信任，而理論上爲民衆所擁護之新政制則漸漸代興也。

此新政制所取之種種形式，卽爲吾人所討論問題之一部。如上述之資本主義，意大利之汎繫主義，及蘇俄之共產主義，蓋卽藉以研究：何者爲最適宜於近代工業狀況之社會組織，及過去之種種制度是否適宜，或可以使其適合於最近及最近將來之環境者也。此種問題自大有辯論之餘地，惟余以爲使吾人果欲討論此點，則於着手之時，卽須認識近代之工業制度，實一極新之制度，而大多數國家之政制，則大都爲千百年經驗之遺傳，而特合於國情者；故設立一新工廠常易，而組織一新政制則難。良以工業上及經濟上之發展，其所取之途徑，常取決於

具體及實際之經驗，而政治上之發展，如確能適合國情，則必須根據一國歷史之背景，與人民情感之反應；蓋人民情感之反應，乃發生於民族之特性，而同時又為語言、文字、宗教、哲學等要素所培育與陶冶者也。是以當一國顛沛流離之候，凡革命黨人所創立之政制，每易為民衆所漠視；而當一種新制偶遭橫逆挫折之時，人民念舊復古之心，亦勃然不可壓抑。是則事所常有，非偶然也。更有進者，即密切結合之民族，久居於同一政制之下，語言文字同，利害關係同，而亦有時尚各自保留其種族上及風俗上之異點者。如英格蘭與蘇格蘭之聯合，遠在詹姆士一世 (James I) 之時，威爾士之歸英亦已有數百年之歷史；其國會之組織，海陸之軍備與外交之設施，殆無一不在同一政府之下，其文學與文化尤有不可分之色彩。顧迄今英蘇之為英蘇，與威爾士之為威爾士固依然故我也。夫政治與工業制度，既有交相影響之作用，則凡欲測度及控制將來之局勢者，能忽視而不顧乎！

世界情勢之變遷，自政治方面言之，其最為重要者，為貴族與世襲制度之消滅，及民治精神之勃興；云勃興者，蓋謂全世界大受民治潮流之激盪，即未行民主政體之國家，亦不免屈服

於其影響之下也。民治精神充分發展之最近結果，在國際關係上，爲以公開討論之方式，代縱橫捭闔之外交。故美總統威爾遜在和會所提之十四點，其最爲質樸而使人贊美者，卽爲其所要求以公開方法制定種種盟約之一點；亦卽爲其過去一切宣言中之最爲明達者。蓋使果如民治理論之原則，世界由人民統馭之，則統馭之方法，自必以一種國際之組織爲歸；凡曩昔一切密約，協定，及同盟所由形成之制度，具須整個修改，而凡不能於光天化日之下，公開討論之條文亦須一一鏟除。良以政治家之權力爲人民所授與，人民對於一切未能充分瞭解之約章，既難同意，則政治家自不得負責締結任何秘密之條約，或暗中承諾任何不利之責任也。此種民治精神之表現，卽在大戰以前，亦不難一見。如英國政治家雖與法國密訂同盟之約，藉以應付不測之事變，而終不敢於秘密談話之外，爲更進一步之聯絡；厥後大戰發生，此輩政治家雖以爲不列顛之利益，已受戰爭之影響，而終不能以事前所訂之密約，爲徵發人民參加戰事之理由。吾人試觀德皇之下令動員，助其與奧大利，與葛萊勳爵（Sir Edward Grey）之出席國會，詳釋英國在大戰中所處之局勢，戰戰兢兢，誠誠懇懇，惟恐政府或有干犯國會或人民之

自由，即可知帝制之權威，與民治之精神，所異者究何在矣。其次美國人民在大戰初期所表示之態度，亦可謂為顯明之證例。蓋當大戰爆發之時，美國國中頗有宣傳英美或法美政府已有密約者；願美人一聞此語，則靡不聳肩作不屑狀，以為據國憲規定，總統雖有締結條約之權，而例須先得國會之同意，華盛頓政府如有侵權之行爲，人民可不負責任也。然則斯麥滋將軍所謂凡爾賽條約雖由政治家締結，仍須由人民完成及修改之語，殆有感於此而發耳。國聯觀念之基礎，即根於上述之事實，故其所訂條約，皆得視為公共之紀錄，而一切國際之問題，則具以公開討論解決之。蓋凡今日國際間所擬議排難解紛之辦法，如仲裁、會議、和解、公斷等等，殆無一不以此等事實為根據；亦無一不含有以忠實態度解剖一切事實，及以輿論壓力實現公斷、和解，或其他議案之方法也。

為表示美國國家政策之基本原則起見，余久以為吾美應明白宣言，凡交戰國家經相當之國際法庭，認為有侵略嫌疑者，均當對之經濟絕交。此種宣言自余觀之，殊有實際生效之可能。蓋美國人民之道德觀念，既已表示於所謂柏吞與卡柏議案（Burton and Capper Res-

Options) 中，而世界上之重要國家，又多為條約所束縛，而不得不承認國聯，或其他共同協定之公斷法庭，為解決國際糾紛之機關，則美政府雖未正式為此種宣言，而人民固不難使之有效也。故此後使有一二國家，將以兵戎相見，而同時願以糾紛事實付諸公斷，以決侵略責任之誰屬；吾意美國人民必將以輿論之勢力，迫其政府服從判決之詞，而無以各種公私財富，資助此野心勃勃之國家。質言之，美國人民蓋常能為政府行動之先導者，使民意一定，則無論國家之政策如何，彼破壞和平甘為戎首之國家，固未有能得美國工業界與金融界之臂助，或美政府之左袒者也。

其次，近年人民對於世界復興運動之努力，視各國研究國際關係之私人機關，風起雲湧之現象，又可見一斑；蓋此等機關固以解剖國際問題，造成世界輿論，並擁護政治家在新制度下所組織之機關為目的者也。故大戰以後，世界各國討論國際政治之刊物，汗牛充棟，層出不窮。而各處會社，同盟，機關，講壇，考察及研究團體之星羅棋布，尤為顯而易見。此數者不惟足以證明民衆對於國家大計，已不如曩者之漠不關心，且尤足以鼓勵政治家，使其瞭然於民衆之

熱心與同情，因而更爲努力於新時代之工作，其意義之重要可概見也。茲請以美國之經驗言之。年來美政府頗傾向於閉關自守政策，一般掌握政權者，類皆深信其國人自一九一八年以返，已不復傾注其視聽於美國對外之政治關係；故美政府每逢發表其國際立場之宣言時，必附有不厭精詳之解釋，以說明其所擬議行動乃係有相當之限制，及無背於國家自守之政策者。顧事實上美國人民對於國際事業，實未嘗有退縮之心。其國中聰明練達之士，多以私人名義，參加國聯，凡所謂建設事業，殆無一不有美人之足跡。而其政府之國外專員，亦多能乘互助合作之精神，以非正式之名義，而與國聯人物，周旋於壇坫之間。故當時如魯特 (Elliott Root)，道威 (Charles G. Dawes)，楊格 (Owen D. Young) 及其他專家爲國聯所建設之新事業，特衛爾 (James T. Shotwell) 及其他諸人爲國聯所設計之新組織，固皆爲美人特殊之貢獻，無偏無黨之計劃，而各專家經驗學識及努力之結晶也。此外，美國國中又有種種專門基金之設置，及會社同盟之設立，其中且有不少爲全國之規模者，藉以研究世界新興之問題，及形成一種集中有力之輿論。此種組織雖多各有特殊之目的，或有限其會員資格於某派教

友，某處學校，或某種社會政治團體者，而舉其全體而言，則殆無一不足以表示美人對於世界問題之興趣；且有不少組織僅就其名稱而言，即已足以表現戰後民衆所注意之問題，已自一地或一國性質，而擴大爲世界性質者。以上情形如證以胡佛總統（President Hoover）之不待徵求民意，而遽爲緩付賠款及戰債之宣言，即可知吾言之不謬。蓋前此數年中，美政府始終未允考慮戰債清償辦法，有任何覆議及修改之可能；且曾明白宣言，德國賠款本與協約國之對美戰債無關，自亦不得於清償美債之問題中，牽入德國之賠款事件。故當時世界人士雖有倡議討論此種問題者，而美政府迄未有願行參加之表示，且亦不認於已定之清償戰債辦法外，有任何解決賠款及戰債問題之新方案。洎乎德國情勢愈形險惡，世界之工商金融，俱瀕危境，於是美政府乃知非實施濟急之法，勢將無以挽危局，且亦非美國不能肩此重任，因進而有胡佛之宣言。而不知此美政府遲遲未肯討論之問題，全美人民對之，實已早有徹底解決之結論；故胡佛之宣言，雖與美政府歷屆公布之原則，及其確定之方針，柄鑿不相容，而乃大爲人民所贊許，且公認爲胡氏政治生活史上，最可紀念之一頁，是不亦可以驚異者乎。蓋當時不惟

熟諳國際情勢之智識階級，及與世界金融休息相關之實業階級，對於胡佛宣言表示贊許，即一般操手工之業，逐蠅頭之利者，亦無不認之爲匡時之大計；則美人之關心世界問題，於此又可概見矣。

或有疑胡佛之宣言發表過遲者，以爲以若是非常之局勢，繫天下財政政治之安危，而乃坐視其醞釀巨變，待至千鈞一髮之時，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應之，似非事理之所宜然者。願余則以爲此等問題，允宜束之高閣，蓋非常之時勢，宜通功合作，而不宜臧否是非。美國之輿論，其穩健慎重之處，至此而臻其極者，蓋亦以局勢險惡，濟急救危，惟實際之行動是賴，批評得失，不惟減成事之力，而且增敗事之勢也。故吾人殊可確信美國之民治精神，刻正發榮滋長，而預備對於政治家爲維持世界安寧而創立之種種新組織，負維持促進之責，然則斯麥滋將軍所謂凡爾賽和約待人民之修改補充，固未始無觀成之望也。至各國政治家之負責解決條約上所發生種種問題者，余深覺亦當使其確信此點，將種種待決之問題，付諸公論，並指導民衆以公開討論之法；夫如是則當專家調查考察之資料，搜集齊備之時，卽不難有正確之輿論，與

論之趨勢一定，則條約上缺點之修改，自不患無相當之根據矣。例如最近歐洲所發生之糾紛，如領土歸併 (Anschlus) 問題，匈牙利疆界問題，波蘭科立多 (Polish Corridor) 問題等等，如以上法處置，余以爲其所得結果，必能較關稅同盟，國際協商，或其他種種間接手段，爲簡捷適當。蓋國際條約之訂立，不惟藉以解決過去之糾紛，抑亦爲將來樹和平之基礎，而立一法，創一制，以期釋往年之恨，祛昔日之疑者，亦不如造成一大無畏及大自由之環境，而使世界諸邦相安無事，以底於治平之域；此雖爲訂立條約之政治家所易遺忘，而人民則耿耿於心，未能或釋者也。

顧民治潮流與民治勢力之日形澎湃，同時實亦挾有重大之危機及責任以俱來，是則吾人所不可不知者也。亞本塞爾 (Appenzell) 誠爲一純粹之民主國，然其民治制度所以自存，而得施行無阻者，徒以其版圖狹小耳。若民數漸增，版圖漸擴，人民之職業及利害關係漸趨紛歧，則如何造成健全之輿論，如何抑制盲目之行爲，及如何可使人民有正確判斷政治之能力，固在在有複雜之問題也。故雖以提倡民治主義之著名政論家，如羅厄爾 (James Russell

Lowell) 者，亦嘗於一八八四年演講民主主義於伯明翰 (Birmingham) 時，致疑於民主政治，在美國大部市之不易成功。蓋以爲人煙稠密之區，民衆熙來攘往，惟利是趨，既無深思靜慮之餘力，又易屈服於情感之作用，故往往謠詠一興，則情感奮發，而鹵莽滅裂之行動亦即隨之而起，不知事實上所傳聞者，或尙待證實，或尙待研究，或本爲捕風捉影之談也。其次，羅厄爾演詞之註脚中，對於電報傳播消息之制度，所發生之影響，又大肆詆評。略謂自有大規模之中央通信社以後，每有重大之事故發生，則各社之通訊員，必竭力競爭，以求於最速期間，將所得消息傳播各地，惟因求速之故，所傳消息乃有不盡翔實者。同時於海陸電報以外，又有無線電之設備，將一二負責政治家激於情感之演說，憤激之言論，挑撥之語氣，藉收音機之力，於瞬息之間，傳播各處，恍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而聽者則生吞活剝，深印腦中，雖五分鐘後，在同一之演詞中，或有折衷緩和之詞語，而究未能改變聽者所得之印象也。然則在此種環境之下，欲造成健全之輿論，其所遇之危機亦已多矣。蓋全國人民之意見，既無中央指導之機關，又乏縝密檢查之制度，勢必至於凡有事實卽有輿論，事實之真偽莫辨，則輿論之健全自不可期。

也。然而輿論既爲左右人事之勢力，則人民重要之責任，即在審查輿論之健全與否。故在此種危機之下，吾人所當注意者，即在使民主政體，知其權力之所在，而負責應用之耳。昔迭更司 (Dickens) 於其所著之小多力 (Little Dorrit) 一書中，曾述一小婢曰塔提科拉蒙 (Tatt-Yoram) 者，性卞急，易爲情感所乘，怒則立發惡聲。其主人知其弱點所在，乃於其將次發怒之時，輒柔聲謂之曰：『塔提科拉蒙乎，其速默計一至二十五之數！』此婢如言計之，而怒若失。吾人今日亦須於國際問題上，養成『默計一至二十五』之習慣，凡政治家所設立之組織，皆當力促其成，或予以贊助，則庶乎成效可見。而凡關於近代國際生活上及文化上一切事實之教育，亦宜含有廣博自由及大公無私之精神，而後民衆之生活，乃可適合於近代之環境，抑凡國民所應遵守之紀律，亦可於此具備也。此種辦法，誠若過於迂緩，惟所謂安全之路，實僅此而已。故以後凡有國際之問題發生，吾人即當認爲教育之機會，而以上述之精神赴之。例如今日之海軍裁減會議，與會代表雖無一能徹底解決造艦競爭之癥結，而其所含教育之意義，則昭然若揭。明年之軍縮大會，余意各代表鑒於前此之困難及失敗，或能更形勇敢，而使其能於較爲

健全之環境中，重行開幕。蓋斯時各代表將瞭然於民衆之希望，爲真正之和平，而不願聞凡以狹義之國家觀念爲背景之種種託詞或藉口也。故使大會開幕之日，會中如有一二代表，能以勇敢之精神，宣布軍縮之原則，曰欲實現軍縮，惟有實行軍縮，吾知全世界之民衆，必能鼓掌歡呼也。

余已譖本會之工作，爲討論種種政治及經濟之問題。而在經濟方面，則目前所欲研究者，卽爲在近代情形之下，世界經濟是否能無計劃而發展。此種思想之所由形成，大抵因蘇俄之廣事宣傳其所謂之五年計劃。惟俄國之十月革命是否成功，其本身猶在可疑之列。或謂蘇維埃制度之得以樹立，實爲多數原因混合之結果，殊無關於制度之本身，不得因此遂謂之爲健全之政治哲學或經濟哲學。亦有謂蘇俄制度迄未產生一確定永久之經濟基礎，卽不啻反證其亦如資本主義之失敗，蓋資本主義至今仍有險惡之風潮，與浪費人力之痕跡也。故處今之世，而欲研究蘇俄之現勢，及其最近之結果，誠有難以置詞者。至最近莫斯科所宣言精工與粗工之報酬，應有相當差別之原則，雖頗有似於資本主義者，所謂在一切情形之下，個人必須

保留其進取之性，與美德必須有相當報酬之說。願蘇俄又已將其自身所不能解決之若干棘手問題提示世界各國，而請吾人以本身之經驗解答矣。然則吾人究將如何應付乎？第一，余以爲蘇俄之五年計劃，萬不能與任何發展世界經濟之計劃，相提並論，如吾人以之互相比擬，則其結果必至誤入歧途。蓋蘇俄之計劃在如何可以急起直追，而他國之計劃，則在如何可以繼續前進。蘇俄爲經濟及工業落後之國家，其計劃爲弋取他國已有之生產技能，而他國則爲工業已經發展之國家，其對於將來之計劃自不能無異，抑歐美各國是否果有能力，以計劃其將來之發展，仍屬一最大之疑問也。茲請以世界一二國家，過去之經驗，說明今日之蘇俄；雖其事當時未有特殊之標誌與廣大之宣傳，而語其所取途徑則固若合符節者，如德日兩國之工業化是已。德國於英國工業完全成熟，機械生產成效卓著之後，始決施行工業化之政策，願其發展工業也。則自英國輸入機械並師其成法，以期避免初期採用機械之成本及經驗，質言之，卽以自有之工業特性，利用英國種種之經驗，及實驗之效果也。至日本之工業化，則其仿效他國成法之跡，尤爲彰明較著；蓋日本原一生產落後之極東國家，非如德國之本有工業特長，徒因

其採用英美德三國已發展之成效，故遂能樹立其工業制度，而於極短之期間，成一工業國也。以上兩國並無所謂有五年計劃，或其他特事宣傳之政策，而其工業化之步驟，則正與今日蘇俄之設立水電力的站，仿效福耳德廠（Ford Plants）及採用歐美最新之農工機械及新法，毫無二致。蓋三國所採用者，均為摹仿之政策，均為他國已有之特長；且他國於初行工業化時，披荊斬棘，或本不費犧牲亦特大，而此後進國則得借鏡於人，避免種種實驗上之痛苦，並得直以先進國所有之特長，為自行工業化之起點，其所處之地位，均至為順利也。至蘇俄政府之以政治勢力，強迫人民為種種犧牲，以期於最短期間，得與歐美各國之工業並駕齊驅，則亦顯然為一暫時及過渡之現象。蓋奴隸勞役之效率低微，本為經濟學上不易之定律，而完全湮沒個性之社會組織，其不易長久維持，亦為學者所公認，無論驅策勞役者，為鞭撻之威，或為獨斷之論，俱不足以破此真理也。返觀世界經濟之計劃，則大異乎是。蓋過去經濟之發展，完全為演進之作用，及累積之結果，其失敗與成功之實驗方法，自有其特殊之性質。至於今日則此工業上及經濟上之努力，在此充塞抽象觀念之世界中，已不啻直抵一未闢之絕徑，正在左衝右突，徧覓

出路，此後果能峯回路轉，又得一村，將來之進步自未可限量，否則惟有改變方向，別覓坦途耳。顧覘諸事實，吾人似已難對於一二基本工業，擬定一有系統及有希望之組織計劃。例如英美兩國，至今未能組織其煤業，其生產之目的，究為生產，抑為消費，始終徘徊莫決，以致此基本工業，乃不獲有比較健全之經濟基礎。同時對於穩固礦主之地位，或改進礦工之生活，復無確定之計劃。良以工業之進步，乃由於新事物之發展，而新事物之發展，則每足以顛覆預定計劃之均衡。如有鐵路後之工業影響，或有內燃機後之經濟變遷，固無人能預計者。故使吾人非假定世界經濟之前進，已及其顛，或如編百科全書者，以將來難再進步之原則，結果其發展之歷史，則凡在繼續進展之國家，斷難預定任何合理之計劃也。

顧吾又非謂世界人民必須安坐而息，靜待經濟勢力之自然發展也。人類之經驗（較任何時代之智慧為可靠），已昭示吾人自由為進步之要素。故吾人雖未能正確計劃進步之方向及速度，而殊不難努力合作，以造成若干自由之環境，使進步更易實現。此等環境，余以為目前所最宜注意者，不過有二：第一，亦可稱為最重要者，即為國際和平之確立。蓋使世界時有發

生戰事之危機，則一切進步，即將成爲幻想。文化固爲偉大，固爲複雜，固爲美麗，然亦可如個人之自戕其身。近者世界戰爭，已如顛動之手，持實彈之槍，以文化之中心爲鵠，大有一觸即發之勢。而最近之軍縮會議，卽不啻立將昭示吾人，此槍之破壞力究將爲增爲減，或執槍之手，究能穩定與否。所惜者斯會之有力份子，盡爲視侵略爲自衛之國家，則其前途亦難言矣。惟將來斯會之所決定者，將不爲堅持某種軍事實力之國家，能否向其世仇取得一二領土上或經濟上之利益，而爲一二國家驕傲頑固之思想，是否仍將強納世界於火藥庫之中，而靜待其自行爆發，以至玉石俱焚，是則可斷言者。余深信軍縮會議之希望，不在各國之政治家，而在世界之人民；而世界人民在該會之實力，不繫於一二偉大人物之善意與學識，而繫於民衆智識之廣博與否；蓋惟有健全之輿論，而後能爲民衆代表之後盾也。

第二，在純粹經濟方面，吾人所當注意者，卽爲凡爾賽條約改組歐洲後所發生之關稅壁壘。歐戰以前，所謂國家至少當以共同之經濟關係組織之，而同時復參以國家傳統之觀念。凡爾賽條約簽訂以後，國籍原則頗有更張，以致一般被解散之民族，乃不得不組織國家，而負設

立新政治制度與新經濟政策之雙重責任。此種工作之含有極端的國家色彩，自屬毫無疑義，惟其結果，則至爲不幸。蓋曩昔團結聯絡之黏力既喪，欲從而恢復之，並使其脫離政治勢力之糾紛，雖其關係之重要，爲吾人所可逆觀，而事則不易爲也。關於此種影響之統計資料，茲可不必備舉。惟可得而言者，則此新劃之國界，必不免立有森嚴之關稅壁壘，其中有含有挑撥之意味者，有顯然等於敵對之行爲者，而其剝奪自由，阻礙進步及危害和平之處，則如出一轍。夫此種稅則之背景，本多爲含有戰爭之精神者，吾人如於凱洛公約之中，立一關稅附約，使各國同意不以稅則爲國家政策之武器，誠屬所望過奢；惟事實上使各國間仍繼續爲經濟上之戰爭，爭以破壞他國之工業及經濟制度爲能事，則過去發生戰爭之暗礁，斷無有不重新發現者。余亦知廢除關稅壁壘，爲一極難解決之問題，蓋各國現有之社會及經濟組織，多爲其歷年所施經濟政策之結果，欲其於立談之頃，改變其關稅政策，或於其稅則上爲徹底之更張，勢必至於根本改組其國內之工業，此顯爲各國所不願爲者也。或謂有許多國家，如美國者，鑒於世界經濟之衰落，爲振興其國際貿易計，或將自動減低其稅則。惟自國際立場觀之，吾人斷不能坐待

此種東鱗西爪之改進，以此種改進，勢有待於根本改造各國全體之輿論，而使其拋棄昔日視稅則爲經濟競爭合法手段之見解也。顧吾又非謂此種輿論之改造，就各國之本身立場言之，無鼓勵之必要，事實上各國固有正向此方努力者。余意以爲就世界之全部而言，實應有一同時逐漸解放之整個計劃，使一方可以保留各國相對之經濟現勢，一方又可以於若干年間，達到自由之域，或即可維持經濟機會之均勢。惟此種方法斷不能求之於國際稅則會議，以一國稅則之修改，已儘足以引起重大之糾紛，若更由各國共同爲普遍之修改，即使由國際會議，定一普遍之原則，亦將覺其窒礙而難行也。蓋在此種行動之下，各國之立法機關自必坐待他國對其輸出有特別關係者，先行表示其立法上之行爲；如是互相觀望，勢必至於無法協定一稅則上之基本原則。且一種稅則表，常對於少數國家發生重大之關係，而對於多數國家則無關重要，欲以共同之立法，規定種種特殊之關係，亦爲事實上所不可能者。其次，即使有共同之稅則矣，而欲定一實際施行之日期，使全世界自此日以後，一律改用新標準，亦斷難辦到，抑事實上亦斷無此種計劃也。惟余以爲無論如何，吾人仍可擬定一漸進之計劃，以期達到一般減低

稅則之目的。如美國前曾規定一遞減稅則之辦法，將一切課稅貨物之稅率，在百分之二十以上者，以均平之率，按年遞減，以達到最高稅率為百分之二十時為度，即為可以實行之一種建議。余意可由一國際會議，先行假定各國現行稅則為可以代表其本國對於所與通商國家之現在政策；而後再由該會建議一普遍施行之法律，於相同之日期，由各會員國家，依照均平一律之定率，將一切稅則，於若干年內，按年遞減，俾使此種減低稅則之舉措，可逐漸適合於各國之國情，而不至有變制過驟之流弊。此種辦法余以為頗有相當之優點：一、可以維持各國間之相對地位；二、各國國家之偏見，每反對一國單獨減削其經濟能力，今國際相對之地位不變，則此種偏見，即可消滅；三、各國間之相對地位既不變更，而又各能預知其所減低之範圍及額率，則自能妥籌應付之策，在施行上實較其他方法為速；四、各國之國民情緒，均覺編製稅則，為一國自有之主權，施行此法，可以不必將任何國家之關稅政策，置於國際共管之下，則此種情緒，即可不受直接之衝突。惟余方從事律務，既非經濟學家，亦無充分之時間，為專門之研究，則此種問題固有待於專家之討論也。

政治組織，自余觀之，似不合於急驟及革命性之變遷。故吾人斷不能徒因一種政制之適合於其他民族之環境及需要，而遂棄吾固有之歷史，用此外來之政制。然吾人未始不可修改政治之組織，以期便利經濟之發展，此種活動吾美及其他文明各國固嘗屢屢行之。亦未始不可修改經濟之制度，以期其與新時代之組織，所根據之理論更爲調和。如吾人今日資本制度之需要修改，卽爲顯而易見者。蓋在企業膨脹及經濟恐慌之循環現象下，世界從事工作之人，其生活上所遇之痛苦與危機，每無一適合於穩固社會之條件，而其影響之悲慘，亦非吾人能忍受也。其次，自他方面言之，彼廢棄吾人固有之制度，而採用酷辣之手段，以強迫人民爲無報酬之勞役，藉以達到最高經濟能力之希望者，亦未始非一種不穩之社會組織。要之以世界之大，原可兼容多數之政治制度，與多數之經濟學理，徒以人類歷史上，地理上，及種族上之歧異相差過大，遂不許人民有任何政制，任何學理均可試用之見解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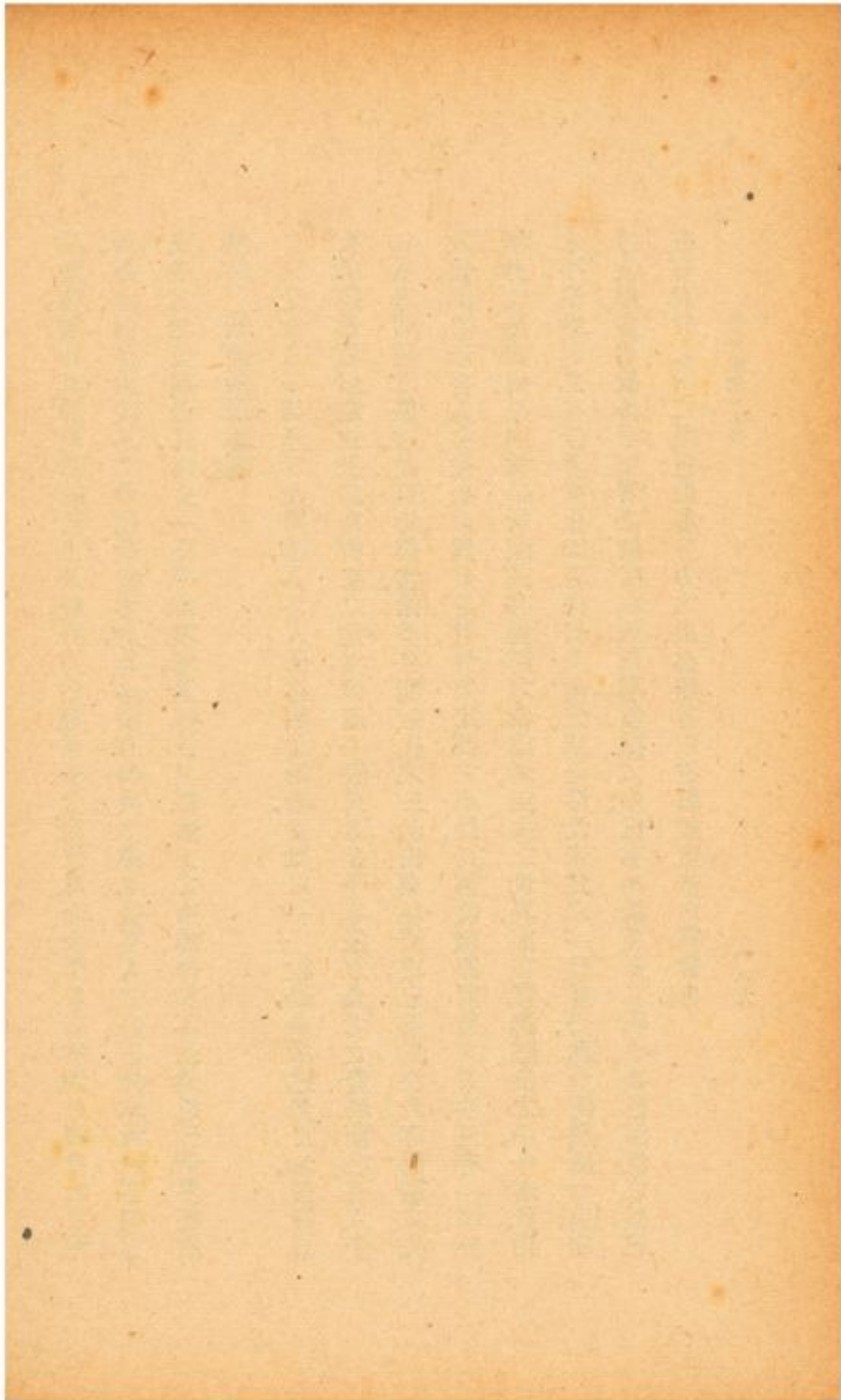
此種觀念非謂吾人可任事物之自然發展，而受之不疑也；亦非謂在近代環境之下，政府之職務及能力可以縮小或限制也。在人事簡單之時代，固有所謂放任學說者，以爲倘政府不

加干涉，則個人之努力，必可得最佳之結果。此外又有以爲近代罪惡之原因，與其謂爲由於政府權力過小，毋寧謂爲由於政府權力過大者。實則吾人須明瞭人事之關係日繁，則所需通融及讓步之處亦日多，個人在社會上之關係如此，一國在國際上之關係亦然。故個人之間如有增加其新關係，或擴大其舊關係之意義者，則可應以良心上之裁制。至於國際上之關係，則世界已進於合作之時期，凡世界之進步，及將來福利之事業，有共同利害關係者，具當以協商，集議及合作之方法處理之。惟合作又不可與聯合混爲一談。蓋社會組織中有個人之地位，在國際組織中亦當有一個國家之地位。吾人之國家觀念，固不免有近於自私自利者，顧當此種問題儘量承受外，尙有一種要素，如所謂一國文化者，則非有國家觀念之刺激，斷難造成，而此所謂文化，則固對於世界之進步，有智識上精神上及肉體之貢獻也。故吾人所欲達到之理想，簡括言之，卽爲個人當爲社會而合作，而各社會則爲共同之利害關係而合作，惟同時尙可保留其本身之特性。

近代世界所需要之合作活動，余僅舉其工於此者，非謂捨障而外，卽無其他活動爲世界

所需要，實以其顯然於政治上及經濟上佔最重要之地位耳。而余所求以達到此種目的之精神，亦僅爲普通較小之問題所需要者，非必須有特異之處也。蓋吾人之計劃，無非欲於各獨立民族之相互關係間，樹立一公平之環境，及解放其經濟上之束縛，俾其不至爲近代世界經濟侵略之精神所羈絆耳。

社會之一切罪惡及問題，爲吾人所必須討論者，實難以一一枚舉。余所述於此者，僅欲以余所認爲可以造成及培育輿論之途徑，提醒一般民衆，並予專家以參考之資料而已。吾人今日所遇問題之嚴重，誠無待贅述。歐美各國近代之政治史與經濟史，已將解決此等問題之失敗慘劇，昭示吾人矣。惟余以爲最近關於國際間之事件，及解決國際問題之方法，已有一種新精神勃然而興，是則爲余所深感有無窮之希望者。過去之世界，固在驚濤駭浪之中，今者風猶未平，浪猶未息也。世界文化既有保留之價值，則此浮沈未定之一葉扁舟，應如何履險如夷，密達彼岸，實爲值得討論者。余深信在此風潮震撼之中，已有足挽覆舟之舵手，夜色深沈之候，已直有將放光明之曙色；世界努力之果，必能有以慰殷殷望治之羣黎也。



附編

汎繫主義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之討論

第一次會議

主席卜拉克斯里 (Chairman Blakeslee) 發言：我們已有了六次極有趣味極有價值的演講，闡明汎繫主義共產主義及資本主義之經濟制度。現在再舉行兩次討論會，大家來研究各種問題。我們相信用這問答式的討論，可以說明每一種主義的優點和弱點。或者我們的國家，也可以得到種種教訓。

第一個問題是：「假使將工人當中，分出好醜，區別技術的精粗；階級的分化和經濟地位的差別，是否將漸漸恢復？」

這是微拉里博士 (Dr. Villeri) 問的，要請康慈博士答復 (Dr. Counts)。

康慈博士：我想此種區別是要影響於在社會上之地位的。但是如果與財產之管理無關，也

絕無多大關係。此種區別，事實上已有了多年，斯丹林最近演說，也加以承認（此層不可忘卻），現在私人不能私有生產的工具——天然產物或土地——共產黨在這一點如不讓步，我以為吾人所謂之階級，似乎不致於釀生。

不過蘇維埃制度裏面，有一點或許會有發生這種危險的傾向。那不是財產的區別，也不是收入的區別，乃是「是否黨員」的區別。今日蘇俄國內，黨員與非黨員的分別最為要緊。報酬及其他的分別，均在其次。

主席：這裏有一個問題，要請勞台大尉（Colonel Party）答復：

「在需要改動工資與物價時，汎繫制度是否較資本制度，更能有舉動迅捷而平易之利？」

勞台大尉：我以為很明顯的，汎繫制度是有這種便利。不過要辨認明白以汎繫制度的限制，來換取這種經濟的伸縮性，是否值得。

主席：我還有一個問題請勞台大尉答復：「資本主義下所必有之浪費，國家社會主義是

否能避免之？」

勞台大尉：我想是可以的。現在這個問題，是關於個人競爭之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當然可以免去不少的浪費。但是這樣的答復，毫無意義。第一，浪費雖多，並不是不相宜。這是人們在滋長進化中所付很低的代價。吾人生產力之不斷的增加，乃是各事做得對路的結果；可是同時一定走過不少的錯路，白費了若干的精力。千百年後，人類或者進化到超人的地步，做事都能每試每中，第一次就得着頂好的辦法。未曾到這一天以前，要求進步，就免不了浪費個人的創造力。否則祇好拘守於庸常的方法而已。

主席：微拉里博士在演講時，說過：「汎繫主義之經濟制度與汎繫運動之政治方面關係密切。」我想是因爲這句話，所以勞台大尉現在問他，「墨索里尼之後，打算行何種制度？」

微拉里博士：鄙人有一位外國朋友，同時他也是墨索里尼的朋友，他有一次答復這個問題說：「墨氏死後，將有盛大的葬儀，美麗的鮮花，動人的演說，兩星期後，各事照舊進行。」

但是還有一個法律上或是憲法上的答復。汎繫黨最高議會之法律，規定由該會預

備一名單，登記公認合格可以繼承墨索里尼之人選。人數隨時補充，極爲詳備。至墨氏過世或退休之日，呈之國王。國王認爲何人最爲合宜，卽行召見。此條規定係墨氏親自草訂的。

天才引去，自然是國家的損失。不過意大利國中，現在幹才甚多，物色一位繼任之人，尙非難事。

卜金斯 (George O. Perkins)：況繫主義是否主張限制居積私產？其限制之程度若何？

微拉里博士：誠實本分中得來之私產，其居積毫無限制。若取以非分，卽將受法律的制裁。這是在意大利和其他文明國家一樣的。

主席：勞台大尉請問微拉里博士：「獨裁制與民衆政府之間，有折中之路否？」

微拉里博士：假使是在戰前的話，這個問題的答復一定是反面。在今日政府之種別繁多，性質互有異同，很難確切斷定，說是某種政治，同一政府，就某方面看，是獨裁政治；就另一方面看，也許是民衆政治。意大利目前之政府，或者可以說是民衆的獨裁政治。因爲墨索里

尼的權力，是民衆意志所授予的。

傅斯特：(Rabbi Solomon Foster)：

康慈同微拉里兩位博士在演講時提起共產黨與汎

繫黨，而未道其詳。請問怎麼樣就叫做黨員？做了黨員，有什麼利益？在他們的組織之中，黨的權威若何？

微拉里博士：簡單些說，做了汎繫黨黨員，在道德方面，一個人可以獲益匪淺。而且黨員有時

也享着種種便利。然而非黨員也一樣的可以充當公務員，在政府各機關服務。軍人則不可以做汎繫黨員。因為習慣相傳，意國軍隊總是被認為超然於黨派之外。現役軍人既不能入黨，當然不能做汎繫黨黨員了。

在別種機關裏面，非汎繫黨員很多。通常汎繫黨員是享受優先利益。不過我相信這一點並非是意國特別。在別的國家，一黨黨員，總有這一點權利的。

康慈博士：擇要來說，共產黨統治蘇俄，是沒有問題的。在俄國不論是否黨員，皆不否認這一層。現在共產黨黨員約有二百萬人。此外更有兩個團體擁護本黨：一個是青年共產黨；黨

員年齡從十三歲到二十三歲，人數約三百萬。一個叫做先鋒隊（Pioneers）；隊員皆是十歲到十三歲的兒童，現有人數約四百萬。

取得黨員資格，要先經過相當考慮。聲請入黨之後，還要經過試驗時期。試驗時期的長短，以聲請人之職業爲斷。共產黨自然是喜歡勞工階級的黨員。該黨希望黨員中百分之五十是直接從勞動板櫓上來的。貧苦的和中級的農民，也一齊歡迎入黨。

設若你問一個共產黨黨員，有什麼權利，他一定回答你說：「沒有權利祇有義務。」黨員須每星期做十小時到三十小時的工作，並無報酬。縱然你特別能幹，所得的報酬，也沒有非黨員的人多。黨員每月所得，不得超過三百盧布。非黨員的工程師每月可以拿到一千五百至二千盧布。可是在另一方面，黨員有一種光榮，自然也有一種勢力的。

主席：微拉里博士請問康慈博士：俄國國中的農業空氣仍濃，國人未能習慣於工業生活所必需之守時與準確，其速成之工業是否能與西方組織較佳之國家競爭數十年百年後可乎？

康慈博士：此間確有道理，所見鄙人大體亦頗同意。至於達到此項可以競爭之地步，需要若干時日，則恐無人能說。大家都不過瞎猜。歷史上從未有過這種舉國一致努力，要將一個簡單的務農的民衆變成工業的組織。也未見過各種教育的工具，各種形成人民生活之勢力總動員，來完成這種目的。

我以為俄國暫時尚不能生產比較複雜的精細的工業品。現在俄國祇在滿蒙以及幾個邊境國內，同西方各國競爭，而且僅僅限於賤價物品。上等質地之貨物，一時我想還不能競爭。但是也不過二三十年的事罷。

主席請波斯頓國家蕭麥銀行董事克萊頓 (Albert M. Creighton: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Shawmut Bank, of Boston) 演說最近遊俄之觀察。

克萊頓：今年四五月間，鄙人到俄國去了一趟。我的目的和興趣是在考究明白自從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九年我兩次遊俄以後，工廠的進步情形如何。我們到工場和製造廠裏面去，感覺得行動很自由。我們同田裏的農夫農戶接談，也在工廠裏會見了工人。

我們所到的第一個工廠是莫斯科的一家製鞋廠。這是我已經關心了多年的一種行業。我看到他們的工作比一九二六年好得多。他們每天製成鞋子兩萬雙。終年如此，從不改變鞋子的式樣。我們走過他們的作場時，一班工人甚至沒有抬頭。這種精神的灌注，在美國恐怕也不容易見到。每天工作分兩班，每班七小時。所做的鞋子，質地同美國在北戰爭後的出品差不多。現在如果拿到這裏來，沒有人肯穿。可是在俄國只做這一種。而且每年出品總數不過七千萬雙，俄國人到有一萬六千萬。

到處牆上，張貼着很大的標語，鼓勵工人競爭，要超過別處工廠的成績。

這一家製造廠的工作效率，我覺得比較一九二六年高得多。雖然有幾個工廠——尤其是幾家造農業機器的——工作效率很低。

從莫斯科我們去到基塢（Kiev）拜訪了「烏克蘭的好萊塢」（Hollywood of the Ukraine）。這裏的影戲場完全是德國人建設的，工作效率尚佳。所出影片，百分之七十五有宣傳品的作用。此中明星月入三四百盧布，（或者說一百五十至二百元美金，）導

演月入四五百盧布。

全國盛行包工制，分件計工。各工場的勞工分出十種到十五種等級。精工每月有的可以賺到三四百盧布，次等工人依次減少，最少的不過每月六十盧布。我看出來俄國的工資同我們的（美國）工資比較，在數字上是差不多相等。只是一個只盧布做單位，一個以金元做單位。

俄皇時代成立之舊工業，現在的效率比往日大。在新設的工場裏，就不行了。喀考夫地方（Khar'kov）有一個製造汽拖車工廠正在建築中，工人的成績很不好。在下諾弗哥羅（Nizhni Novgorod）也正在建築一個預備每年造五萬輛福特車的福特大工廠。這裏管理一切工作的美國經理和我講，木匠的生產力（工作成績）比美國好。不過那些來自田間的農民，怎麼能夠同美國比呢？

在羅斯陀夫（Rostov）有一個大農業機器工場，效率很低。這裏造一架機器的成本，在美國差不多可以造四架到十架。

我們也曾到過大農場去。得着他們的成本的數字。各種工作，如耕田收穫播種，皆是包工制。我們在一個極大的農場裏，停留了兩天。坐汽車走了二百公里路，看見將近六十萬英畝未耕地，這裏用科學方法來減低成本。經理們每年至少到美國、坎拿大以及其他可資借鏡的國家考察一次。

我們到過裏海（Caspian Sea）沿岸巴庫（Baku）地方的油田。此地的石油按照世界市價輸出。同我伴了一天的一位美國教授告訴我，他能用他的鋼筆刀隨地一劃，就有石油。我問他照這樣下去，俄國油豈不是不久就要充溢世界？他回答我說現在已經如此了！

我認爲俄國原料的輸出，即將大大的增多。最受打擊的，將爲美國。因爲美國生產原料品多，全靠能夠輸出以資挹注。

至於工業製造品，暫時還未見得能有多少輸出，因爲在國內尙且供不敷求。國內的需求很大，全國皆苦於工業製造品之稀少。除非有所必要，或者因爲生貨（原料）價錢

真小，俄國也許要輸出一點粗工業品。否則我相信至少在五年以內，俄國不會輸出什麼的。俄國出品成本比較低，可以銷售於東方工業落後的國家。

我們和各級人士很自由的談話。大體說來，他們都決心完成他們的大計劃。他們不計較需要多少時日，祇曉得一個目標，全國如同戰時一樣的組織起來。爲這個工業之戰，他們情願犧牲，換取將來的快樂；總而言之，人人都情願協助他的領袖使「五年計劃」早日成功。

主席：

幾星期前，紐約某經濟刊物載有一文，供美國留心經濟問題者之研究。鄙人現將引讀一節，請克萊頓、康慈、勞台諸先生加以批評。原文如下：「蘇俄全部制度若能維持，吾人殊無理由謂蘇俄不能供給全世界主要的麥之需要。此種現象，似將大不利於坎拿大、澳大利亞以及阿根廷。在事實上，美國本來設法售麥海外，並使世界麥市不致破壞之希望，俱因蘇俄之故，盡成泡影。」

這一點使人想到克萊頓先生剛纔提起的問題：蘇俄之爲害於美國經濟，將至何種

程度？

克萊頓：鄙人以爲今日蘇俄生活程度之低，祇及美國百分之二十。我覺得倘使我們能和蘇維埃人物聚首一堂，磋商承認蘇俄的問題，如果能夠談妥一種辦法，使俄國停止現在不得不爾之麥及其他原料品之輸出，也許可以算得是一點小小成就。我在最近六千英里旅途之中，沒有看到一點白麪包。除掉在一位美國工程師那裏吃了一些，那還是從美國輸入的。

假使蘇俄能將他們需要正般的原料品，留存在國內，並且能比較從容一點的完成他們的計劃，他們也可不必力求輸出，爲換取機器及其他輸入之代價。

我們一經想起蘇俄努力與世界製造業競爭的時期尙是極短，再細看他的進步如何，我們就會明白他們既決心進取工業的成功，總有一天要拿出出品來同美國和別的國家競爭的。

所以，不如想法讓他們比較從容些來完成他們的計劃。將麥和別的材料留爲己用，

提高他們的生活標準。這樣，到他們開始輸出工業製造品的時候，我們競爭的對手，生活標準至少有美國的一半，不至於像今日僅僅五分之一了。

康慈博士：克萊頓先生所說的一切，鄙人大致見解相同。關於蘇俄的生活標準，可以補充幾句。我走過俄國村鎮的時後，常常想起美國的情形。俄國農民的生活標準，在美國恐怕找不出一個例子。我想只有極南邊的黑人，勉強和他們彷彿。

這樣，俄國的國內市場，很能消納各種物品。俄人對於這國內市場，也很注意發展。所以他們妨害別人的程度，是要看他們必須輸出的多少為斷。克萊頓先生也曾提到這一層。

爲了要購買機器和付給外國專家的報酬來推行他們的建設計劃，他們不得不盡其所有的輸出。並且不能計較賣價（能賣幾個錢就是幾個錢），因爲他們心目中認爲整個國家的發展是無價之寶。爲完成這個目標，一切祇得不計較。蘇俄同各國間這種緊張的局勢，要是能夠和緩的話，我想祇有蘇俄計劃成功之後，或是蘇俄能向各國借款。假

如蘇俄能得着大量的借款，他和資本主義制度中間的緊張衝突，一定可以免去不少。

至於整個制度已經發展成功之後，蘇俄是否終為禍害，現在當然不得而知。蘇俄經濟學者說，在社會主義或集團主義制度之下，輸出品之地位和資本主義制度之下不同。新制度確立以後，輸出將以輸入為職務；輸出祇以必要為限度，來補助自家的產品，並且使得能夠買進自家不生產或不能生產的貨物。

勞台大尉：在理論上經驗上，經濟學家都認為國際貿易逐漸的發展，多沒有遺害。祇有突然猛烈的變動，才引起困難和糾紛。

再則，我想諸位經濟學者也認為在工資和工作時間上面，是沒有國際關係的。還有使諸位驚訝的話，就是講到國際貿易，世人絕不去注意某一國的出品，是用奴隸，囚犯或是自由工人生產的。工資高低，每日工作時間長短，也都不去管他。

這幾句話諸位聽講的人也許覺得詫異，但是經濟學家，從理論和經驗體會起來，卻認為是真確不錯。

我相信我們可以不必覺得蘇俄的威脅。蘇俄的工資如何，工作時間如何，物品是否在監獄裏生產的，與我們沒有多大關係。對於我們最要緊的是蘇俄在國際市場售出貨物的數量，以及其數量變化之速度。

蘇俄爲清償輸入機器的代價，不得不輸出貨物求售。但是我不相信，他們肯比世界市價少賣一個錢。他們賣東西絕不會專以賤賣爲樂，無非也是待價而沽。在事實上，我想現在蘇俄輸出的麥，還不及帝制時代的多。（雖然日見增加不久或要超過舊日的數目。）

麥子輸出的變動倘若很快，別的國家也許要受累。若是變動和緩，受影響的各國，經濟情形，不難隨時調節適應。不至於引起困難，也不會有何流弊。

主席：我們討論了多時蘇俄國內的工業狀況，以及其或者爲害世界經濟之可能。諸位再有何意見？

尼孚：(M. Charles A. Le Neveu 法蘭西殖民聯合會會長 President of L'Union

Coloniale Franquise) 鄙人覺得在這一點上，我們所說的是否切題中肯，頗可疑問。大約十年八年之前，我有一次同此地一位最大穀類商人談話，研究事實的結果，發現美國當時每年輸至歐洲的麥，數量恰與戰前從羅馬尼亞和俄羅斯運出來的相等；當時這兩國正在絕跡於市場。所以現在的問題是諸位是否認為蘇俄能永遠被屏於世界地圖以外，而不是蘇俄挾其豐富的物產，能否禍害今日之世界？

勞台大尉說，現在商務的狀態，是因為蘇俄是共產制度的原故。這話我很同意。但是蘇俄將來不見得就是個壞東西。至少在世界貿易上，不會激起大變動。

勃朗教授 (Prof. Philip Marshall Brown, Princeton, N. J.) 鄙人覺得勞台大尉和康慈博士二位，對於傾銷問題，見解似乎不同。我以為康慈博士好像是說蘇俄是賣物不計價。而勞台大尉說不然，蘇俄也要在世界市場中，尋求善價的。

我還要說得確切肯定一點。就拿木料和木漿等物做例子，蘇俄的方法，是不是已經和傾銷不同？他們現在輸出品，是不是專為在這舉世困難的時候，使資本主義各國受

窮呢？

康慈博士：假使我沒有聽錯，勞台大尉所說的話，我很同意。我想他的見解和我的並不相反。蘇俄有輸出求售的必要，同時他當然也希望價錢愈大愈好。

說蘇俄現在是為政治目的而實行傾銷，我以為是無稽之談。

勃朗教授：鄙人請教，將來蘇俄工業有相當根柢，「五年計劃」已經實現的時候，蘇俄是否要用工業的力量來完成政治的目標，散佈革命於世界？

康慈博士：在上次發言的結論裏面，我曾經提到這一點。我說這個問題有若干政治的方面關係。當時沒有細講，因為就是說也不過全是揣測。「五年計劃」成功之後，或是再來幾個五年計劃都成功之後，是什麼情形，沒有人知道。蘇俄一點一點推進得異常的快，十五年二十年之後，蘇俄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我們祇好懸想猜測。他是否要用工業的力量來完成政治的目的，是沒有一定的。

培克拉司博士：(Dr. Herbert von Beckerath, University of Bonn) 第三國際計劃

在資本主義各國傳佈革命，若乘此時各國經濟爲難，輸出蘇俄產品，破壞各國工業，使各國受累更深，不知是否合理？

康慈博士：假定根據尊論的前提，並且不問俄國現在的局勢，如此做法，自無不可。但是實際上各國的蕭條也使蘇俄政府大爲受累。蘇俄輸出各貨，售價低於預計的很多；所減大約有百分之三十。輸入機器，付價雖亦略少，但是不過百分之十五。所以他們必須輸出的貨物，超出預計的數量，以致國內掙扎愈苦，生活程度愈低。

培克拉司博士：想再請教康慈博士一個問題。爲免除誤會起見，可以這樣說：從德國的觀點而言，假如蘇俄能向和平自給一條路發展，鄙人認爲可以欣幸。我們德國人自然很需要同俄國恢復深切的經濟來往。可是這裏引起了一個政治問題，對我們比對美國尤爲重要。德國的經濟危機和困難，大部份都是蘇俄和德國國內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兩種趨勢相爭的結果。這種爭鬪繼續存在一天，即使蘇俄政府決心改走比較切合實際的路，我們國內總一天離不了有革命的共產黨。自然，德國的共產黨自然皆有革命的傾向，並且

同蘇俄政府總有關係。假設蘇俄政府有意循切合實際之途徑發展，在德國的共產領袖能向他們說：「你們不可如此；你們將破壞我們在德國之革命。」為蘇俄人民計，蘇俄政府能輕易放棄其共產理想否？我雖極願贊同康慈博士之見解，對於此點，竊深懷疑。甚願康慈博士再行賜教。

康慈博士：鄙人不知如何答復培克拉克博士之間。足下之議論，鄙人頗能領會。共產運動本有國際情勢。至於五年十年或十五年後，國際勢力與國家勢力何者將較有力量，卻無人能說。我個人的意見，以為如果大事的成功是由於國內的陣線之經營，對於國際運動的熱心，就會減少。我想現在蘇維埃政府，因為世界各方的共產黨皆要他相當的供給，很覺為難，這種奮鬥將來如何，則鄙人不敢強不知以為知了。

安德生法官 (Judge George W. Anderson, Boston, Mass.) 不知勞台大尉是否認為土地的城市價值以及地下權 (五金礦物等) 之個人所有權 (individual ownership of urban values of land and sub surface rights) 乃競爭的個人資本主

義之主要部份，敢請賜教。

勞台大尉：我想土地和天然資源之所有權的問題，和國家資本主義對個人資本主義的問題，是完全可以分開的。假使我們要這樣做，我相信能做得用捐稅的辦法，拿這種土地，資源之價值，無形中變為國有。所以我想這個問題是可以同國家資本主義與個人資本主義問題完全分開的。

安德生法官：鄙人請問，假如認為這些價值是屬公共所有，個人競爭的資本主義之範圍將如何？

勞台大尉：我想國家吸取土地價值和資源價值，對於我們所認識之個人資本主義，並無重大影響。這個資本主義的表現，主要在於生產及分配之方法。我們用土地作工具，並不是專靠着土地及資源之私人所有權。

主席：勞台大尉請教康慈博士，蘇俄之承認私有財產，可以到何種程度。

康慈博士：鄙人恕不知道。六月二十三日斯丹林在工業管理會議之演說，自然代表對資本

主義相當的讓步。至於他們是否將繼續妥協下去，以致容許土地、天然資源及生產工具之私有，那就不得而知。假如他們對這幾點也讓步了，我想所謂革命，也必成爲過去。不過我以爲他們不會這樣的。

主席：微拉里博士請問康慈教授，俄國農戶本來自有一點田地者現在忽被吸入集團農田，即使令其在學校與軍隊裏受相當的共產主義教育，他們對於現在的情形，是否能長遠滿意？

康慈博士：這些農戶當然不能長遠滿意。但是二三十年後他們都將過世。另外起來的一班新式農民，在新環境中長大，聽慣了新的思想，人生觀自然不同，也許能夠樂意於集團組織。

主席：鶴見先生請問三位講員服務之精神，所以藉以維持社會之生存者，在何種經濟制度之下，最宜發達？

鶴見祐輔 (Yusuki Tsurumi) 說明其問題謂：鄙人心目中認爲日本國中現在的情形甚

是嚴重。近代日本進步的原動力，並不一定是普通人民的平均能力。大半還是因為一時的風尚，有許多優秀的領袖人物。這班領袖階級，俗稱「武士」(Samurai)。他們都是學養有素，祇曉得企圖全體社會的進步，沒有利己的念頭。

這種人現在漸漸少了，並且是後無來者。他們正在經過各國在初期所必經的未成熟的資本主義制度。在這種制度之下，我認爲有一種不良的趨勢：富於侵略性而善於獵取的青年容易得到生活上物質的發展；具有「武士」精神大公無我的青年反而不免於落伍。

在這資本主義制度裏面，我們怎樣就能保守住從前武士的服務精神，確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我想請教三位講員先生，撇開宗教和倫理的觀點，從保存社會品級一方面着想，不知何種制度，最能增長個人爲大我服務的觀念。

微拉里博士：我認爲事實上無論在那一種政治制度之下，皆可以養成一種社會服務的觀念，祇要政府行政當局真能赤心爲國，有爲主義而努力熱誠。

就意大利講，我們的歷史上，也屢屢有過這種時期：改組運動時代（Risorgimento，）汎繁主義運動的初期，以及今日。但是到了一種制度漸趨穩固的時候，這種熱情與奮，總不免跟着淡薄下去。我以為這是不與某一種政治制度有關的。

在英國也有這種情形，很多人做了多少有益的公衆事業，而不受酬。別的國家也有。我以為政府的形式，於這一層沒有影響。完全要看一時的情形如何，民族所過渡的時代如何。

康慈博士：談到這個問題，時代和環境，自然有重要的關係。在另一方面，我卻頗以為在一個共產主義或是集團主義的國裏，比在偏於個人主義的組織裏面，注重為羣服務的成份與機會，總比較多些。實在講起來，共產或集團主義的優點，也就在這一點。蘇俄現在能夠發展很快，並且正在將所有一切的資源，加以一番組織。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只有犧牲個人以利全體。

勞台大尉：對於這個問題，我們要認清了此處所談的不是感情狂熱時由興奮中生出來的

服務觀念，纔能得到真確的答復。我想答復這個問題，應注意要用一個初期熱情已經過去，目下沒有特殊興奮狀態的國家做標準。這樣，我可以說，凡是有團結的社會，一定可以表現出服務的精神；這種精神與社會團結之程度以及人民對於現有制度之信仰心的濃淡成正比例。

富於服務精神之個人，各種社會皆能助其發展。而此種服務之精神，在徹底團結的社會中，亦愈有普及深入之傾向。

勒帕博士 (Dr. W. E. Rappard)：共產主義，根據於馬克斯主義；馬克斯主義的基本學說是歷史的唯物論。康慈博士曾說，假使集團主義有一點長處的話，就在能夠激發服務熱忱。這種勇於服務的心理，當然不是經濟的唯物史觀所能解釋。所以共產主義的唯物論的基本學說與今日共產黨徒之服務不圖私利，殊不相容。康慈博士在俄國見到的共產黨人，不知對此矛盾亦知之否？

康慈博士：這個問題我曾經對很多共產黨人提起。他們以為沒有什麼矛盾的地方，或者他

們相信是這樣的。我不信他們經濟主宰觀 (economic determinism) 竟完全否認思想與情緒之重要。他們可以辨說思想與情緒必須有一個自然的物質的基礎——階級社會，或是天性。——但是思想的重要，我想他們是承認的。實在他們和理想派社會主義者的意見分歧，似乎就在這一點。他們並不否認理想之功能，不過認為理想必須要產生於並表現某一特殊社會之願望與情形。

拉伯特博士：承康慈博士見示屢與共產黨人辯難此點，深為忻幸。鄙人將認為博士未嘗同意於彼等之見解，如何？

康慈博士：鄙人未嘗相信。

主席：我們又有一個對全體都有興趣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諸位大概也各有意見。原提問人請勞台大尉答復的是：

「康慈博士在他的演講裏面，主張美國承認蘇俄政府頗力，請問勞台大尉此時給予完全的政治的承認，不以爲不智否？」

勞台大尉：這個問題，我很難代我們的國務院置答。不過我的印象是這樣的：假使蘇俄能不
再堅信對資本主義之世界革命，為達到彼之經濟試驗成功所必要；並且更進一步，能有
相當證明，不再有意擾害別國之國內事務，則美國政府殊無不應給予承認之理由。

微拉里博士：意大利政府與蘇俄政府發生政治的及經濟的關係，但是雙方事先諒解，意政
府不能容許蘇俄政府之駐意代表作政治的宣傳。所以至今從未有過任何糾紛。共產黨
的宣傳工作雖然不免，與蘇俄使領人員，卻絕無關係。我以為有意承認蘇俄的國家如果
預先聲明，蘇俄政府不得擾害其國內事務，則與蘇俄發生關係，可無危險。敵國和別的有
幾個和別國家的經驗如此。

主席：鄙人想請問克萊頓先生肯不肯討論這個比較廣泛的題目：美國對蘇俄應取之態度。
克萊頓：我們美國製造家，一向在蘇俄營業，自然沒有法律上的地位。我們去年在蘇俄的貿
易，總計賣出貨物美金一萬五千萬。我到蘇俄去過，覺得我們本來至少可以做到五萬
萬元的生意。我們的製造家沒有我們政府的承認，對於俄國買戶，不能放開手做。

剛纔一位專家說過，我也相信，假使蘇俄肯同意放棄世界共產主義，我們就應當同蘇俄政府磋商承認的辦法。我們同各級人士談話，覺得他們對於世界共產的興趣，遠不及對於電氣等事業的濃厚。實際上注意世界共產的人，真是很少。我們在談話中間蘇俄領袖爲何不放棄世界共產主義，他們的答復是要同我們的政府談判，他們願意得別國的承認。當然，一切他們都推在黨的身上，說是與政府不相干。但是到俄國去過的人，自然都了解黨就是政府。

我已經說過，我們的政府可以找到與蘇俄貿易的辦法。或者我們能夠多賣些棉花給他；或者我們同他做交易，多給他一點信用。這樣蘇俄可以從容一點完成他的計劃，生活程度也可以跟着提高。我以爲假使他們真放棄了世界共產的理想，承認蘇俄於我們很有利益，尤其是從今日美國的商業方面着想。我不信一萬六千萬人當中，會有一千萬人以上對世界共產發生若何興趣。

勃朗教授：在法律方面，假使有不守契約的事情，不知在俄國有無法律的救濟？

克萊頓：鄙人不知道。尊問如是關於在俄經商之美國人士，這一層很是疑問。

勃朗教授：那麼，對於一個不保障契約的國家，予以正式承認，是否相宜？

克萊頓：這個要政府去決定了。

傅斯德 (Rabbi Foster)：了解整個局勢之所以困難，每每因為同樣的一個名詞，用起來我們和蘇俄共產黨的意義不同。在生產一方面，蘇俄確是借用了我們的技術和名詞，但是用起來，他們的含義與我們不一樣。

譬如「兄弟之誼」(brotherhood)「工業」(industry)「機器」(machinery)「階級鬥爭」(class struggle)等類名詞，我們的含義和蘇俄的人就不同。雙方言文不同，終久難得互相了解。

最後我想問康慈博士一個問題。卡非德博士 (Dr. Garfield) 在我們聽到「共產主義」演講之先，告訴我們說他曾竭力設法想請一位道地共產黨員來演講，使得大家能夠聽到更親切的見解，結果未能辦到。事實上共產黨對於黨員到這裏來宣佈共產黨

的見解和活動，有一種事先的恐嚇。

請教康慈博士，共產主義以及共產黨的計劃裏面，是否有不可告人，不願告人的地方？

康慈博士：假如有的話，他們也不會讓我知道的。

閣下所問，鄙人實不知如何回答。我曉得有很多共產黨員到美國來，很自由的討論哲學的問題，以及其他事件。至於何以不能請到一位政府的代表來這裏講演，就不得而知。我對於共產黨的內部政務不十分明瞭，所以不能置答。但是關於承認的問題和世界共產主義，我很願意作一個概括的批評。

國人對於這一點神經之敏，我常常覺得詫異。我們向來勇於派遣我們的文化的代表到外國去傳佈我們的思想和信仰。並且要求別的國家讓我們設立學校，以我們的思想和主義設教，想叫人家跟我們走。一個慣於做這種工作的人，見了幾個共產黨員要到美國來的問題，就興奮起來，實在令人不解。

卡非德博士：鄙人希望諸位對於傅斯德先生剛纔提起的話，幸勿誤解。寫信給我的人並未用任何恐嚇。除非我們斷章取義或是無中生有的猜測，他也沒有暗示將有危險。他所陳述的主旨是叫我們大可放棄從蘇俄請人到此地來同我們討論經濟或政治問題的念頭；想再回去的人是不肯來的。

但是請諸位不要留一個印象，以為對於這個人有什麼威嚇。他的理由如何，我不知道；寫信的人未曾說出。

鄙人有一個問題想說出來，不拘拘地問那一位，請諸位隨便發表意見。我一向以為任何國家總有一種了解：他國之代表絕對不許涉及本國國內問題，否則即將招致斷絕外交關係之嚴重結果，並請該代表離境。

這個問題，國際法律家必須答復。我們姑且認為政府方面預備承認蘇俄。蘇俄如不妨礙我們的政治制度以及立國之基本原則，我以為殊無取消友誼及斷絕外交關係之理由。但是一經有擾害的情事，我想或要變成像微拉里博士所說的在意國的局勢。

會場中有人發言：去年我曾經問蘇俄外交部，有何方法可以促進俄美之關係。當時所得之答復，其內容雖不便全說，對於承認的問題，卻不能使人起勁。這話或者可以補充前面所講的一切。我們儘在討論我們的希望承認蘇俄之可能，但是我看不出蘇俄有什麼想要美國承認的表示。

勃朗教授：鄙人敢請在會諸位注意坎拿大已經宣布禁止蘇俄貨物進口。因為坎拿大覺得蘇俄在精神方面侵擾宗教，同在經濟方面危害木料、煤、麥、傢具等幾種基本工業。

我國國會上次開會時奈弗大省（Nevada）議員哈代（Hardy）氏曾提案主張美國禁止俄貨進口。我想本屆國會開幕，仍將有此種提案。

蘇俄也可以說是達於極點的資本主義國家，因為全部事業總歸一個機關經手。沒有比這樣再利害的資本主義；最能擾亂世界的也就是這個情形。

高培特：（Dean P. E. Corbett McGill University）勃朗教授首先說拒絕俄貨是為的侵犯宗教信仰，接着又說是因為有與基本工業發生衝突之危險。其實宗教問題不過是

一個藉口，骨裏還是爲了工業的利害。坎拿大許多的人，連我自己在內，認爲這個舉動甚爲愚笨。我可以說這個對俄禁令決定的時候，坎拿大希望世界各國不久都要效尤。結果可是大爲失望，並未有人照樣行事。

勃朗教授：有幾樁事情，我們應該常常記着。英法意等國承認蘇俄政府的時候，皆是自己有所危急。英國被逼於經濟問題不得不承認。意國我想也是爲了很重要的經濟理由。至於主要的法理的問題，關於承認的基本原則，他們祇好完全丟開不講。

我們向來所有關於承認的原則，歐洲各國已經不得不置之不顧，但是我們不必如此。

我現在提議，我們在承認一個政府以前，第一要看有相當的證明：他能夠並且情願盡足一切國際間之義務。第二假如是對於一個特殊的國家，我們先要問明白：他是否情願擔保我們的人民在其國中能有自由？是否可以自由營業，自由與人訂立契約以及設遇契約被破壞時，能受法律之保障否？

這些總是國際法應該問到的問題，假如沒有正面的答復（例如蘇俄）不能予以承認。我的朋友談起俄國法庭的情形，說他們的辦法不合於任何法理學的制度。關於財產一項，他們既根本不承認其成立，自然更無所謂什麼法律的制度。

我以為這個比較某一國家代表之行動是否不害及我本國之利益的問題，重大得多。這個問題是我們是否願意承認一個違反國際法全部制度的國家。

我們的政府堅守關於「承認」之主要原則，不欲利用機會，不肯專為商業，唯利是圖。此種態度，我以為很明容正大。

司各脫教授：世界文明國家，除美國外，仍有未承認蘇俄者否？

拉伯特博士：瑞士。

主席：微拉里博士說捷克斯拉夫亦未承認蘇俄。美洲還有幾國。

第二次會議

主席卜拉克斯里報告：我們現在敦請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胡佛教授（Prof.

Calvin Hoover) 將況繫主義、蘇維埃主義及資本主義三種鼎峙的經濟制度之顯著特質，作簡單的說明。

胡佛教授：試返觀一九一四年七月，人類之經濟、社會以及文化生活，無不為受資本制度所支配，所以直稱當時之資本制度，為資本世界之文化，良無不合。蓋亞非二洲及海島中之不進步民族，雖然不會工業化，但是都受工業化及都市化的資本主義國家之操縱。世界大戰的影響，予資本制度以極大的打擊，而促成一個新制度之產生。這個制度乃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而呱呱墮地。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鬭爭之結果，在意大利呈現「直衝羅馬」(March on Rome)的一幕，而第三種制度又應運而生。

馬克斯嘗云：無階級的社會主義，乃為資本主義之邏輯的、不可避免的發展。我們以無階級狀態，為不合邏輯的或是可避免的，固非不可能，但現時在蘇俄建設中之社會主義，則有許多證據，可表明其乃淵源於資本主義。共產黨現正絞盡腦汁，摹倣資本制度的生產技術，以求生產之發展。資本主義的大量生產之利益，不待盡行闡明，即被引用，且不因資本主

義國家，有不可剝奪的個人私有財產權利，爲蘇俄所無，而稍有顧慮。在資本主義國家中，鄉農之耕植，恆墨守舊法，對於資本制度的技術和組織之採用，往往橫加阻撓，但在蘇俄，此種掣肘，悉遭嚴厲取締，絲毫不假寬貸。

都市化大概是資本主義中最彰著之特徵，而在蘇俄則進展之速，幾開從來未有之記錄。人類的機械化，物質化，及標準化所達到之程度，使彼批評家，平時謂此類特徵，統由於影響我們各方面生活的利潤經濟（profit economy）所支配者，感覺極度的遺憾。彼文學家向來詆擊資本主義之驅迫婦女重行自謀生活者，今將發覺蘇俄婦女投身工界之運動，且已急遽地具體化。彼社會學家一向斷定都市資本主義，爲家庭衰落之原因者，現可目睹蘇俄爲趕速建立無階級的狀態起見，已使此種變遷，進展愈速，其時間之短促，且爲資本主義世界所望塵莫及。

然而共產黨所建樹之經濟，社會，文化制度，與資本主義國家相比較，根本上迥不相同。正統派共產主義者以爲蘇俄現行制度，並非社會主義，而僅爲社會主義之建設時期。

但是他們又堅決聲明，現行制度，亦並非國家資本主義。就這點而言，他們當然不錯。他們說社會主義正在進行或建設中，即所以指明社會主義整個地運用，必難通行。自我們的見地而言，我相信我們必一致同意說蘇俄的現行制度，在實質上是社會主義的。

私有制度的毀滅，顯然標明蘇俄制度是社會主義的。此不但爲蘇俄共產主義與美國資本主義最彰著的分野，抑且爲與意大利汎繫主義最特殊的區別。還有共產主義與這兩個制度其他的經濟差異，亦全根據私有制度不存在而起，即文化上的差異，亦大半因是而殊。再就實際言，蘇俄絕沒有利息、租金及利潤的私人收入。蘇俄在經濟設計時，不必顧及資本家、地主及企業家的利益。國家經濟的收入，亦無一部份須分攤於這一類的階級。而國家經濟方面，亦未嘗受到他們的貢獻。

個人在財產上既無收入可得，則依收入而成立之生活標準，當亦歸消滅。現在不但無有閒階級，即有閒階級所創造之文化，亦無從存在。我曾在俄國居住，當我無論何時，目睹此處家庭之安逸，有僕役、汽車及其他享受，而婦女輩消磨心力唯一方法，不外品茗與

手戲，我知凡此種種，與夫更形奢侈的生活，在共產世界中，盡歸消滅。不過此種生活與文化之新標準，所以發生於共產世界中者，卻並非出於共產主義者有意使然；其一部份的原因，當歸結於私有制度的破壞。

密切聯帶於廢除私有制度之另一事實，便是對於企業家、自由職業者、及技術專家，取締巨額薪金。說到這裏，人必度予猶未熟悉最近蘇俄的情況。不觀報章載滿斯丹林讓步於智識階級的消息，以為社會主義之失敗，已有新證，而資本主義之恢復，殊屬必要。此種解釋，對於茲事之若干重要方面，頗為忽視：第一，工作報酬之分等級，並非新奇，十年前業已實行。現在特加以注重者，因自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間，工人嘗自起運動，要求各種薪金與工資的平等化。各設計機關每年修正各工業之工資，均以平等為唯一目標，而勞心勞力之俸餉制，亦具同一趨向。最近改革，僅將廢除差別，失過之太速之辦法取消而已。彼企業家及技術專家所獲最高的數額，仍極低微。勞力與勞心的差別，迥不如在資本主義經濟中者相懸之遠。此差別之極微限度一部分乃為私有制度取消之邏輯的

結果。因在資本主義經濟中，企業家鉅額的收入，皆有賴於公司財產權。再則，共產主義者對於物價制度並不感到恐慮，亦為一部份的原因。他們決不願其能力的代價，為自由競爭市場的價格所支配，如土地的租金一樣。他們對於薪金及工資的差別，最大的讓步，便是差別的數額，祇須鼓起人們的服務興致足已。

婦女的地位，因有育嬰所，保姆，社會保險，食品社會化的配製及消費，社會化的公寓等設立而改變。因之彼等遂可脫離家庭的羈絆，投身於工業界，而使社會與經濟亦起深刻的變化。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經濟的分別，雖較社會的分別，更形重要，但使我們深切注意兩者間的鴻溝，卻為社會的分別。當一工人在裝置機器上的螺旋的時候，對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別，固不必發生如何的異感。但等他一出工廠，便恍如置身於另一的世界。甚至智識階級，在工業中所佔的地位，雖與往昔大不相同，亦深切感到社會的變化。

純粹的社會主義，須俟無階級的狀態形成後，始得建立，是乃共產主義學說的一部

份。到那時候，既無大小資產階級，及貴族階級的分別，甚至智識階級，亦不能獨樹一幟。在此社會主義的社會中，亦無農人階級的存在。所有的羣衆，一律均是在工業中工作的人，蓋農業此時亦已工業化了。共產主義者又曰：屆時其他階級在「清理」(liquidated)或消滅之際，無產階級的獨裁，卻無可避免的。在此時期中，我們所注意的利益，祇爲無產階級的利益，對於農人階級則取一種權宜方略，姑與和協，直至時機成熟，乃舉行清理。在此無產階級專政的時期中，獨裁的袖領，當由共產黨推選。權宜方略與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獨裁，並爲列寧主義者師承馬克斯主義之最明顯的成效。

昔日之各種階級，蘇俄概目爲投機者，不惜加以剷除，實爲今日蘇俄最特色之點。惟現今所施之恐怖與強力，是否僅爲無產階級獨裁之過渡期內一時的現象，抑在無階級狀態成立後，仍將存在，實一問題。設有人將「枝曲則樹彎」一舊諺，適用於文化社會制度及個人，那末人們必難於相信人類自由現有的束縛，祇是暫時的而已。

人們雖喜擇一種基於社會及文化特質之制度以生活，而對於基於比較經濟效率

之制度則不在意中，不過欲判定制度的優劣，主要的關鍵，卻在經濟效率。如資本主義依然比之社會主義，能維持多量的生產，那末終是共產主義的強敵。如資本主義，給予勞工的產品，依舊多於共產主義，那末世界革命的前途，殊形暗淡。

雖然，資本主義世界所以能生產力優越者，其主要原因卻不在工程上之技術。若純自工程立場言，蘇俄之經濟，則甚落後，決不可與資本制度相提並論。當此經濟衰落之際，我們所不能不注意的，就是資本制度之種種問題，決非一主持生產的工程師所能解決。我們急待解決的種種問題，乃是分配與推銷的問題。我們暫時至少不能否認我們的生產能力，卻超過我們的分配與推銷產品能力甚多，資本與勞工均剩餘過多，流於游閒，致釀成我們目前一籌莫展的問題。

我們的放任主義經濟，恰與蘇俄的統制經濟（centralized and authoritatively directed economy）並時對立。後者權力的伸展，甚致一工人在休憩之際，亦莫能擺脫，故其職業雖有保障，但須犧牲在資本主義工業中所享受的自由一部分。實則自由一

名詞，不毋失之空泛，然當此失業盛行之時，此抽象的自由，對於工人有何價值，不無疑問。且蘇俄限制工人隨意調換職業的措置，在英美德無處覓工作的工人心目中，亦以為無甚討厭。

設計制度，便是蘇俄的統制經濟政策之特色。我信蘇俄的設計制度，輒易被人誤會。而彼崇拜者，對於此制度所注重之特點，據調查所得，卻是最容易被人攻擊的弱點。

統制經濟之最大利益，並不在能謀久遠的設計，而在能免除分配及推銷之阻滯。雖云今日蘇俄欲在斯丹林格拉製造汽拖車及在頓河上羅斯陀夫 (Rostov-on-Don) 製造收穫機能否成功，因為嚴重問題，但其對於此等製造品及煤、鋼、油、食品、衣料等之推銷，則尚易解決，且在將來，我們殊不信此種困難仍可發生。失業與購買力低減二豎，已為統制經濟所驅除，而絕跡於蘇俄疆域之中。故在將來之二十年中，此達到預期目的所不可少的設計之大有進展，與夫設計經濟中有若干預料的阻礙之卒歸消滅，我們縱無天通的本領，亦可加以肯定的。

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及汎繫主義相反，而具有國際性質，此我們應該注意的。但是我知「國際資本主義」一名詞，我們也常常聽到的。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常被指有推翻國際資本主義之陰謀。實則資本主義，如果真是國際的，必益形鞏固，但實際上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利害是相互衝突的。最好的例子，莫如拿各國和蘇俄貿易來說。自國際資本主義為共產主義的仇敵的立場而言，資本主義者當拒絕與蘇俄來往貿易，較為有利。但是資本主義的私人或國家，決不能坐視一邊，眼觀其他的資本主義者與蘇俄進行有利的貿易。所以蘇俄貿易得存在的理由，全由於資本家及資本主義國家間利害不相一致的關係。

汎繫主義，是國家主義的表現，至為明顯；對於這點，實無注重的必要。不過共產主義的國際性質，有時卻每致遺忘。我相信新聞記者而訪斯丹林所錄的談話，與里維諾夫在日內瓦所擬議的經濟不侵犯條約，遂誤認國際共產主義，已不足為國際的因素。依我的意見，此實去真相遠甚。值此大戰之後，資本世界正陷於困難之際，蘇俄擬拋棄世界革命

的理想，豈非兀突的事件嗎？現在無充裕的時間，故余不能將此點從長伸述。吾們不要忘掉蘇俄革命，是在蘇俄以外的地方醞釀而成。過激黨推翻千古稱雄的帝國，全根據於馬克斯的學說。國際主義是馬克斯學說最主要的一部。蘇俄青年無不受此薰陶，且至今仍奉為唯一的信條。任何人們，苟以為斯丹林根據蘇俄共產主義的信條，將放棄世界革命，那末他簡直不明瞭該黨的真相。至於此種見解的來源，由於一般人均認斯丹林戰勝托拉斯基，是右派超勝左派的事實。

現在我擬將汎繫主義與其他二制，作一比較，因余將純從局外旁觀的地位，加以觀察，故私心殊覺惴惴。余對斯制，既未有專門的知識，亦無特殊的資料，所以祇能作一抽象的研究。我所發表的言論，如需糾正的地方，甚望在座諸位，博學高士，不吝指教。

第一，余意汎繫主義，僅為資本主義之另一方式，決不能謂其有改造宇宙或創造一種新文化的企圖。在本質上言之，汎繫主義，是似資本主義在政治與經濟陷於莽亂，或受共產主義脅迫的時候一種防禦線。意大利在汎繫黨「直趨羅馬」以前，確遇此種難關。

意大利的資本主義者，雖不能視為汎繫主義的創立人，但他們已熱切地拉攏汎繫主義，自為打破禁亂局面唯一的出路。汎繫制度，自含有廢除放任主義的意味，我們不妨視此制為資本主義的附屬品，設非指言其主要的本質。美國的資本主義者反對國家干涉商業的政策，恆比較對於其他事體，易趨一致。但是我們祇須想到保護關稅，便明白反對非專向國家干涉而發，乃對於某種的國家干涉而已。

汎繫主義之鄙視及不信任民治政體，恰與共產主義相同。但是應該聲明的是資本主義與民治政體，中間並無不可分離的關係。資本主義能適應任何政治的形式，而不減損它的完整。汎繫主義與共產主義均以權力代替民治政體，而且兩者都承認有創造一集中權力的組織的必要。可是他們的目的不在專圖執政私人的利益。我以為明白事理的人們，都不會相信汎繫黨或共產黨所施行的教育宣傳，僅是一齣兒戲，或是掩蓋執政者的野心的煙幕。凡任何組織，欲嚴密操縱一國的經濟生活，（恰如意大利或蘇俄這樣，）而其目的又非專圖個人的私利，那末我相信造成一種熱心，甚或一種熱狂，實為必

要當我們想到第波東 (Teapot Dome) 及大陸油 (Continental Oil) 兩件商界與聯邦政府的人物，都牽涉在內的煤油賄賂案子，或是想到市政的腐敗，如芝加哥及紐約等處所暴露的，我們覺得在美國，如未先將社會的責任觀念灌輸於人民心目中，而欲毅然試行集中權力，操縱經濟的活動，卻是一個絕大的疑問。

汎繫主義並非先去破壞舊制度再建設新制度，卻是努力於保存現有的社會。我猜想汎繫黨在意大利大權獨攬以來，並未抬高任何一個社會階級使之支配全部的社會。不過這點卻是蘇俄變化的實質所在。自汎繫主義得勢以來意大利原有的社會構造，依然存在。我們仍然可以見到舒適奢華的別墅。下級人民，對於紳士輩，依舊尊敬如昔。主僕的關係迄未變動。汎繫主義亟欲使階級復有意義。汎繫主義者希望階級的職能性質，得以再生。地主對於地產的利用，務期最適合於國家經濟的利益。資本家已不准自行濫定工資，對於生產的進行，亦不得自由進退，價格更不能任意估定。他打算自己的利益，猶須顧到國家的利益。所以假使資本家的見了汎繫主義，是非常歡迎的話，他們現在已經應

該認識他是一位嚴厲的教師了。

共產主義指斥過去，盡是罪惡，惟有在新時代，工人始能脫離束縛，享到世間的幸福。汎繫主義卻追溯過去，復使光榮回照，蓋厥惟在過去中，纔能獲得現代優越的典範。私有財產的權利，雖受箝制，但本質上是受到保護的。自經濟的立場言，汎繫主義頗有雷同國家資本主義的地方。在汎繫主義之下，純粹的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是比在其他制度之下，更見得容易。

汎繫主義所以最受人注意的，因為她可使有產階級免為共產主義所摧毀的一個方法。我現在所說的汎繫主義，並非專指在意大利所表現而言，並包括各處均能採用的一種政治經濟制度。希脫勒（Hitler）為抵制共產主義起見，嘗有建立「第三國家」（Third Reich）的擬議，設共產主義在德國不能成功，則德國國家主義將變為胡根堡（Hugenberg）國家主義，其希望與預定的政策將為恢復往日的帝室，和推翻德國人痛心疾首的凡爾賽和約。假使沒有共產主義的威逼，民族社會黨決不能獲得資本家的資

助。所以在任何資本主義國家中，類此的脅迫，終必招致對抗的勢力，是毫無疑義的。

在這一二十年當中，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至少必起一度的衝突，以定彼此的勝負。不過這種鬭爭，是否是決死的，則尙難斷言。沒有人敢說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經過長期衝突，筋疲力盡後，是否能並峙對立。耶回二教國家的鬭爭，接連不已，幾達數世紀之久，最後結果，仍相行共存，雖未見融洽，但牽延不絕的戰爭，終於已經停止。沒有人敢說資本主義在與共產主義決鬭之際，苟欲生存，不得不採取汎繫主義的方式。人更不能說汎繫主義的組織，將鞏固資本主義的立場。就最後的分析言，決定勝負的關鍵，在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間比較的經濟力量。從經濟方面講，汎繫主義是一個優越的制度，猶待經過相當的試驗。汎繫主義只有增重，並不能減少國家經濟利益間的衝突。

蘇俄的經濟成功，如是美滿，確使資本世界的形勢變爲嚴重。人生哲學與制度哲學的發展，徵之歷史，從未有如近代共產主義這樣新穎卓越的，所以它欲震動世界的聽聞，本身誠無需用十分的力量。照我的意見，當一新思想發展之際，人類每堅持且熱望一切

衆生均接受和利用此機會，不可錯過。用刀鋒感化異教的人們，並非回教獨有的政策。

我剛纔所說的並非說紅軍將有征服世界的雄心。我要請大家注意的，是世界經濟蕭條，如繼續不已，資本主義將發生從來未有的嚴重問題。假使資本主義不能解決自身的問題，共產主義遂得乘虛而入，危逼資本主義。現在因有蘇俄的存在，資本主義切不應讓德意志墮落深潭，或任失業問題，久不解決。

就現在的形勢而論，蘇俄此時對於他國希望甚少的共產革命，決不願意幫助。說不定莫斯科給與德國共產黨的策動，是完全在避免此種魯莽舉動。非等蘇俄工業化的程度，比目前大有增進，共產黨切忌輕向世界挑戰。然而任何人們，如以爲蘇俄因爲恐怕妨害五年計劃的原故，雖德國革命成功，亦將表示遺憾，那就不免未能認識該黨的真相了。

我決不欲談戰爭及革命有爆發的可能，藉以聳人聽聞。我希望資本主義能在民治組織的範圍內，解決自身的經濟問題。我很希望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能夠和平地並存。假使我們的制度能比共產主義維持較高的工資標準，假使吾們的制度能予勞工確

實的保障，假使資本主義國家間，能解除政治與經濟的糾紛，那末共產主義的與資本主義的世界中間，始有一線和平的曙光。這幾件事，沒有一件是不能辦到的。

主席：我們在結束討論的時期以前，猶得欣聆前輩實業家白郎先生的一番高論。先生現任紐海姆夏森林委員會主席（The Forestry Commission of New Hampshire）美國林業聯合會（The American Forestry Association）董事，及白郎公司（The Brown Company）理事，因職務關係，嘗對蘇俄的經濟制度，特別加以注意，今適來本會參觀，實不勝榮幸之至。

白郎先生：許多愛國志士對於美國是否須承認蘇俄及與其貿易，則見解不一，所以我極願意對此問題，發表我個人的觀察。

自國家正式的立場而言，我們不承認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的蘇俄聯邦政府的國家，有下列的幾種原因：

（一）蘇俄政府的執政，所抱的態度，是任意破壞國際條約。

(二) 一九一七年革命爆發後，蘇俄政府將美人的財產悉行充公，且在凱倫斯基 (Kerensky) 執政時，向美政府與私人所訂之借款，又皆未曾償還。約略估計，兩者不下美金七萬五千萬元。

(三) 莫斯科對美國的制度，不恤陰謀傾覆。

(四) 美人所崇奉的主義，蘇俄悉形推翻。因為一般的美人，決不願意承認少數的專制者運用他們的勢力，剝奪大眾的生活權利；自由，宗教，政治，勞工自由以及美人所信仰的主義。

然自經濟方面而言，我們有許多大工業家，卻極密切地與之來往貿易，數額和信用，日見推廣，將來恐怕難免和她發生糾紛；又有許多工程師，被優厚的工資所吸引，不惜竭力效勞，使異端的勢力，得以建立。

工業家及工程師犧牲原則而採這種營業的權宜政策，卻也有幾種理由，我現在姑且略述其中最普通的幾個：一種理由說美國儘可處之泰然，不必慌張；因蘇俄相距既如

是遙遠，又未曾充分發展，即有所舉動，當然不足危害勤勞及自給的美國。

蘇俄的距離，固然是鞭長莫及，其經濟固然是未充分發展，可是她現在經濟的進展，在大戰前俄皇時代，即已發動，雖暫時落後，但現在確已達空前未有的地步，此種強有力的人民之勇往直前的運動，挾有無限的天然富源，聲勢浩大，實足令人焦慮。

我相信這幾次會議，一定已將此項事實，表明清楚。蘇俄有鉅量的主要商品，為完成它的五年計劃，蘇俄以市上的善價，或取傾銷的低價，向國外銷售，藉以換取急需的現金，以後蘇俄如有剩額，終必依此而行。現在先言油業，蘇俄已佔世界大生產者之一，且其計劃中，規定在一九三三年，產額應增至世界總產額中之百分之二十一，此中大半盡是為出口的。至於煤一項，她已足與本雪文尼亞 (Pennsylvania) 最佳的白煤，並駕齊驅；蘇俄的煤，在美國的各大都市中，已有發現。坎拿大自禁令頒布市上，俄煤方始絕跡。此禁令更擴充範圍，舉凡石綿，皮貨及各種木材，均包括在內。蘇俄所產的麥已佔全世界產額中的四分之一，而一九三三年的計劃，預計有三分之二的生產。木材一項，據大略的估計，

她比坎拿大和美國合併面積所有的，超出二倍，現在即可採伐的，已與北美全部所產的相等。木材與木漿自本國口岸運出，業已行銷全球，很平易的與德意志，瑞典，那威，芬蘭，捷克斯拉夫，美國等產木國家互相競爭。在一九三〇年，蘇俄木料產額，祇及美國的三分之一，而在一九三三年的計劃，將過於美國的三分之二，其中大半盡是為出口的。我根據美國的森林的經驗，我敢說明培植林木，須賴改良的林地中的木材供給，可以源源不絕。假定若干年後，蘇俄仍憑她的原始森林，及低價木料和我們競爭，而漫無限制，將來是否可以樂觀，似乎很不易使人預測。譬如紐約州近嘗計劃每年支費二百萬元，儘十年以內，將阿祇隆多克 (Adirondacks) 盡行培植起來。

今年使人注目的，便是坎拿大已喪失英國的木材市場，因為英國已向蘇俄購進十二萬五千萬條木料。在美國的市場，火柴皮貨，魚，水果，糖果，錳及其他物品，亦已源源侵入。在最近幾年內，蘇俄的機製物品，確然能保持她的（國內）市場，不過她的廉價原料，其他各國盡可取以製造物品，而在美國市場中相競爭，且實際上，業已這樣去做。

所以凡物品是由蘇俄的原料製成的，均應包括於禁令，稅則及一切的救濟辦法之內。每有全體的物價，祇因受少數跌價的牽動，不得不跟着降落，蘇俄就總用這技倆，以少量的賤價物品，向國外銷售，因它的原料既行免稅，而勞工的代價又格外低微，所以外國的價值，終於不敵而大跌，甚致生活的程度，亦大為搖動。這樣的活動，更足以搗亂國際間的貿易途徑，使各國發生互相猜忌之心。

我覺得欲圓滿對付這種情勢，各國應該趕緊合作，共謀維持合理的生活程度，因為生活的狀況，是決定一切文化、物質、智能及道德的標準。許多人都承認不合科學的制度，在其他文明國家中，如值有充分的真理發見終必自行傾覆。舍溫特渥斯 (W. G. WOODRIFB BROWN) 嘗幾度與俄人談話，發覺了他們最不願談及的問題就是馬克斯學說的科學根據。這裏就表顯他們順從一種盲目的信仰。不過就目前的情形而論，卻亦並不足怪，因為十三年以來，此輩青年每日所受的教育，就是應信從這種學說，他們絕無研究其他學說的機會。此輩青年將來盡是國家的主人翁，而猶待若干年以後，始得與外界相接

觸。梅恩州(Maine)前任省長裴克斯透(Baxter)自第三次視察蘇俄歸來，嘗證實蘇俄的首領，早已存心推翻所謂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播傳共產主義於全世界的人們。

蘇俄的制度，非惟不失敗，且自十三年前翹始以來，反日形鞏固，此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反對黨非遭殺戮即流徙在外，幾一掃而空。國家的建設，迅速非常。此掌政權的無產階級之生活，較戰前為富裕，工作時間既行縮短，而教育程度，亦已進步。主義的傳授，同一個宗教運動一樣。不論它的基礎是否健全，終也有如其他宗教信仰似的力量。蘇俄數以萬計的人民，為同胞的幸福計，已犧牲生命。反對黨被他們殺戮的，亦須數以萬計。所以資本主義的外國人們，即使在俄國有相當的成功，能否希冀他人特別的優待，仍在未定之天。當蘇俄青年在莫斯科開第五次大會時，托拉斯基嘗言：同志們，革命在歐美兩洲，正將依次爆發，在兩個大資本主義的營地裏，我們要激昂蹈厲，具百折不撓的精神，因為革命是長期的，也是殘忍的。

有一部份的人，以為俄人到底同具一樣的人性，終有一天要起反動。殊不知在蘇俄，

反抗的機會，日漸減少，權勢現已逐漸集中一二領袖的掌握。武備完齊的軍隊，業已編成。軍用儲積物，早有準備。每軍所收穫的麥糧，一部份已留爲此用。因爲共產主義以在工業中心發展爲最佳，所以施用機器的合作農場，已竭力的推廣。俾全國最佔多數的獨立小農人，不致反抗，因爲他們最不願意的，便是一旦棄離久有的所有物。

列寧在最後的遺囑中，嘗言：「最後的結果，兩者之中，必有一勝。」蘇俄共和國與資本主義國家，一定不能避免若干可怕的衝突，以決定最後的形勢。

有人以爲俄人既是無腦筋，又缺創發力，苟聽其自家去做，決非美人的對手。但是最有見識的歐洲人對於蘇俄領袖的智能及目光，或俄國羣衆的同化力及發明之才，殊不敢輕視。試看他們過去的應付和平與戰爭的手段，現時生產的猛進與偉大的五年計劃，便知何等的可畏。蘇俄政府刊行的英文五年計劃（The Five Year Plan）一書中說：「五年計劃是世界無產階級攻擊資本主義的策略最重要的部分。這計劃是想顛覆資本主義。它是世界革命的一個偉大計劃。」他們依賴外國人的技術與經驗，僅是暫時的

現象。不出數年，他們不特摒棄全部外部助力，且將實施最猛烈的競爭。我們現在遇到這樣一個商業與政治之聯合組織，來控制全部國外貿易，管轄一萬五千萬人民的國內市場，各種物品的價格，可任意調動，以對付或消弭世界的競爭，在生產方面，他在創辦上的利益，便是對於資本的投資，利息，租稅，等等沒有固定的費用，而勞工的生活標準，又很低下。

有人以為對付此項競爭，我們唯一的希望，是儘量發展機械，藉以減低生產的成本；換句話說，就是推廣機器的應用，各工業在技術的研究以及市場的計劃等問題，應有相當的合作。這樣對於我們的問題，果然不無稍助，但這不是蘇俄現在所做得很完全的嗎？還是吾們應該退至類如蘇俄的生活程度，而將所有事業，盡委諸政府經營，而後與他們競爭呢？

共產主義，雖經費希委員會（The Fish Committee）證明，亦有在美洲散播的企圖，但是終沒有革命的危險。共產主義最近已變更策略，轉移視線於國內，加緊工作。不

論彼領袖所採取的手段是怎樣，祇須有成功的結果，終可視為新秩序之絕好的模範。倘是其他國家的領袖，對待羣衆，不能公正，或是妨礙每個人發展的機會或是獨攬大權，濫施淫威，那末羣衆的目光，將轉向蘇俄，而一致宣說「看呀！共產主義已成功了，讓我們也不妨一試。」

祇是那輩不諳或平時不注意這兩種制度的學說的人，纔不明白它們將來的衝突。現代文明的世界，不問它是專制的，民治的，共和的或是社會主義的，總是根據於個人的權利；就是個人有生活的權利，有不妨害他人權利的思想行動之自由，有受到良好教育的機會，有利用資本——以往勞力等累積——之權利，如受壓迫得呼籲於政治的制裁，應能有相當的生活程度，在社會中有增進個人地位的機會。

共產黨的立足點，適背道而馳，他們僅以國家為至善 (supreme good)，個人的生活，應專為國家效勞，因為國家賦予吾人一切靈感 (inspiration) 與快樂，國家給予個人所需的物品，滿足他的基本的慾望。坎拿大前任的總理梅亨 (Arthur Meighen) 嘗發

表他的意見說：「列寧的信徒毅然擬改造全部的蘇俄，剷除舊時代的制度，更重關人類的途徑。全世界不知多少年來，人類所墨守的事物將一一根本推翻，全行廢棄。」

假使我們對來自瑞典或其他國家之以蘇俄廉價原料製成的進口貨品，加以觀察，那末相差的數額，亦未見甚鉅。假使我們想到資本的資產，也許減少幾年的貿易差額，儘可以不必重視。

有人以爲我們的貿易差額的順勢，已是承認蘇俄的充足理由。不過依我所見，這種貿易，僅足敵對勢力形成時暫有的現象，乃是推翻我們的制度的先聲而已。現在不妨引述柯立芝（Coolidge）總統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六日對議會所宣示關於承認蘇俄的政見，他說：「我決不因貿易的利益，而出售人類賦有的權利。我決不欲將任何的美利堅主義，爲交換其他利益的商品。」又如當時的國務卿休士氏（Hughes）答覆蘇俄外交總長霍趣林（Chicherin）關於承認蘇俄的談判說：「美國政府決不欲出售所持的主義。最嚴重的癥結，在於蘇俄不斷的宣傳，擬欲傾覆美國制度。所以美國政府，非俟莫斯科放

棄此種活動，實不願有所商議。」

他們未嘗放棄在美利堅的活動，已由費希委員會揭破一切。他們所以不能放棄的理由，亦很容易推測，祇要我們明瞭蘇俄的獨裁斯丹林，乃是第三國際中最著名的人物。第三國際，專努力用種種方法，推廣其共產主義的宣傳。再則紅軍隊員所宣誓的第二條說：「爲蘇俄聯邦與全世界的勞動階級，余誓致力於……等等。」再第四條又如下云：「集中我們的行動與思想，以達解放全世界勞工的目的。」

一九二八年，國際共產黨在莫斯科舉行第六屆大會時，已將他們的計劃，明確宣佈說：「我們共產黨不必隱瞞所抱的目的。我們的宗旨，便是絕對操縱全部文明的世界。我們的宗旨，絕非徒託空言，卻是流血的事實。所有現行非共產制度，一律都須推翻。我們要抓住議會所取的手段，不是漸進的，而是革命的，不用選票，而是用槍彈。」

現在我們不妨希望，他們像大戰以前的德意志，也陷於干犯衆怒的錯誤，那末大家
可以成立聯合的禁令，或是出口的協定（export agreement），藉以挽回文化的厄運，

讓他們的計劃，因自身的錯誤而消滅。

依我的見解，蘇俄目下已準備世界經濟戰爭，人民的義務，如同在戰時一樣，有所工作，政府可以隨意徵役。就如最近開築鐵路，便是一例。

總而言之，在主義上以及利害的關係上，蘇俄決心要傾覆我們現代文化的方式，乃是確切不移的事實。現在的情勢，祇是一個楔子而已。

主席：現在我們要開始討論。我很覺得遺憾的，就是沒有一個純粹的共產主義信徒，參與我們的討論。

在星期二，有很多問題，業已交進，要請康慈教授答覆，現在不妨先行提出討論。我們更特請胡佛教授逐一的解答。

微拉里博士：蘇俄的共產主義，是否將繼續作反宣傳，仇視資本主義世界，且共產主義為鞏固在蘇俄的勢力起見，是否必須赤化其他的國家？

胡佛教授：我以為國際主義，是共產主義最主要的部份。我相信蘇俄共產黨的領袖，都是極

崇拜國際主義的信徒，所以國際主義當然仍是共產主義中主要的與根本的部份。

欲在蘇俄確立共產主義的根基，是否必須向各處宣傳？我的意思未以為然，雖自共產主義正統的立場而言，卻是不錯的。你們大概曉得托拉斯基與斯丹林，關於此點，有極激烈的辯論。斯丹林說，共產主義能獨在蘇俄一國建立，但非俟各國均已赤化，難免常處於四面楚歌之中。托拉斯基說，絕對不能單獨建立。

主席：第二問題，亦是由微拉里博士發問的，就是「蘇俄共產黨深信泰西列強，有聯合攻擊蘇俄的陰謀，不知何所根據？」

胡佛教授：他們的根據，大概有三點：第一點便是據內爭的經驗，很有許多國家，資助白俄軍隊，反抗蘇俄。二則，歐洲各國如波蘭、法蘭西等等，有所謂「右派」(right group)的大同盟，極主張斷然採取干涉蘇俄的政策。此種團結，尤與各國的軍界，發生特別密切的關係，但彼等在各國政府中，還是占少數。

干涉蘇俄，當非各國政府公開的政策。僅是較激烈的份子表示贊成，因為一般軍人

的傾向較爲顯著，蘇俄政府與共產黨，對於這類團體與軍人，遂予以深切的注意。

最後的一點，最關緊要，便是共產黨亟圖破壞資本主義；其實，他們心目中也以爲現在正是如此去做。他們既以此爲事實，則我們說資本主義世界並不聯合一起，先去破壞共產黨，他們那裏肯信。

法國殖民聯合會 (L'Union Coloniale Française) 主席查禮 (Charles Le Neveu) 先生問：我擬問一個附帶的問題，胡佛教授 繼講在歐洲幾個國家，包括法蘭西在內，有白黨勾結軍界中的人物，因以予蘇俄一種口實，以爲有攻擊他的意味。

我深盼你不要見怪，倘我說我常願意聽聞的是本國的事實，我希望關於這點，不妨舉一個實例。

胡佛教授 答：法國的情形講，也是像其他各國一樣，我並未說過，有何證據使共產黨確信爲真，此是你可知道的。我僅講過，因爲有這樣的結合，遂使共產黨的心目中，發生此種見解，以爲是被他方攻擊的理由。我決不欲證述此項干涉的危險。我祇能轉述蘇俄的見地。差

不多每一天的報章上，你們可以瞧見這類的記載，說某日白俄軍事團體的代表，進謁戰士墓，遺一花圈而去；或其他同類的事件，如飄揚舊俄帝國的旗幟，凡此遂造成空中樓閣，以爲法蘭西確是親近白俄的明證。

他們更聲稱，白俄在巴黎有聯合會的組織，他們絕不說這是工業團體，卻硬指爲法國將聯合這種團體，陰謀干涉蘇俄。

我現在再請君注意一下，我絕未說，此事有真憑實據，我不過僅說有一種形勢，其種種形跡，已使蘇俄視爲已很充足。

主席：現請講解游擊隊在共產制度中的地位。約略有若干人已遭殺戮？何種干犯，是要處罰？

胡佛教授：要想舉出被殺的有多少人，當然不易，因爲此是要看你所指的時候而定。我今姑假定你的問題中所指時候，限於去年，或是最近的二年。我到蘇俄的時候，是在一九三〇年，在那裏總共住了九個月，在此時期中，拿俄京每日的報紙來看，因參加反革命的活動，而被鎗殺的，決不到二百人以上，可是實際的數目，決不止此，必高出數倍，我敢說至少當

以千數計。這並非荒謬的猜度，祇要是居留蘇俄，且與俄人相熟識的人，便知許多人民被槍殺的案件，報紙上是不登載的。

我不願諸君心目中有一個印象，以為蘇俄的局面，完全由游擊隊撐持着。果然它是極重要的因素，但絕不是唯一的。

拉伯特博士：我很喜歡徵求胡佛先生的意見，關於一個很含糊的，但是極重要的問題。試問胡佛先生對於那些人在國際關係上，專造蘇俄輿論的人的誠意作何感想？我們常常聽到，蘇俄乃是自己使自己相信的。我卻不信消息較靈通的上等人也和他們信徒向國外所宣傳的，見解相同。胡佛先生對於斯丹林及其同儕，關於造成蘇俄在外交關係上的輿論的方法，所採取的政策，不知有何種意見，或印象或消息？

胡佛教授答：這是一個極好問題，卻需極巧妙的答覆。要解釋它的情勢，簡直是很不容易的。第一我敢說關於外國有干涉的可能，共產黨確很相信。當一九三〇年的春季，我在蘇俄的時候，正逢着蘇俄遭有自大饑饉以來所未有的最困難的時期。那時候共產黨常

絕對明瞭國際間將有干涉的行動。所以附近百貨商店的地段，以及其他的地方，遍貼標語，謂外來干涉緊迫，懇求人民速行參加化學戰爭及航空研究會（The Society for Chemical Warfare and Aviation）。他們以為此種干涉，將由羅馬尼亞及波蘭兩國的軍隊，在法蘭西軍事參謀部的指揮之下出之。

拉伯特博士：誰有這種的思想呢？

胡佛教授：我從未曾和斯丹林或其他當局作私人的談話，但那時候我嘗同一個外國人的小組作有討論。美人、德人和俄人的意見，均頗一致。他們大都相信是這樣。我因為還是初度留居蘇俄，幾亦自信不疑。我個人及共產黨都相信蘇俄處境極其困難。彼時蘇俄全國農民暴動四起。糧食的形勢亦極險惡。我根據此種環境，並知道共產黨恐慌的情形，故我的邏輯的推論，遂斷定資本主義世界千載一時的機會已至，顛覆蘇維埃聯邦便是指顧間事。

拉伯特博士：蘇俄駐外各國的大使公使，向莫斯科所作報告，你是否知道其內容？他們的錯

覺，定有來歷。

胡佛教授：那恕我不能回答。我們很難探悉軍隊調動種種詳細情形。

微拉里博士：我現在欲問胡佛教授，一個關於蘇俄對於宗教的問題。不久以前，當我在倫敦的時候，英國博物院的一個高級職員，嘗告訴我，說博物院的埃及分院，你們大概都曉得，它是專以富藏古物著名的，最近嘗接着蘇俄政府的來信，詢問保存屍首的最佳的方法。他們因為列寧的遺屍，保存未見十分愜意，所以急擬有以改良。他們認為英國博物院的埃及分院能予以相當的指點，故來函致問。

從此處足見宗教在蘇俄雖然我們多知道早經破壞。但是另一方式的宗教，正在崛起。蘇俄的人民，向是極迷信的，而現在宗教的方式，將趨於遺物的崇拜；易言之，便是崇拜列寧的遺屍。或者胡佛教授能為我們講解這事的真相。

胡佛教授：我聽見過這種傳說。或是真的，亦未可知。崇拜列寧的儀式，果是為一部份人民所舉行的，然我並不以為佔重要的地位；我更不相信，有任何宗教，將替代以前的宗教。

主席：現在亞姆斯爵士 (Sir Herbert Ames) 有一問題：「蘇俄政府對於信奉上帝的人，

現取何種的態度？何種人民依然信仰所謂宗教，而希望讓他們自由信仰上帝呢？」

胡佛教授：蘇俄政府盡其能力，急欲破壞宗教，越快越妙，刻下正得着極大的進展。對於人民，不惜加以最大的壓力，以期達到打倒宗教的目的。蘇俄政府對於年老的人民，認為在生活上，既無重要的地位，故亦稍與優容，並不禁止他們進禮教堂。但是對於稍有地位的人物，苟執意信仰，照舊入教堂禱告，就要絕對加以禁止。所以宗教的消滅，祇不過是時間的問題。

講到農民，主要的辨別是看他是否是富農 (Kulak) 等而斷定。因時間的短促，我祇可以說在進行反宗教的陣線上，攻擊宗教的壓力，是無所不用其極的。此外再也不能詳細解釋。

拉伯特博士：我實在覺得我們非常麻煩，苛問胡佛先生。現在請他必須諒解，我們並不以為他是辯護他所解說的思想。

這宗教的問題，很引起我對政治上的興味。種種壓力，加諸蘇俄的居民，藉使失去宗教的信仰。但他們因某種的驅使，非惟不戒免公開的崇拜，且更有劇烈的行動。他們不能消滅宗教的感情，不肯放棄宗教的崇拜的儀式，果由於何種的勢力呢？

胡佛教授：蘇俄在此方面的成績，已很可觀。封閉教堂，刻正趕速進行。但是何勿一舉而盡行封閉呢？祇因他們恐怕如是做去，必將招致極度的反抗。他們注意所施最高壓力的限度，總要使人民能夠忍受。倘遇反抗過烈，那末他們便寬弛一些，藉以和緩空氣。

拉伯特博士：這種抵抗，是否祇發自你剛纔所講的老年人？

胡佛教授：不，這也是發自一部份的農民，尤其是從富農階級裏面。決不是因為他們是富裕，是因為他們以任何一種關係，反對蘇俄政府。起初他們裝出虔奉宗教的面孔，就借宗教的題目為攻擊蘇俄政府的焦點。以上所講，不過發表我個人的意見。常常的您們的見解，都不與我相同，可是當然你們是對的。

紐約市的演說家及新聞記者，霍山 (Synd Hoegain) 先生：我現在擬請拉伯特博士與胡

佛教授，先將宗教的界說，明白釋定。據我的見解，對於所謂宗教 (religion) 一字，以及在俄皇時代存在的俄羅斯正統教會 (The Orthodox Russian Church) 當分別清楚。

主席：這個問題不妨等拉伯特博士討論時，再行提出。

狄芬倍 (A. C. Diefenbach) 先生 (麻省波士頓基督教雜誌 (Christian Register) 編輯) 我相信這是很緊要的，如果對這種事體，空泛的及任意的討論，那是錯誤的。蘇俄大衆人民及列寧所反對的宗教，乃專指希臘正統教，以及其一切政治的活動，這都應當牢記在心。

實際上我不信蘇俄人民忌嫉宗教的本身，他們所懷恨的，乃是數世紀以來，農民所飽受的淫虐；列寧即有此意，據我的論斷，他當然是對的。

我不信世間的人民，是能不信宗教的；亦不信蘇俄的人民，獨能例外。我確信霍山先生的問題，現在極端有討論的必要。

主席：胡佛教授，願否答覆狄芬倍博士所提出的解說，意謂蘇俄人民對於非正統派的宗教，

較爲親近？

胡佛教授：恕我冒昧，這位先生恐已誤聽傳聞了，因爲蘇俄聯邦對付宗教，不問它是猶太教，回教，天主教或是分派教，一律加以反對，並不與希臘正統教，分有軒輊。

勃朗先生：當我在蘇俄時，剛巧遇見一個國際基督青年會（International Y. M. C. A.）的人員。他到俄國已有幾時。現在我將我和他的談話，講一下，諒亦諸君所樂聞。當我們會晤時，彼正動身往敖得薩（Odessa），他在略述俄國的宗教情勢時，說共產政府正採取一謀種略，援助基督教各別派，使與希臘正統教相競爭。他們的用心，是利用各別派，來消弭宗教的反抗，一俟形勢平靖，蘇俄政府便取對付希臘教的手段，仍施諸其他各別派。

霍山先生：你們既然徵求批評的論調，我不妨約略貢獻個人的意見。

依我的見解，我們在討論蘇俄對宗教的態度時，亟應表明，當俄皇時代，希臘正統教，祇是俄皇的附屬品而已。希臘教不斷地麻醉俄羅斯大衆農民之靈魂，正同俄皇室剝削

人民之肉體；當時俄羅斯農民不識字者人數之多，殊堪驚人，即是爲此言之明證。希臘正統教會，建築富喬堂皇的教堂，不遺餘力，但絕不稍爲農民破費幾文開辦一二學校或大學。此種階級組織中之大公爵及其他領袖等，卻恣意逸樂，享盡優適的生活，直至革命爆發始已。

我以爲唯一的要點，便是關於蘇俄的情勢，我們不必重視反宗教的宣傳。數百年來，教會既忽略農民之福利，然則農民能希望彼等之大發慈悲嗎？我以爲這種事實，亟應認識明白。

傅斯德：我嘗會晤一位著名的人物，乃是蘇俄的猶太教徒的領袖，現在適來我國，偶與談及此事，他叫我注意共產黨在蘇俄現在也立有共產主義的十誡，以抵制猶太教徒。後者祇是一個中立的團體，但在蘇俄對待宗教的態度上，亦有一部份的影響。

這個十誡包括蘇俄人民應守奉的規律，即在聖禮日 (The High Holy Days) 他們須反對猶太團體。各地的俄人，時常聽到說，如果組織郊外遊宴遠足隊以及其他同

性質的消遣，使青年無心走進猶太教堂去注意所謂猶太的聖節，那就等於做了一樁很好的工作。

霍山先生所講的，我以為並不盡然，因為教會雖被俄皇及其同黨利用，但仍有精神的一方面，確能離開教會的政治關係而獨立。蘇俄共產黨，絕不分別政治與精神的範圍。精神方面，本應保存，無奈共產黨直欲完全摧滅宗教，毫不顧惜。

培克拉斯博士：我完全贊同胡佛教授的見解，說今日蘇俄政府共產思想是侵略的帝國主義的當然的結果。他們武斷的理想，就是要使這句話實現。他們對於一切反動的社會的及文化的勢力，自然要盡行剷除。我覺得這是很簡單，很自然的。

胡佛教授：我相信這是非常對的。我不特常常想到，並且予以十分的注意。我決定它不僅是唯一的，也是極重要的。

主席：諸位可讓胡佛教授休息一下嗎？我們可否請微拉里博士就坐見證的席位？

亞姆斯：意大利在汎繫黨統治之下，言論及出版界的自由，遭受何等程度的限制？將來有無

取消限制的希望？

微拉里博士：關於言論的自由，如果言論是指私人的談話，那是絕無限制的。實則在意大利，我嘗和各種論調不同的人們談過，有的是褒揚汎繫主義的，有的是反對汎繫主義的，還有的是從客觀的眼光，加以論斷的，可是從未受到當局的干涉。

出版界的自由，卻受當局的限制。但是在意大利我們的確已有過出版的自由；當汎繫局面初形成的時候，並未有限制的規定。其後反對政府的出版界，因宣傳的態度過於激烈，而且多有煽惑性，輕於挑撥革命，當局遂不得不加以取締，擬定辦法，嚴禁煽惑的活動。

在意大利，出版界已有這樣的狀態：一方面擁護汎繫黨的，恭維無所不至；而另一方面反對汎繫黨的，攻擊又無微不至；但兩方絕無危險性的論斷。

要應付出版界的自由問題，恰如公開集會的自由一樣，不得不依照意大利現行的辦法做去，因為意大利現在正在過渡或嬗變的時期中。當此時期終了後，自當修正現行

的出版法。

在意大利，公開集會的自由，亦受當局的節制。在舊制度的支配之下，當局常禁止集會，事實上頗不乏其例。不過現時施行，純以政治的機宜，為明確的標準，凡敵對政府的公開集會，自不獲准，但這均是建設新國家一部份必要的政策，蓋為維持國家紀律及秩序起見，此種限制比較空泛的自由，更重要得多。

主席：

加爾特教授 (Professor Calder) 有一個問題：「當一九二六年，記者在意大利的時候，構成法團國家之團體組織法，業已頒佈。工會、僱員及職業聯合會，非被解散，即已失勢，是不待言。」

微拉里先生嘗說過，不問任何職業，首先加入新團體的百分之十的會員，在法律上最佔勢力。但是照法律來看，所謂首先加入的百分之十，並非指最先加入的會員，乃是政府所最先核准的會員。概括說來，此種團體是一個經過選擇的團體，以後加入的會員，亦同樣的由聲請人中選擇的。雖是職業界的全體人員，不問准否參加，齊須繳納會費，更應

服從百分之十的少數人所規定的章程。

請問微拉里先生，彼時所公佈種種非推舉的奇異方法，以後有無更改許多工人，自一九二六年以後，既不能參加此種社團及團體，不知其地位若何？

微拉里博士：百分之十的條例，所以規定是因為那時贊成工會制度的人數很少的緣故。我在講演中，已經詳細說明過。

所有的聲請人，實際上都被准許為參加工會的人員，但極少數的人，因與革命活動及宣傳，有直接關係，故不得享受此項利益。在許多的團體中，差不多每業或每一地方的全體工人，均加入各該業的團體，有的地方，大部份的工人，也都已經加入，這就是我們的證據。現在意大利全國，此種工會團體的人數，已以百萬計，而每日仍在增加。

至於其他不入會的，我在講演中，早經解釋過，亦有各種的原因。舉其一端，可說是一入會後，便應繳付高額の會費，工人所獲既微，自然寧願不付高額の會費。

還有一個原因，工會的思想，不論它是新的，或是舊的，在意大利的某部份，比較其他

的部份，或是在某行業中，比較其他的行業，流行更爲普遍。譬如在工業似乎比在農業，在意大利北部，似乎比南部，傳播更爲廣大。當新工會成立時，舊工會時代所有的趨勢，依然存在；換句話說，北部參加的人數，較多於南部，工業的人數，亦較多於農業的。

再有一點，就是當舊工會存在時，它們常集合一起，組成一總工會，然與實際加入新會的人數相比較，卻不能以比例計。

亞姆斯爵士：怎樣推選代表呢？

微拉里博士：他們全由意大利總會 (Italian General Confederation) 推舉出來，常聚集於各大都市的總聯合會。

亞姆斯爵士：那末何以又常有一個反對的代表呢？

微拉里博士：因爲其他各國的勞工團體的代表，常偏向於社會主義，且純因政治的關係，極力反對汎繫主義；所以對於汎繫派的代表，抨擊無微不至。自然，在國際聯盟裏，他們不能反對政府的代表；但是在國際勞工局中，他們可以反對意大利勞工的代表。

他們還提出一個問題，說勞工的團體，是包括僱主及僱員的組織。當意大利汎繫制度方產生的時候，頗有人主張組織僱主及僱員的混合公會。不過此種意見並未成爲事實。

主席：霍金孫女士 (Miss Hopkinson) 請問一個問題：「在法國國家或職能國家 (The

corporative or functional state) 中，每一人民所運用的政治上的權利，是依其個人的職能而別，例如農人、木匠、律師等等；那末已經告退服務的老年人，以及專恃投資的所得爲生活的人，不知立於何等的地位？難道他們就喪失選權嗎？

微拉里博士：他們也可以加入相當的公會。他們不一定須隸屬於勞工或職業的團體。他們可以參加藝術研究院；亦可以進大學校，或竟算是告退的人而已。因爲告退的人，仍舊視爲以前所參加的組織中的一份子。

依賴投資所得爲活的人，亦有相當的公會，可以加入，例如房主聯合會等等。實際上差不多每一種人，總被一種的團體所吸收。

除此以外，職業的資格，祇在推舉候選人時，乃是必需的；對於候選人的挑選，各職業團體，均有參加。不過等到正式舉行選舉的時候，公民投票，仍以公民的資格，並不自視為某一團體的會員。所以祇在預選的時候，團體的會員的資格，始與有分。

主席：我們在撇開意大利之前，對於意大利的形勢，諸位再有意見發表否？

哥倫比亞大學克霖倍博士 (Dr. Otto Klineberg)：可否讓鄙人問微拉里博士一聲，大學教授及教員等，果有因不能遷就汎繫主義的政綱，而致失去其職位者否？設真有此種情形，不知到何等程度？

微拉里博士：據我所知道的，僅有一二個例子而已，都是因為參加革命及煽惑的活動，致遭黜革。但是我聽見過有許多極端反對汎繫黨的大學教授，譬如某一著名的哲學教授及吾的好友羅飛尼參議員 (Senator Ruffini) 至今依然照常供職，且演講亦一如尋常。

霍山先生：對於微拉里博士剛纔所講的，我很想補充幾句。我嘗聽見薩爾維美尼教授 (Dr. of. Salvemini) 說過，自由教育家的職業，自從意大利現行的局面形成後，受不起摧殘，

實際上早已消滅。

微拉里博士：他可以這樣說罷。

拉伯特博士：我要問微拉里博士，假使他的朋友羅飛尼參議員現在在這裏，他對於教育家的見解，是否有同樣的答覆？

微拉里博士：羅飛尼教授，卻是一個極誠實的人，也是我平時所最敬愛的。當然的，他所抱的見解，決不與我的相同。照他的意見，或以爲意大利並沒有學說的自由 (academic freedom)。我敢十分斷定，假設羅飛尼教授在這裏，決不會做像其他反對汎繫黨的人的舉動，尤其是在國外，指摘本國的短處。他從不會這樣做的。

我記得不久以前，在意大利的時候，他嘗告訴我一個問題。那是他出席意大利智識合作研究社 (The Institute of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 所討論過的。他說「這個特殊方案，乃是意大利政府所主張的（或未主張，我已忘記，不能指明。）所以我亦將取一致的行動；我雖然反對汎繫黨，不滿意現時的政府，但一旦離國在外，我便是一個意

大利人，自當擁護祖國及我們的政府。」

霍山先生：現在應問的，論證真理是否須受地理疆界的影響。

微拉里博士：如果真是真理之論，當然不應受其影響。但是許多反對況繫黨的人，所說的話，

距離真理，尚十分渺遠。

主席：亞姆斯爵士向勞台大尉問一個問題：增減工資，能否依照各時期生活費用的變遷，擬

定一個科學的方法？值茲千鈞一髮之際，不知怎樣減少工資？

勞台大尉：我想這個回答，很可以簡單說「不」。沒有科學的方法，可以增減工資。就長時間

說，工資乃由生產力與生產力的競爭方法所決定。要回答你的問題，像現在的時候，物價與工資，既大失平衡，且顯要實行減少工資，那末參照生活費的比例，去減少工資是很合理而穩妥的，因為工資減少以後，經濟的平衡，始有恢復的希望。這是吾們恢復平衡，至少能幹的，亦是最主要的步驟，不致傾向於糜費的徒勞。

拉伯特博士：關於這點，勞台先生豈不信任指數與生活費的關係麼？

勞台大尉：在減少相當的工資的範圍以內，當然我十分信仰。

拉伯特博士：能不能製定一個照出品售價的工資記算法？

勞台大尉：你不能施行一種方法，使升降工資，全以出品售價為根據。因為此種變動，在經濟勢力的自由活動中，乃是自己決定的。但是假使要暫時加以迅速的糾正，那我想不妨引用指數，可以免除極大的錯誤。

亞姆斯爵士：我記得在日內瓦的時候，國際聯盟的秘書處，正採用新擬的工資表格。工資被分為兩部份，一部份是不變動的，還有一部份，是根據指數，年年變動的。秘書處每一職員所得工資中的某比例，乃是跟隨日內瓦的生活費而變動的。我敢問拉伯特教授，此種制度，仍在繼續施行否？不知試驗是否成功？

拉伯特博士：此制早已廢除，工資仍併合為一。從僱員方面着想，如果生活費增高，那是成功的。但是當變動是另一方向的時候，大家一定很不歡迎的。

主席：文寶女士（Miss Wambangh）有一個問題「假如照目前的情形，現代規模的戰

爭，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大患，所以有主要經濟關係的國家，不特當聯合廢除戰爭，且須協力勵行和平，試問這豈非經濟建設中的主要的部份麼？十一年以前，世界多數國家，均已採納此種計劃，且已實地施行，那末美國既握經濟的霸權，豈不應該趕速加入此種團結，還是寧願逗留在外，不僅阻礙和平組織的發展，抑且威脅資本主義制度以及我們的繁榮？

勞台大尉：大體說來，我敢講美國屆時必會加入國際聯盟。我希望一俟贊助加入的輿論成熟的時候，美國即能加入國際聯盟。我想如果沒有充分的輿論作後盾，是不應該強制美國去參加的。

至於過渡的辦法，我確信假使授權於今日的當局，極力贊助國際聯盟關於經濟抵制的行動，藉以懲戒一班輕啓戰釁的國家，一定是很有利益的。

主席：斯考脫博士請問勞台大尉一個問題：有人說個人資本主義的效率足以媲美共產國家的社會公道，不知先生對此說有何意見？

勞台大尉：這個問題，以兩個前提為根據：第一資本制度是確有效率的；第二共產制度，是確有社會公道。

在我個人的私見，我很情願接受第一個的假定，說資本制度，是有效率的。至於共產制度所有的社會公道，假使你研究的是純粹的共產主義，那可不是社會公道，我想我的答復，可終止於此。

主席：還有一個問題，克勞斯博士 (Dr. Cross) 要勞台大尉回答：「勞台先生所引證歷史，以表明資本與勞工，在國家收入中，所佔的比例，各為百分之三十及百分之七十，因此歸納而得一個不變的定律，說此種分配，將永遠的存在。請問此種結論，有何相當的理由？」

勞台大尉：克勞斯博士也許有點誤會我的意思。我對於資本所增殖一國的收入之比例，為概括說明起見，所以說那是有很有趣之歷史。當工業革命之初，尤其在馬克斯的時候，工業之價值生產中，歸於資本所佔的比例，增進極速，差不多昇漲至全部生產中的百分之三十，且在二十五年中，總佔工業之價值生產的百分之三十左右。這個百分率何以不

能再行上昇，卻沒有經濟上的理由可以解釋。但是照事實講，它已經固定不變，約逾二十五年。且按目前的趨勢，或許漸有降減的傾向。

資本所佔價值生產中之比例，遂趨降減的原因，厥為商業之科學化。用科學方法力求增加貿易額，或增進投資的功用。所謂連鎖商店（chain store）業已增進每一元投資上的貿易。倘使你將連鎖商店的工作，一分析，便可發現勞工所佔全體價值生產中之比例，與一般的商店不同，都是格外的增加。在工業中，也是如此。照我的印象，此種趨勢，還將跌減至百分之二十五的數目。吾們所能斷言的，便是勞工與資本所構成百分之七十及百分之三十的比例，決不會增加，但是確有可以跌落的明證。不過此種情形，也沒有絕對的規律可言。

拉伯特博士：設在某一社會中，資本的量額，比較勞工人數，增加更快，那末社會生產的增加部份，便將歸諸資本，工資雖有絕對的增加，但對於社會生產，只有相對的增加，試問此種情形是否真不可能。或者資本的分佈，既逐漸推廣，所以大多數工人一部份的所得，將為

資本上的利息。從這一方面看，我們可以有把握的說，在一個進步的社會裏面，社會生產歸於資本的部份，勢必逐漸增加。

勞台大尉：我對於這個問題，最初研究的時候，便有這種見解。

這可說是經濟學家的新問題。我的印象是資本所佔價值生產中的百分比，或有增高的趨勢。我很懷疑那種統計說是過去二十五年中，非無減落的事實。所以我便從資本流動的增加，每一個錢投資上貿易額的增加，以及生產費中歸於機器的利息的部份幾方面去觀察。

從這兩方面，我便看出資本所佔價值生產中的比例，卻有可以減落的趨勢。現在對於你的問題的答復，姑且拿美國來講（以美國為資本制度特殊的例子）：在美國每一個工人的進款，將繼續的增加，但終不及勞動的工資增加之速。所以在分配勞工與資本的總額裏面，資本的百分比將漸漸的降落；不過他的趨勢非常迂緩。如果十年中能減去百分之一二，已經是很希罕的事情。我的確相信這百分比數必定是價值生產中的百分

之三十或少一點，沒有明確的增加之趨勢。照各方的證例去看，趨勢是慢慢的降落而不見得是逐漸上升。

我相信這並不和你的意見衝突，每一個工人的資本，仍是增加的。

考爾諾脫教務長：我承認勞台大尉所用的「效率」一辭，覺得非常費解。他雖在私人談話中，竭力爲予解釋，我仍然如在霧中。他說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效率，雖然猶未達到其所希冀的程度，但是確是有效率的。

我們上星期的討論，很足以證明資本主義社會，並不具有效率，我以爲權衡社會組織方法的效率，似乎應以人民的福利爲標準。假使一種制度，不能免於像資本主義所有的災患，決不就算是有效率的。

勞台大尉對於「效率」這個名詞，未知下何種定義？是否專指生產物品的生產力？假如不注重社會的幸福，生產物品的目的何在？共產主義是否不能因爲有益於社會的福利而算是有「效率」？

勞台大尉：我在許多事例中講到資本制度所有的機械的效率，然而我也未嘗忽視全部的效率，心理的原素亦包括在內。我個人以為世人所認為共產主義所有的好處，其實共產主義去之尚遠。不過我十分承認，在這個時候，資本制度卻須負起一個重大的任務，努力於發展心理上的利益，使得與機械的效率，並駕齊驅。所以資本主義當前的最大問題，即為將其自身的構造，盡量揭示。資本制度的危亡，將不由於其本身的弱點，而由於世人當其日臻複雜之際，不能明瞭其性質。

菲斯先生 (Mr. Herbert Feis) 美京華盛頓經濟學家兼著作家：關於百分之三十的數字，鄙人要向勞台大尉請問一聲，他所引證的資本所得統計，是否為內國稅收 (Internal revenue) 統計；對於資本的損失，未知如何措置；收入中是否包括租金的收入，如有的話，租金的收入，隸屬於那一部份。

勞台大尉：此種數字，並非根據於所得稅的統計，乃是我在國立經濟研究院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時特別研究而得。

菲斯先生：那確是內國稅收的數字。

勞台大尉：不論內國稅收，或是其他種種，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釋。如果要說明怎樣計算出來的，卻很費時間。現在我是否能夠很正確的說出，我自己也沒有把握。

這裏面租金的地位，大體說來，並不重要。我相信有些時候分析起來，將他歸入費用一類。

斐納脫先生 (John C. Bennett Huburn, Theological Seminary, N. Y.) 我覺得勞台先生為資本主義辯護可謂無微不至。不過他似乎忽略了一點：不論任何制度，資本主義的或是別的，其所生之弊端，不但範圍有廣狹，而且程度有深淺，統計方法祇能估量其範圍。我不相信我們此地的一班人，能將資本主義作一實地的具體的解說。我以為常與感受資本主義的壓迫的人相接近的一班人，或許要得着一個結論，說任何制度，除非是十二分腐敗，總不至於比資本主義更壞了。

主席：恩特希爾教授 (Prof. Underhill) 請教胡佛教授一個問題：在蘇俄到了這種帶宗

教性的熱情，已經銷沉的時候，少數的執政階級從政的動機，是否將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當局一樣？在任何社會裏面，精幹與雄心的人們所努力的目標，不外乎取得權勢。在我們的社會當中，他們一旦成功了金融家或是實業大王，便可得着權勢。在蘇俄要想有權勢，祇可在政治方面企求升遷。但是以通常而論，不知是否無論政體如何，常有一種引誘，使彼輩竟利用權位不顧犧牲他人，以求利己？或者蘇俄是否果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可以激發人們爲公衆服務的精神，使之比較在資本主義國家更形發達？

胡佛教授：鄙見以爲共產主義並不十分依賴公共服務的精神。這句話也並不是指摘共產主義。關於共產黨，我祇要講一點：這一點也是我所仰慕的。就是他們全是實際家，實事求是，絕不專尚感情。他們並不想拿公共服務作口頭禪，他們努力要建設一個使人不能從中舞弊牟利的制度。權勢之爭，依然存在，有些地方，較之資本主義制度裏面，或許格外強烈。將來也許發生領袖人物採取便於利己之政策的事件，但是我不相信他們所以這樣幹的動機，是求富斂財，或是一切純以「金錢」爲目的。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三月三版

(84228.1)

社會科學小叢書
蘇俄制度汎繫制度與資本制度一冊

Bolshevism, Fascism and Capitalism

每冊實價國幣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George S. Counts
and Others

譯述者
于樹光
林春光
王炳松
何秉麟

主編者
劉長雲
何秉麟
王長雲

發行人
王長雲
王長雲
王長雲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本書校對者楊瑞文)



台北科技大學圖書館



3107861

